

石仲泉 著

我观

邓小平

增订本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石仲泉 著

我观邓小平

增订本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观邓小平/石仲泉著. —增订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208 - 12496 - 7

I. ①我… II. ①石… III. ①邓小平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4236 号

特约编辑 郑宁波 齐书深
责任编辑 毕胜 熊捷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我观邓小平(增订本)

石仲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54.25 插页 6 字数 932,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496 - 7/D · 2543

定价 128.00 元

(全二册)



作者简介

石仲泉 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首席专家。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长达八年之久。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二集》、《长征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艰辛的开拓：石仲泉自选集》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等。新近出版《我观党史》（三卷本）、《党史热点面对面》、《我观毛泽东》（增订本）。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目录 CONTENTS

第四编 专题论

-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453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兼谈“西柏坡精神” / 489
- 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 / 501
- 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前期的党史 / 523
-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 / 546
- 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历程 / 573
- 伟大的思想解放
——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 30 周年 / 581
- 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
——从编辑《邓小平论中共党史》说起 / 591
- 党史教育与党的建设 / 600
- 世纪之交的党建前景展望 / 607
- 党的生日话党史：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继续前进 / 614

第五编 南方谈话论

- 当代中国历史航船的伟大指针
——重新学习邓小平 1992 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 / 627

- 2 | 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 664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 / 682
南方谈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感召 / 695
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未来发展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 / 704
南方谈话与对十八大的期盼 / 714

第六编 札记

- 同一首“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721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断想 / 725
“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提法比较科学 / 732
三个“30 年”与两场伟大革命
——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对话 / 734
辩证地认识两个“30 年”的历史关系 / 739
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 745
探索中的权力交班模式 / 756
从四川槽渔滩的变化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 761
深化,再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上新台阶的必由之路 / 766
《邓小平画传》
——世纪伟人的画传珍品 / 774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研究》序 / 779

结语

- 邓小平超越自我的伟大人格 / 785
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 792
后记 / 796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与它具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改造当代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的科学的世界观。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研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深化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自邓小平的著作成集出版以来,理论界就开展了对邓小平哲学思想,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研究。目前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相当多,可谓硕果累累。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也有这样那样的思路,颇有百花齐放之态。我也想采取一种新的讲法,不单纯就邓小平的哲学论述来解析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而是把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哲学的大系统之中来考察,放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体系的相互作用之中来考察。这样,我们的认识可能更符合历史一些,更全面一些,有利于完整、准确地学习、把握和应用邓小平哲学思想。

下面讲五个问题:

* 这是作者 1996 年 9 月 10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将军班”的讲课提纲。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基本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算起已有150余年。他们的功绩是实现了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改造,创立了作为新世界观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论。从此,在世界哲学的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哲学理论诞生了。新哲学世界观的实践者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无产阶级所持的立场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存在任何根本利害冲突,这有助于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也就是过去常讲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因此,新哲学的命运与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革命者、共产党人和一切先进分子同在,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因而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说这个新的天才的世界观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那么将这个新的天才的世界观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则要更多地归功于恩格斯。可以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费尔巴哈论》(1886年)、《自然辩证法》(1886年)和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

第一,新哲学的定义已明确了。恩格斯认为新哲学“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是区别于其他各种哲学的一个科学的定义。新哲学的定义明确了,它的研究对象也就明确了。

第二,通常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块”内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已经形成。恩格斯不仅在这几本书里讲了“三大块”,而且已使用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对于这个“三大块”的板式结构,目前哲学界有这样那样一些看法,虽然还不能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佳结构,也不能100多年来一成不变地使用这个结构,完全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来发展它,但是应当承认,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哲学面世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并独树一帜的最初的基本的结构。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已经提出。例如,关于全部哲学的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本问题；关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及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基本的哲学范畴、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否完全科学，但它展示了新哲学的基本面貌。从此，这个新哲学就以它作为坚实基础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伟大贡献，为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承续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无论哲学界对列宁哲学有怎样的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不容抹煞。对上述“三大块”都有发展。比如，列宁在他的哲学论著中提出物质概念，突出对立统一规律，明确群众观点，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整体，论证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这些都进一步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际上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同第二国际的论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国家哲学。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和发展，能够作为一个正宗传统承继下来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期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思想有很多的形而上学。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直线化的倾向。但是应当肯定一点，即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的广泛宣传起了巨大作用。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斯大林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它的消极作用就是“唯我独尊”引发的“霸道”、僵化，妨碍对它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还不知是什么样子。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既是大学问家，又是大实践家。他通今博古，融会中西，具有丰富的文学、史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又根植于中国农村，重视并擅长调查研究。在投身中国革命洪流之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善于将其提高到哲学的层面上来加以研究。因而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开始，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理论和哲学著作。

如果说毛泽东在 20 年代发表的大量论著，尽管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但主要是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革命斗争的形势，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因而还属于政治性论文，那么，1930 年 5 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则是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这里，毛泽东首次从认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456 | 教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意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搬外国经验以及上级领导指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而且已经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1937年7—8月间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实现了哲学上的第二次飞跃。毛泽东早年求学时就酷爱哲学,花了不少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因而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即信仰唯心主义。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经过十月革命的冲击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在参与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之前,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其标志是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②。毛泽东自述,1920年夏天,“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③。17年后,在抗日战争之初,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其中《实践论》、《矛盾论》比较成熟,更具特色,经过修订后,成为毛泽东哲学的主要代表作。“两论”标志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如果说第一次飞跃是他的哲学信仰的飞跃,那么第二次飞跃则是其哲学理论的飞跃。这就是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的飞跃(此前的论著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较为具体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党建等问题作具体分析,“两论”则以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由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在此前的论著中,或从政治视角,或从军事视角表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两论”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两个领域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由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此前论著中的哲学思想多属于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两论”的研究结果则是通过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升华到哲学高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从此,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大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一个“世界级”的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③ 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置。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即是说其发展的面较为广泛,且持续的时间较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在继续发展。并且,从建国到八大前后形成了毛泽东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它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续高扬,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是开拓了在某些方面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后“以苏为鉴”,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党的八大制定了一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其次,辩证法思想的空前发展,创立了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在相当长时间占居主导地位的是“无矛盾论”。毛泽东批评指出,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并且分析了我国国家需要处理的若干重大矛盾。《论十大关系》具体分析了十大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如果说“两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方面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创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第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方位的探索,尽管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个时期的实践,实际上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声;在理论上则为后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孕育了思想胚胎。只要将八大前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获得的思想认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某些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即怎样被继承而又在后来怎样得到发展的关系。

总起来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哲学理论方面讲:表现在本体论上,深刻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在认识论上,全面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在发展观上,集中论述了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在社会历史观上,强调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三) 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方法论功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提出了社会实践是新哲学与旧哲学的

458 | 一个根本区别,指出了新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变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始终强调他们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由于他们的实践的局限性,没能创立把哲学应用于实际工作的方法论体系。

列宁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这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讲得很突出。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的论断,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列宁称唯物辩证法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并且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用于俄国革命实际,没有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作为死的教条加以固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
论,从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这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胜利。列宁尽管也很强调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并阐发了很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但是他仍然没有来得及建立方法论体系。

毛泽东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1941年9月,毛泽东讲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1920年,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之后,懂得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就去从事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国革命斗争异常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不仅考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方法,使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哲学不仅强调有无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革命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系统。

毛泽东对于这个方法论系统的创立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他一直认为哲学就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他还说过,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呀?那就没有用了嘛。他坚持把哲学应用于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融合。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哲学这个成就是巨大的。从理论上说,它丰富、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实践上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的应用,提出正确的路线,制定正确的政策,规定正确的方法,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党的许多工作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的重要特点。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两个应用发展阶段

这里想从总的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关系。为此,要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

(一) 理论哲学与应用哲学

这是这些年比较时兴的概念。我觉得,如果不泛用,不绝对化,为了说明某种关系也可以使用这种概念。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同其他学问、其他科学一样是分层次、有分支的。对它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法。从功能来分,可以分为理论哲学与应用哲学两大类,如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类一样。它们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本身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比如,中国科学院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中国工程院主要从事应用研究。两院同等重要,两院院士都是同样规格和级别,不存在谁高谁低。

任何一个哲学家的著作都包括理论哲学与应用哲学两个方面。马恩全集几十卷,理论哲学只占一小部分,就是那几本著名的哲学著作;应用哲学占绝大部分,应用于历史、经济、社会、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列宁著作第二版也有好几十卷,大部分是应用性著作。说这些著作是应用性著作,并不等于这些著作不重要,不少也是名著。

从毛泽东著作来看,也包括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两个方面。属于理论哲学的著作是少量的。绝大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的著作。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一本著作来讲,可能是交叉的,既有理论哲学又有哲学的应用。例如:“两论”主要是理论哲学,以研究哲学问题本身为对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两者兼有。就它的第一部分提出社会基本矛盾,将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分为两类矛盾来说就是哲学理论;就其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而言又属应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名著,主要讲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即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为应用哲学范畴。

有如前述,理论哲学与应用哲学的这个区分,是从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来区分的(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因此,要注意两种偏向,一是重理论哲学轻应用哲学的偏向;二是要防止把应用哲学与理论哲学完全混同的偏向。尽管这两者难以区分,但毕竟研究对象不一样。前者是以哲学问题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主要是运

460 | 用哲学理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各种问题,就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讲,主要是运用来研究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这两者就研究对象的基本方面来看,还是可以作一定的区分的。

(二)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决定了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

邓小平比毛泽东小 11 岁,但却几乎是在同时代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30 年代初,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毛泽东已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卓越代表。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政策,遭到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左”倾领导人的打击。从这时起,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共同思路,就把他们两人紧紧地联在一起了。邓小平追随、拥护毛泽东,毛泽东赏识、重用邓小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两人的基本关系。

在 40 年代前期延安整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两人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邓小平在太行地区,未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但两人的心相通。邓小平在北方局党组的整风动员会上说,我党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这使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幸福。并说:“现在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①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泽东一直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小平在各项工作中都出色完成任务,屡建奇功,受到毛泽东的表彰。

建国之后,邓小平从地方到中央,毛泽东推荐邓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充分显示了他善于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才能。周恩来曾夸奖他有“举重若轻”的本事。1952 年,邓小平到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1954 年,任党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事务;1955 年,他具体负责筹备八大,经过 1 年半的紧张筹备,到 1956 年 8 月基本就绪。从 8 月 22 日起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从 8 月 30 日起开八大预备会议,两会套开,交叉作业,工作异常紧张。在 9 月 13 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议题时,毛泽东讲了为什么要设总书记的想法。他说:这样,“有几道防风林”,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出了事,可以有人顶替,同时人多一点也便于工作。他还表示,身体、年龄都不如别人了,不能唱主角,只能跑龙套。唱主角的是恩来、陈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8 页。

小平。他们是少壮派。他自己属于现状维持派,准备到适当时候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讲到总书记,毛泽东推荐邓小平,说了一些话大约有500字,一连讲了七个比较好。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还说,邓小平使人不感到那么怕,跟我一样,他不是没有缺点,不是没有得罪过人,但是他确实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段话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党的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进一步将邓小平纳入接班人的视野。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到莫斯科。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一段对话。毛说:你看到那个小个子了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人才难得。1959年3月到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出现的分散主义,集权于中央,提出他本人是正帅,总书记邓小平是副帅。60年代初,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指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开始了“两落一起”的特殊经历。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温都尔汗,毛泽东的想法有所改变。1972年,邓小平获得解放,毛泽东重新起用他参加领导工作。到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先是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王洪文靠边站了。这实际上又有让邓作为接班人的态势。

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始终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非毛化和任何贬斥毛泽东作用的错误倾向。这表现了邓小平的宽广胸怀。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与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谈话,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在主持起草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提出,这个决议首先的最根本点就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写不好这一点,决议宁可不做。他一直强调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他还叮嘱全党不要把他放在毛泽东之上,认为这样不合适,强调“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462 | 毛泽东、邓小平两人思想的一般关系,简单说来就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包括毛泽东晚年的话,也可说是继承、纠正与发展的关系。还在1980年10月,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好这件事。”还说:“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有人说,这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时期说的,现在全面改革、开放了,而且搞市场经济了,这个说法已不适用了。我认为,这样认识问题不全面。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讲得很清楚,“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②。这是讲搞改革,既包括全面改革,也包括搞市场经济,这是就指导思想而言的,不仅现在适用,将来也适用。前面那个“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做好这件事”,我想至少要管100年,管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地,这不是简单地恢复继承,而是包括发展,甚至重大的飞跃式的质的大发展。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但这丝毫不否认两者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关系。

(三) 两人的哲学思想关系,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邓小平既师承毛泽东,又发展了毛泽东

就毛泽东、邓小平两人哲学思想的师承关系(继承性)来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邓小平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都来自毛泽东哲学。比如,在唯物论方面,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在辩证法方面,分析矛盾要抓住主要矛盾,要有全局观念,发展的不平衡、波浪式等等;在历史观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生产力标准等等。邓小平所用的上述概念范畴都承续了毛泽东。

第二,邓小平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

——强调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比如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又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②还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③这几段话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一个思路。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④

——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虽是邓小平讲的按照辩证法办事思想的逻辑结论,但从语言表述看,也源于毛泽东的两点论、两条腿走路的思想。

——强调独立自主,争取外援为辅,从哲学上说是内因与外因关系,也源于毛泽东。邓小平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⑤这里表述的语言,与毛泽东几乎一模一样。

第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大体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如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都直接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就是说,如果要建构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系的话,明显地可以看出其原型来自毛泽东哲学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464 | 第四,邓小平的哲学性格与毛泽东有连续性。比如,

——强调走自己的路,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与毛泽东的哲学性格一脉相承,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强调随着实践的发展,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不能墨守成规,停滞不前。毛泽东多次讲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也具有这种性格。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解决他们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发生的新问题。“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这种继承性,也说明了两者的师生关系。

因此,从以上四个方面看,可以说,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即同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这是两人哲学思想关系的一个方面。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两者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后者又是这一个理论体系中的另一个发展应用阶段。这才是两者的全部关系。

为什么说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应用发展的又一个阶段”呢?简单地说,是在应用中发展,这种发展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了鲜明的阶段性。

首先,如前面已经反复指出的,哲学理论与哲学应用不存在最低、优劣之分,只是研究的对象、解决的任务不一样。当历史发展到80年代、90年代,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要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进行哲学的反思。

这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呢?我们知道,提出什么历史任务,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随心所欲,想要怎样就怎样的,而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历史决定论。

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与30年代的历史环境大不一样。毛泽东为什么要写作“两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理论体系呢?这也是当时的历史要求。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30年代初王明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影响极深。经过遵义会议之后,到了延安时期,不仅要在政治路线上根本改变王明的那一套主张,而且要对其作思想路线的清算。这是走中国自己的路的历史要求。这个要求反映在哲学上,就要求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两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通过延安整风到40年代中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这个哲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建设实践证明,这个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后来中国共产党犯错误,不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的对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错了,而是在探索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这两者结合好,毛泽东晚年个人的哲学思想出了偏差,即偏离了原来正确的哲学思想。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去建构一个区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理论,而是像前面说的,“恢复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在政治路线上首先是这个任务,在思想路线和哲学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在80年代、90年代,邓小平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哲学上反思过去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解决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说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解决了中国怎样革命,夺取了革命胜利的任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那么,邓小平哲学的任务,就是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怎样把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邓小平哲学就是进行这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哲学指导思想。由于应用哲学原理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发展阶段。

第二,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虽然是同一个理论体系,其哲学概念和思路也相同,但是所揭示的内容,以及在一些哲学概念、范畴关系的认识上或哲学思考的侧重点上,又是不完全一样的。邓小平对革命问题(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哲学表述及其内涵,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使邓小平哲学

466 | 不完全同于毛泽东哲学,有与毛泽东哲学相区别的一面。比如,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与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改革的道路是一个思路,而且起点相同。毛泽东从农村出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成功。邓小平探索改革道路,也是从农村出发,积累经验,然后推广到城市,进行全面的改革。显然,邓小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改变那些过分集中的旧的体制和机制来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解放生产力是革命性变革这一点而言,这与毛泽东是一个哲学思路,但却又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内容。前者是解决革命道路问题,后者是解决改革问题。两者的内涵不同,因而呈现出阶段性。对哲学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的不同,以及哲学思考的侧重点的不同,也显示出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相异的阶段性。

第三,邓小平哲学对毛泽东个人晚年在哲学观点上的一些错误应用作了纠正,并且在纠正晚年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些失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使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从哲学上来说就是把对立面的斗争看成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加以强调,走向了极端。再如,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也只片面地强调了两者的对立性一面,而对两者的同一性、转化性的一面在毛泽东晚年的认识上忽视了。因此在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失误。又如,强调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本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贡献。但是,毛泽东到了晚年,把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夸大到无条件的决定作用,一味地想通过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量,其结果事与愿违。所有制的不断变革,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了晚年毛泽东在哲学观点上的诸如上述错误,因而发展呈现了阶段性。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邓小平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关系是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两个应用发展阶段。具体地说,邓小平哲学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结晶、并且是正确哲学理论观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这里丝毫不排斥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

三、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祖宗没有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毛泽东将中国古代

成语首次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明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问题,因而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在毛泽东那里,“实事求是”有三重含义:一是思想路线,二是思想方法,三是思想作风。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说明不同对象时表现不同涵义。邓小平讲实事求是也有这三重涵义,但在思想路线的意义上讲得更多,更为突出和鲜明。

(一) 对“实事求是”思想作新的哲学概括,提到过去从未有过的理论高度,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将会十分深远

邓小平从三个层面作了哲学概括:

一是从毛泽东哲学层面讲:“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

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层面讲得更多:“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②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③。“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④。

三是从马克思理论层面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⑤;还说过,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⑥。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⑦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思想从这样三个层面上都作了高度评价,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最后归结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不能不说,这样的概括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意义异常深远。能否说,它的意义与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与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并为我们的感觉所反映,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都属于同一个级别的贡献。这是可以研究的。“实事求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②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468 | 这四个字可以言简意赅地覆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的基本思想。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哲学功勋。

（二）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在一起，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科学的完整概括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个概念本来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毛泽东没有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对解放思想也没有进行科学定义，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敢想敢干”，就是胡想蛮干，因而又有不实事求是之嫌。这样，它们之间，往往被看成是一种对立关系，即要解放思想，似乎就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似乎就不应当解放思想。

邓小平的一个理论功绩在于对解放思想作了新解，并使它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构成了党的完整的思想路线。

对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是把它作为实事求是的动态表现形式来认识的。例如，他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②“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③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这个认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那个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他就已经明确指出来了。“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④。这实际上不就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概括吗？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过去人们把两者对立起来，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认识也不应该是静态的凝固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强调要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摒弃陈旧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所以思想解放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为了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也是为了实现这一认识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解放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可分割的整体。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实事求是。因此,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强调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在开拓中进取”,因而,“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上,而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变化的新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十四大报告概括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条就是讲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理论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三) 把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联为一体,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的提出是重新建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贡献

《历史决议》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是一个颇具匠心的新颖概括。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个结论包括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并且是对其相互关系的科学阐释。它不仅说明了这三个基本点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的特殊作用,而且还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这三点作为“活的灵魂”加以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具体理论的精髓、灵魂。这个概括发展了党的七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70 | 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四) 把实事求是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再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威力

从宏观上说,最突出的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既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批判了“两个凡是”;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肯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这解开了提出“两个凡是”的党的领导人难以解开的“死结”,也可以说是解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在70年代面临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它表现了邓小平哲学的超人智慧。这个解答对于党和国家的安危、对于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二,根据实事求是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邓小平哲学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在这里,实事求是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的思想的全过程。

——首先对历史教训的总结。邓小平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①这就是说,过去的教训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实际,许多政策脱离了中国实际,许多工作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那么中国的实际是什么?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基于历史教训,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有了正确认识。他说:我们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是对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定位,也是对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宏观把握。

——从制定政策来看,依据仍然是实事求是原则。邓小平说:“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②

——在推进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邓小平说：“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①

——最后，对于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还是归结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些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②

论列以上思想不难看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思想烂熟于心，运用自如。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思想，经过邓小平把它成功地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第三，根据实事求是思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哲学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关于“一国两制”，早在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举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明确地加以概括，并取得了成功。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中得到启示，呼吁用这种构想解决国际斗争问题。这在世界上受到欢迎。邓小平也把这个构想的提出归于实事求是。他说：“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③如果这个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④。

实事求是思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任何人都懂得它，但是不一定能够正确地运用它，也不一定能够运用得这样广泛。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把这个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从而成为了一个威力无比的伟大法宝。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从来未有的成就。

四、邓小平创造性地应用辩证法思想提出的新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虽然没有撰写辩证法理论的专门学术著作，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异常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472 | 丰富。如他所说,“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①。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他都善于把辩证法应用于各项工作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过“要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对他的这句话十分欣赏,多次在党内的干部中加以倡导。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的最后,毛泽东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更是显现出辩证法大师驾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超智慧和能力。他对辩证法的创造性的应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表现了他的辩证法思想的特色,同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有重大发展。

邓小平对辩证法的应用是多方面的。他的辩证法思想的特色也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着重介绍这样三点:

(一) 邓小平把辩证法思想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体论”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状况是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和全部工作的中心。为了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破除长期形成的那些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以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同时,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一些经济形式,都可以试验。在我们国家,由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实行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不可能搞成功。事实上,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的成分仍未丧失其存在的历史理由,因此也可以允许有一定的发展。这样,经过改革调整后的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他非社会主义形式作为其补充。这就是邓小平创造的社会主义主体论。邓小平所讲的这个社会主义主体表现在许多方面。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实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允许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在分配形式上,也不再是单一的一种分配方式,而是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包括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甚至剥削收入。

以上是从经济制度看。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再从政治制度看,随着香港的收回,“一国两制”成为现实以后,我国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为主体,在少数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两者将长期并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再看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就重申了“双百”方针。在文化艺术方面提倡“主旋律、多样化”。这是社会主义主体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社会科学发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同时允许各种学说包括唯心主义进行争鸣、研讨。这是社会主义主体论的又一种特殊形式。

“社会主义主体论”实际上是相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纯粹论”而提出的。表面看来,这种不纯是“杂”了,不像社会主义了,但实际上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形式,也是继续前进的基地。一些同志感到困惑、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应当对它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邓小平对于这种情况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

对于经济制度上的主体论,1984年6月他说:“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它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①又说:“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②到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他还继续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占四分之一。“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③。

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主体论,邓小平也谈得十分明确。他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74 | 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①还说:“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这个构想为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②

“社会主义主体论”的确是个前人未曾说过的新构想、新语言。从哲学层面来看,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就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主体论”涉及对立面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过去对于两者的对抗性、排斥性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主体论”,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排斥性的前提下,又认真地看待两者的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这是提出它的哲学根据之一。“社会主义主体论”,在哲学上还涉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一与多等多重关系。邓小平正是应用这些哲学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提出这个理论的。这个理论最明显地体现了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在应用它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的内容。

(二) 邓小平应用辩证法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别,认为它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这似乎已成为不可改变的“铁则”。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如他在对1984年10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评价中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③

那么,这个理论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从哲学上说,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结果。在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换句话说,对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为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两个方面。同样地,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形式和运转机制能不能进行分解呢?市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1页。

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天生的姓“资”呢?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就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①这些话是从政治上讲的。从哲学上看,那就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分解,它不是天然的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来说,“市场经济”是普遍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个别”、“特殊性”。

在1985年以后,邓小平又多次思考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②到1990年12月,他讲得更加明确:“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③这些政治语言的哲学涵义是什么呢?从矛盾论来说,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主要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是个别而不是一般。市场还是计划,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属于普遍性、一般,因而不决定是姓“资”还是姓“社”。它只有在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后,才具有某种特质,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④

到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问题作了进一步理论概括,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⑤在这里,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及作为市场经济重要运行机制的证券、股市这些东西都看作是“反映社会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看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这就是说,它为人类社会所共有。把这个意思翻成哲学语言,就是地地道道的“普遍性”、“共性”,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任何社会都可以利用它。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当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76 | 可以利用它。这样,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我们党搞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的必然了。因此,这个理论的创立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应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成功的范例。它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三) 邓小平运用辩证法思想,强调正确处理社会的各种关系,制定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策,以期求得社会整体的协调、全面、健康的发展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是经济唯物主义,只抓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不抓其他,因此造成社会的失调、失衡,出现种种问题。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没有任何根据的。

的确,从社会现象看有这样那样的不少问题。但这主要是工作中的失误,不是指导思想、不是邓小平理论的问题。从邓小平的指导思想来看,他十分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规定为三个方面,即富强、民主、文明,或者说是这三者的统一。他一方面认为,通过改革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也认为,经济的增长应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统一起来。早在1979年10月,他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谈到广东的发展时还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为了求得社会整体的协调、全面、健康的发展,邓小平要求处理好社会的各种关系。他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③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第一,他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政策。

——关于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关于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①

——关于民主法制。“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②

——关于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的谈话中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③

——关于改革开放与打击违法犯罪。“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④对于抓这两手，邓小平讲得最多。他从1982年4月一直讲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整整10年。这是社会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最关心的，并反复强调的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⑤

这些“两手抓”，从哲学上讲是什么思想？邓小平自己说了，这就是“两点论”。他在1989年6月接见北京的戒严部队讲话时说：“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⑥

从上述六个方面的“两手抓”来看，说明邓小平对“两点论”应用得十分广泛，可谓“得心应手”。至于出现“一手硬、一手软”有多方面原因，与我们的不少负责同志对邓小平的思想、著作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领会得不全面也有关系。

第二，提倡全局、大局观念，要求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478 | 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搞建设，毛泽东都强调全局观念，要求全党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邓小平也是如此，始终强调全局，服从全局。他还在50年代前期兼任财政部长时，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全体与局部缺一不可。但以什么为主导呢？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一定要以全体、中央、集中统一作主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肩负着处理党和国家各种重大问题的重任，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最突出的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是要有全局观念，从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作出决策。他在组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进行传、帮、带时，曾指出：“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①还说：“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②

二是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从全局、大局出发作出的。例如：

——拨乱反正时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③

——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④

——关于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多次强调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⑤这方面，军队的同志深有体会，减员100万，紧缩国防费用、装备开支都是为了这个大局。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关于沿海与内地发展的关系。“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 | 479

——处理雇工、“傻子瓜子”这类问题,邓小平前后讲了三次,都是讲服从大局这个道理。1987年,他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②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从许多方面讲过这个问题。从大局、大道理这个角度,他在1985年5月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③

——关于不要突出宣传他个人。他在1989年6月向第三代领导作政治交代时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④

——关于培养接班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⑤

这里列举了8个方面。可见,这是邓小平考虑问题作决策的一个基本观点。江泽民在1996年的纪念“七一”的讲话中不是要求培养“高素质的干部”吗?素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1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480 | 高不高,有没有全局、大局观念是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依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促进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发展的还是不发展的,这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之点。认为这个发展采取什么形态,是只承认渐变、量变,还是同时承认巨变、质变;是直线式还是波浪曲线式,这也是两种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区别。邓小平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去作哲学论述,但他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应用于改革和经济建设却显现出异常突出的特点。

邓小平把唯物辩证法发展观应用于改革,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部分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彻底抛弃了“平均主义”的旧观念。这个政策的提出,对于人们长期形成的旧思想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政策在最初提出时,人们难于接受。当然,在实行过程中也有若干偏差。人们看到的,不少人不是通过勤劳并守法致富,而是钻政策空子或巧取豪夺的各种不正当手段致富的。这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可以依靠法律和政策来纠正。就这个大政策本身而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它是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让那些劳动多、技术高、成就大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先富起来。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看,它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因为在我们这样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里,全体社会成员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速度共同富裕,只能经历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体质变,这样一个不断扩大逐步提高的过程,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政策是邓小平应用辩证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策。

邓小平把辩证法的发展观应用于经济建设,就是在 90 年代初,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过去基础差,又耽误了许多时间,现在周边国家的发展,使我们感到有压力。因此,经济的发展总的说不搞快点不行,但这个快又要适度,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地发展。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他在 1991 年 8 月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①台阶式发展模式的提出,是对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创造性运用。从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7、375 页。

过去几十年经济工作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动荡不稳定之中,这主要是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的。怎样把由于失误造成的大起大落的动荡曲折与客观运动的波浪式加以区别?很不容易。一个时期的舆论正是利用“波浪式发展”来为错误进行辩护的。邓小平提出“台阶式发展”方式,就使经济工作可以利用这个规律来调整发展速度。这有助于避免认识的片面性。这是邓小平把辩证法应用于经济工作的一个创造。

五、邓小平创造性地应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的新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揭示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重要贡献就是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认为“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后来的一个失误也正在这里,即把“一定条件之下”的主要的决定作用加以绝对化、无条件化,企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如在高级社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又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时候,他的兴奋点、着力点、工作重点,也在生产关系上。他说过,对于生产力问题,他是门外汉,他的主要精力是抓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变革。这种倾向在合作化运动后期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得相当充分。从理论上讲,这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晚年毛泽东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这在党的八大已作了决议。毛泽东也同意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基本精神,尽管对个别提法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将开展反右派斗争作为一个正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进行总结,推翻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随着“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后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发展生产力不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样,不能不使我国在长达

482 | 20年的时间内经济发展缓慢、动荡、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得到应有改善。工人和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拿相当低的工资;农村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下述五大理论,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

邓小平也用过“首要任务”、“主要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第一个任务”等提法,这都是一个意思,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①还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②

邓小平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切中要害的。虽然我们党在主观上不想搞贫穷的社会主义,但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事实上,搞得不富裕,“不够格”。针对于此,邓小平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③。邓小平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把发展生产力提到这样高的位置,并以这种表述方式来界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是个重大发展。这样的概括符合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不仅符合,而且在理论上表现其罕见的彻底性和坚定性。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既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要研究生产力内部的要素。马克思在分析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和19世纪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它对生产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科学。”^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②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这个贡献,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③正是根据这些,邓小平十分重视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他先后提出了三个著名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一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爆发被打倒以后,在1975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当时,他指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针对“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科技工作的严重破坏,明确提出这个观点,还强调科学技术人员是劳动者,科学研究应当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

第二个观点,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复出工作时提出的。那个时期,他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因此,他发展了1975年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④这个论断包括了新的历史内涵,是对近几十年的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肯定。

第三个观点,是在1988年开始提出的。在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邓小平继续密切注视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党的十二大把科学技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科学技术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1988年9月,他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星期后,他继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⑤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5页。

484 | 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①

邓小平的这三个观点是我国实行科技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从哲学上讲，他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内部要素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第三，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革命”的观点。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一是靠生产力的内部要素的发展，如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动其发展；二是靠生产力的外部条件的变化来推动其发展。这个外部条件也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由于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就要不断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晚年毛泽东的失误，除了在哲学理论上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的决定作用无限夸大之外，在实践上，没有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作具体分析，指出哪些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哪些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需要改变的。比如，他不断地改变所有制形式，由小集体到大集体，由大集体到全民所有，这样的改变就错了。按照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除了在个别地区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外，绝大部分地区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是把不该改变的改变了。再如“文化大革命”，由于党内矛盾、国内社会矛盾，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实行全民夺权，砸烂“公检法”，这同样也是把不应否定的上层建筑否定了，因而带来了全国的大混乱，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

但是，从这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缓慢、长期停滞和动荡来看，确有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是那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那些不符合广大群众利益要求的方针政策。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并且把它视为一场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由于这些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各种具体体制极为顽固,改变起来极为困难,而这种改革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意义又极为深远,实际带有“解放生产力”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①,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②。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他的思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③“讲全了”,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制度实际上承担着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双重任务。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说,更加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认识。从哲学上说,它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四,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观点。

“生产力标准”的概念是党的十三大作的明确概括,但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已提出来了。这是我们党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应用于制定政策、确定方针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邓小平在1962年讲的,后来广为流传的“猫论”,就是“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形象化描述。他提出,恢复农业生产在生产关系上采取什么形式,要看它是否能够比较快地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个说法有什么错误呢?这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的原理的具体化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这个观点污蔑为实用主义,这正暴露了他们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面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拨乱反正,纠正那种长期以来脱离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评判改革是非的错误观念,邓小平不断宣传“生产力标准”这个唯物史观,并逐渐地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在1979年,他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④在1980年,又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486 | 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①1983年,他又提出“三个有助于”标准。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②1987年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是否正确时,他又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③到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则提出了大家知道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的路子是否正确,“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扩大了“生产力标准”的外延,深化了它的内涵,进一步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了。这在实践上更有助于体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在理论上则把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两条原理或两个最根本的观点有机地统一在这种实践形式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性质。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

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他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时反复地讲,最根本的教训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就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在指出这是一个根本教训的同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四五月间,他在强调解放思想时就提出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问题。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⑤这以后,他讲社会主义的多方面的任务和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不同的方面,但他讲得更多的还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条。到1986年9月,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13页。

致富。”^①1990年12月,又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有了这样长期的思考和这些思想的积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这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这是他反思10多年的理论成果。它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新概括,也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再认识而得出的一个新思想,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不难理解。因为它同对这个问题的传统讲法很不一样,完全是新的内容。

说社会主义本质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它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如传统讲法的那几个要素,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这些要素虽然能说明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传统讲法的缺陷是根本不提生产力,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怎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呢?不仅如此,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完全割裂开来,离开了生产力孤立地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素,这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缓慢,屡屡失误,原因很多,但不能不说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也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纠正了这个理论失误,彻底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作了区别,有助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研究。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大缺陷是将本质与特征不加区别而混用,传统讲法的几个内容实际上是论列的社会主义特征(有时也叫“本质特征”或“基本特征”)。其实,本质与特征不是一个层面的范畴。在辩证法看来,“本质”是更为深层的东西,“特征”是“本质”的外化、表现和要求,即使是“基本特征”也如此。就“本质”而言,按不同标准划分,也是分层次的。如果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属于列宁哲学范畴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88 | 更深刻的“二级本质”，那么相比之下，“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若要讲成“本质”，至多也是列宁哲学范畴的不甚深刻的“初级本质”。这个“初级本质”从另外的标准来看，实际上就是“特征”。这样，将“本质”与“特征”加以区别，有利于端正和强化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这种区别，从哲学上说，有利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研究。

第三，它矫正了“老祖宗”对社会主义的个别不正确认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

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认识，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提出的，后来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思想。现在看来，这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相符合，也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实践的要求尖锐冲突。凡是搞改革的，都对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作了某些改变。因此，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不再提计划经济了，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进步。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体现了这个特点，邓小平的科学著作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作为哲学是一种方法更体现了这个特点。学习邓小平哲学，研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哲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不断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写于1996年8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兼谈“西柏坡精神”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的本意和广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94年底，中宣部牵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他层次的这类讨论会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但如何认识这条道路的起点，迄今仍有不同意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也不必独尊一说，应当百家争鸣。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产生不同看法，恐怕有一个对历史起点的理解问题。理解不同，对历史起点的界定也就不完全一样。首先，从本意上讲，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当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多次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①还说，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②。这些话的意思已很清楚。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490 | 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在这时开始具备雏形。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已规范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这条新道路的许多“中国特色”逐渐地全面展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为这条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它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为这条新道路作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论证:既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这条新道路逐渐形成的十二个基本理论观点,又明确地把党探索出来的这条路线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作了科学总结。它不仅对反映这些年来历史经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体系作了新的概括,而且把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称之为是继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这就既高度评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又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因此,从本意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不会有任何疑问,也不应当产生任何歧见。

但是,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成熟之后,无论是思想理论观点、历史文化,还是科技发明,往往要去追根溯源,研究它的演变进程究竟是从什么开始的。例如,报载湖南大学号称千年历史,说岳麓书院是它的前身。乍听起来,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为湖南大学建校于本世纪20年代。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其主要理由是湖南大学所在地的岳麓书院建于宋代,那时的书院相当于近代的大学,故湖南大学称有千年校史。这就是一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这样去分析问题,认识其渊源,弄清来龙去脉,从中探索一些奥秘,从研究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意义。我认为这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不是从本意上,而是在广义上解释事物,即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把它扩展了。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是不是可以往前追溯呢?当然是可以的。

这两年流行一句说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成于邓小平”,大家都很清楚;“始于毛泽东”,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始于毛泽东”的“始于何时”怎样认识?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始于1956年八大前后。理由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的思想。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暴露出来。鉴于苏联历史经验,从《论十大关系》起,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意识也异常明显。毛泽东 1958 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照搬苏联经验(不是全部),经过一段建设实践,特别是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出来之后,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从 1956 年开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八大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有不少相似之处。1956 年八大前后的探索,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新道路的前奏曲。所以一般说始于毛泽东,是始于 1956 年的八大前后或《论十大关系》,这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头的追溯方法。

另一种看法则是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追溯到西柏坡。理由是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甚至更早在 1948 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党就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当然,那时的思考远没有像 1956 年八大前后的探索初具雏形。也可以说,与 1956 年八大前后的探索还不在于一个层面上。但是,后来的许多思想可以从这里找到根子。打个比喻:长江号称世界第三大河,有 6 000 多公里长。讲长江,一般是从四川的宜宾到上海流入东海这一段,宜宾以上不叫长江,有金沙江、大渡河等多种叫法。长江号称世界第三大河,绝不是从四川宜宾算起。如果那么算,长江就没有那么长。长江 6 000 多公里的长度是包括它的源头的。过去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麓。前不久的一份资料又说,西藏的一个湖泊才是长江真正的源头。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就把长江加长了 1 000 多公里。我们追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到 1956 年是一段,可以成立;再往前,又追到西柏坡,也不能说不能成立。如果成立,这可谓源头的源头。显然,这两种追溯思维都是从广义上考察的,而不是从本意上讲的。这样的认识方法,它的内涵就有了变化。

二、“西柏坡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溯到 1956 年八大前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有如上述,我不反对这种看法,并认为作这种探索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里,着重阐述另一种观点,即把历史源头追溯到西柏坡(包括在这里召开的上述“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认为“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可以并行不悖,不必非此即彼。

为什么说西柏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492 | (一) 三大战役与三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促进了革命的重大转折。周恩来曾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几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指解放战争的这场战争,还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国战争连绵不断。就外敌入侵说,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国内,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还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后,革命人民才夺取了战争的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当时还没想到和平时期有多长,现在看来已有40多年了。这就是说,这个转变结束了109年的战争,已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且在可以见到的本世纪末或更远一点的将来,不会有新的大战争,世界性战争不可能发生。我们中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局部动乱的可能性,但像过去发生的军阀混战,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这个伟大转变发生在西柏坡,是应当充分认识它的意义的。

再一个转变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还在1944年6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已把应否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提出了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他甚至指出:“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①此后,形势发展极快,中央作了进驻城市的准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斗争首先就是争夺城市。那时,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还在延安,没有回到各个根据地。在这个新情况下,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帮了很大的忙,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动用美国飞机,把林彪等送出去,后来到了东北;邓小平等到晋冀鲁豫,回到太行。解放战争打了两年,特别在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大城市的问题犹如风卷残叶,势不可挡。既然如此,党的工作重点就不能不着手转移。毛泽东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因此,他还指出: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就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过去革命 28 年,搞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说: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①。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发展生产事业不能不成为全党首要的中心的的工作。所谓“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这三大转变带有相应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同向的。实现这几个转变,为以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前两个转变都顺利实现了,后一个转变不很顺利。建国以后就已经开始搞建设,大规模的全面性的建设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着手进行。对这一点,中共中央思想上是明确的,如 1956 年党的八大所宣布的。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党的认识有很大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提出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不能不说,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转变,为党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二) 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分析与目标设定

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只占 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 90%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党的任务就是使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0 页。

494 | 我们的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设工业国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从根本方向上说，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回答了我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还可以追溯到党的创立。党的纲领，在一大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直到七大，都还长期停留在理论阐述，属于理论认识王国中的问题。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 1948 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 8 个问题，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专门讲了我国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基础差，属于国家经济的这一部分数量很小，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今后要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还要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利用它，又要有所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因为 1948 年九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在 1958 年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 1953 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析是对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

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党预计需要 15 年左右时间，结果是提前了，1956 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国情选择的道路。应当说，这也属于“中国特色”，而且是最早的、带有根本性的“中国特色”。因此，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从选择根本方法和道路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就是要宏观地看历史。就广义言，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最初胚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在现阶段,简言之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前面已指出,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现在追根溯源,能否说在西柏坡,在1948年九月会议和1949年七届二中的全会上,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或者说它是处于胚胎状态呢?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党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这在七届二中全会是明确的。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得像现在这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而不反复,“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

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西柏坡也明确了。邓小平在1979年作“四个坚持”的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①。把“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个“一贯”的起点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这一条不成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着重讲了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方向这一条,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一般以为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最早提出的,其实是在九月会议上明确的。这年6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了在今天的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的8条的第3条,就已规范地表述我国的国体是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指出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他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出那么多丑闻,搞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西柏坡,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明确为我们党的指导方针。经过延安整风和第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全党形成共识。在西柏坡,毛泽东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压力,提出不要与马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496 | 列斯平起平坐,马列是主干,我们的东西是枝叶。所以,当时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划掉,不作宣传了。但七大决议在那里,七大党章有明文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疑问。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建国后,“四个坚持”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思想,当时没有,这个不能含糊。但如果不讲本意,泛意上的改革思想那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50年代中期以后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西柏坡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随后提出“一边倒”的政策,但这不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分析问题是不是牵强附会呢?不是的。首先明确地肯定了,从本意上讲,当时没有现在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是追根溯源,从广义上去理解,上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胚胎,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研究“西柏坡精神”,应当放宽视野。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此。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源头的分析,是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的。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这样的分析,可以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揭示得更丰富些。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的现代化道路。”^①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值得继续挖掘。这也应当成为立足于中共党史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视角。

三、执政党建设与两个“周期率(律)”现象

在西柏坡时,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执政问题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指能否巩固胜利,它关系到党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两个务必”,强调执政党建设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对于共产党执政的考验一直到今天还存在。80年代以来,党还面临着新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形势更加严峻。在西柏坡时,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敏锐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其实,“糖衣炮弹”还仅是一个方面,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更重要的还不是“糖衣炮弹”的考验,而是权力腐蚀,这对党的威胁和危害更大。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②现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是蜕化变质了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这些人掌握权力后忘乎所以,忘记了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问题,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的完全是非共产党的勾当,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的气味。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改革开放关、市场经济关,也就是说没有跳出黄炎培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现象(尽管它的本意有具体内涵,但人们已在泛义上使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498 | 它了。这里也讲的是泛义上的)。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个别想一般,这些人的腐败,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党的前途的忧虑。

这两年来,我想,“周期率(律)”现象恐怕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对共产党执政考验的问题,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说得严重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要使国家富强,这是对的。但后来又认为群众不可太富,对富裕之后存在忧虑。所谓“富了事情就不好办;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就反映了这种忧虑。“富变修”,更是这种忧虑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富裕对立起来了。这在理论上是不合乎逻辑的,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如果社会主义与富裕不能兼容,社会主义就没法搞,只能是贫困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那还有谁把它作为理想去追求?为它去奋斗甚至献身?事实上,贫穷的社会主义是站不住的,最后非垮不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努力改变国家的贫困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普遍提高,正在由温饱状态向小康状态迈进。那些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十分富裕的先进典型,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与富裕是能够兼容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的方面,谁也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现实生活的另一面,也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富裕之后,还能不能艰苦奋斗,不断进取,保持一个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在看来,尽管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侈、拜金主义泛滥,许多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的丑恶现象都滋生出来了。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朝另一个方向发生的变形或扭曲。目前,这虽然是局部性问题,但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周期率(律)”现象。

这两个“周期率(律)”现象的存在,都说明社会主义的路很艰险。邓小平和陈云都曾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说:建设艰难垮容易,“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这实际上是对全党的政治性嘱托。执政关、富裕关,一代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79—380页。

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闯过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主义的江山照样会得而复失的。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将来能不能最终完满解决？现在还不能打保票。对前途应当讲两句话：一是充满信心，二是存在忧虑。所谓两个“周期率(律)”现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两个腐蚀，即一个是权力腐蚀，一个是金钱腐蚀。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这两个腐蚀在起作用。要解决党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

四、弘扬“西柏坡精神”与社会主义事业万古长青

既然“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丰富，那么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也不能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路线上讲，弘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坚持以“西柏坡精神”作为探索源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来说，在现阶段，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改变，不能动摇。对这条基本路线动摇了，改变了，发生逆转，我们国家是个什么状态就难说了。这里确实存在着“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我们要高度警惕扭曲和逆转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潮。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这里也包括“西柏坡精神”不能丢，包括“西柏坡精神”的这个重要内涵不能丢。

从共产党的建设这个角度讲，那就是要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必须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包括江泽民最近多次强调的“要讲政治”的教育，继续探讨如何走出两个“周期率(律)”现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对第一个“周期率(律)”现象，毛泽东有明确答案，就是靠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方面的监督机制，把党放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把党的领导层放在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之下。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遗憾的是，他没能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地坚持民主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现实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很大距离。在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干部制度和领导制度)还不那么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产生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特别是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思想，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对于探讨解决第一个“周期

500 | 率(律)”现象是会有启发的。

对于第二个“周期率(律)”现象,这是毛泽东看到了的,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的有些观点不很正确;另一方面也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包括要解决这个“周期率(律)”现象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穷的,但其“左”的指导思想却使他不认为有那么穷,引发了“富变修”的忧虑。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实际上就成了认为穷也会“变修”。显然,这是说不通的,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这些思想都包括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已有所躁动,就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匡正时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教育。邓小平说,前几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想也包括这个方面。

我们要不断加强教育,使党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党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不断追求进步这样一种革命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就国家来说,既要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又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真正做到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葆青春。也如邓小平说:“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②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 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要准备革命转变，夺取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中心城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①历史的发展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11年后，中国共产党果真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八大召开的36年之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进行过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100多年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过去革命取得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为基础，进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目前的中国正在进行这场伟大的革命。

党的八大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进行的这两次伟大的革命是什么关系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党的八大是可以成为这两次伟大革命的交汇点的，但是

^{*} 这是作者1996年9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502 | 后来历史的发展拐了个弯,使这个可能性没能变成现实。这里,试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召开八大的 1956 年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坐标上

对于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个时期人们比较感兴趣于 1956 年以后。1956 年后的几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很沉重的,应当反思作为借鉴。但是,1956 年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上也有重要地位,同样应当加强研究。从研究八大来说,它更具有不可替代性。

从世界范围看,在 1956 年至少有这样三件大事对于八大和党的其他决策产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是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冷战态势。冷战没维持多久,出现了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热战”,一打就是三年,最后还是不得不转向“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世界格局向有利于和平方面转变。1954 年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说明反对战争、和平共处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人民的强烈愿望。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的走向渐渐显露出来。这为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八大召开的重要外部条件。

二是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潮流。战争是科技发展的催生婆。在二次大战中,用于军事目的的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二次大战后,用于和平目的的科学技术飞快发展。作为这个时期新科技发展重要标志的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带动了一大批新兴产业的涌现。各种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和新设备的争相面世,为生产力的飞跃开辟了从未有过的宽广前途。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革命性变革,并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使资本主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得到调整、恢复,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这种环境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新科技革命的潮流,1956 年 1 月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制定了 12 年科学发展规划。这对于八大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

三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斯大林领导苏联的党和国家长达近 30 年之久,在工作中有很大功劳,也犯有严重错误。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面对战后的新形势提出一系列新的国际国内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了苏共二十大的文件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于同年4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长文,一方面对苏共二十大的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决策给予肯定评价;另一方面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倾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文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现象,主要应着眼于吸取教训。从苏共二十大召开获得的正面效应,对于中共八大的召开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国内情况看,至少也有三个因素对八大的召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但自1955年下半年反对右倾保守、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和声势迅猛展开。到1956年6月,全国加入农业合作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1.7%;个体手工业者加入各种合作化的占其从业人员的90%;私营工业已有占产值99%和占职工总数98%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私营商业也有68%的户数和74%的从业人员实现了改造。这意味着三大改造的任务已超前许多年基本完成。它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造工作中由于急促加速的缺点和偏差遗留下许多问题;二是它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这为党在八大作出国内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基本依据。

其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建设方针的制定。在1955年下半年反“右倾保守”的高潮之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但是,随着反对“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的凝重,在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到1956年4月,已形成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盲目发展,造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总数增长过快、生产秩序混乱、资金供应紧缺、货币发行量剧增,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紧张的局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受到严重影响。为扭转这个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从1956年初就开始进行反对急躁冒进的斗争。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5月中央会议讨论的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宣传政治局会议精神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

504 | 论。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盲目冒进的势头得到了遏止。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实际上成为召开八大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第三,执政党建设的良好态势。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到1956年八大召开前,全国有党员1073万,比七大增加8倍;比1949年全国胜利时增加2倍。这就是说,90%以上党员是七大以后入党的,60%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新党员。这既壮大了党的力量,同时又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对于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两个“务必”^①的思想和警惕“糖衣炮弹”的告诫。新中国成立后,为吸取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克服已经产生的腐败现象,先后开展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处理和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揭露,对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和统一起了警钟长鸣的作用。这为八大的召开提供了较好的党内氛围。

1956年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坐标上处于什么位置?有哪些特点?这无疑可以从这样那样的视角进行分析。但上述几点,对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来说,起了难得的好作用。这是八大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做出好的和比较好的决策,开成求实、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的重要的客观基础。

二、八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②这里讲的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就是后来十四大概括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说,八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已胜利完成,八大实际上担负着总结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任务。

^① 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八大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关系,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一) 八大是第一次伟大革命 20 年连续辉煌的鼎盛时期

第一次伟大革命从建党到八大历时 35 年。其间,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前 14 年,虽然有过大革命时期的辉煌,但却连续遭受两次严重失败。特别是王明路线在中央长达 4 年之久的统治,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不仅丢掉了经过艰苦卓绝斗争开辟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去进行“长征”,而且在“长征”中还屡遭挫折,红军力量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长征,局面大为改观:不仅迅即摆脱了前堵后追的被动,打了一个又一个振奋军心的胜仗,而且克服了像过雪山草地那样的巨大困难,实现了三大主力的会师,胜利到达陕北,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自此以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由挫转顺,由危转安,由小转大,由弱转强,取得了连续 20 年的辉煌胜利。

先是首创抗日战争的辉煌。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全民族要求抗日的历史机遇,果断地实行战略转变,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经过 8 年英勇抗战,中华民族取得了自 1840 年以来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是这次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并且通过抗日战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这次辉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强大政治力量,为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创解放战争的辉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顺应广大人民的愿望,力争同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合作,努力实现和平建国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做好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准备。毛泽东在七大结束时讲了 17 个方面的困难,就有这个意思。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初,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确实非常困难。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到第二年由战略上的防御转入进攻后,局面很快扭转过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第三年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加渡江战役,打得那样漂亮,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原来国内外朋友都担心我们打不赢。我们党对胜利充满信心,并准备打 5 年的战争,结果仅用 3 年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奇迹。

三创建国初期的辉煌。从建国到八大的 7 年间,国民经济的恢复,经济建设的成就,社会面貌的变化,同二次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相比较,都属于前列。新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中国人民从未有像这几年雄赳赳、喜洋洋、高昂地抬起了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差,但是多少年梦

506 | 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毕竟建立起来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这样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变革而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和生产力的破坏,这本身就称得上历史的惊人之笔。

召开八大,就是对发生在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的连续辉煌胜利(当然,主要是七大以来)进行总结。八大的总结本身也是辉煌的。邓小平指出:“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①八大是第一次伟大革命连续20年辉煌的顶点。

(二) 八大前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经历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周扬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曾讲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观点,即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想,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这三次可能是“最大当量”的(请允许我借用化学的爆炸力概念来形容)。若要讲“次大当量”的,还有一些。比如,在周扬所说的二、三次之间,还可以再加八大前后由于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引发的一次。

为什么说八大前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引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呢?延安整风那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王明路线,破除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强调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怎样革命的思想路线问题。建国以后,怎样搞经济建设?没有实践经验。当时是两大阵营格局,在外交上倒向苏联一边,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就只好照抄照搬苏联的。这样就在不少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建设中的教条主义。但是苏联的情况,无论其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基础都与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即使成功的经验搬到中国来也不一定成功,何况苏联经验中还有不少明显不合适的。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种情况,在斯大林去世后虽然有所改变,但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后,才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重新思考。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除认为捅了娄子,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外,还认为它揭了盖子,表示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在1956年3月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①半年之后,在八大期间,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更加明确。他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够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对外国朋友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是压倒一切的,现在打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于各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

毛泽东、周恩来所讲的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在当时的报刊上虽没有作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对于党的指导思想所起的这个作用却是实际的。它不是抽象地存在于理论分析中,而是具体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的各个方面。这里仅举数例。

比如,我们熟悉的《论十大关系》,不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直接引发的巨大成果吗?这篇讲话充满了解放思想的气息,体现了独立思考,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情况来办事的精神。它批评了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②的陈旧观念,对国内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关系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再如,人们知道的在八大之后的1956年12月,毛泽东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如何搞活经济的问题。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允许雇工,让资本家开设私营大厂,让华侨来投资,订个条约,20年、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可以国营,也可以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段议论就是从批判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太早讲起的。这就是思想解放之果。尽管随后没有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但这些话至今听起来还是振聋发聩。刘少奇的想法比毛泽东还明确。他在这年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可以批准。“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③第二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还说: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实际上现在在某些方面社会主义比私人资本主义落后。只要我们去掉这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③ 《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508 | 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的名声又好,靠这样多的优越条件,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社会主义就一定会竞争赢资本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①这些议论,尽管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挥的,但是所触及的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40年前,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说不是思想上的很大解放吗?

因此,不应当低估这次思想解放的作用。可以不可说,没有这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我们所知道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那些探索?我以为是可这样说的。当然,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规模性、持续性和深刻性上,与那三次不完全在同一个层面上。但是在党的历史上,这毕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 八大前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有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它在七大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继续发展。

当然,八大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存在党内有什么争论的问题。事实上,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就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对此,在一些干部中难免发生疑问。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起草了一个通知(经毛泽东修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传阅后发出),对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后一句话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正是根据这样的精神,10个月后,即1955年10月在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八大新党章的修改稿初稿中,已经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了^②。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一再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包括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胡乔木在生前有一个解释。他说: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那时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提毛泽东思想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② 齐德平：《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若干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①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即使斯大林去世后也是这样。从大局出发,必须搞好与苏联的团结。这在当时是首先要考虑的。因此,有10多年的时间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了,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在八大时期没有发展。事实上,在八大前后,包括八大本身,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比如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思想理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 and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等,就是在这个时期或提出、或得到丰富与发展、或加以总结与升华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陈云、董必武、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八大的发言,以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八大党章,是这个时期体现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有较大影响的文献。肯定以这些为代表的文献对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不是说就只有这些文献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不是说这些文献就没有缺陷,但从总体而言是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的。

纵观毛泽东思想在第一次伟大革命中发展的历史,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也呈曲线状,而不是直线上升式。对于这种曲线状,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一是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是毛泽东本人的语言。它是有别于列宁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时使用的“螺旋式上升”说法。它的优点是“中国化”,更为通俗、更加形象,更能为中国人所理解。二是将水平曲线的高位部分称为“高潮”,如发展经历了几个高潮云云。这是波浪式的另一种说法,为了突出“浪尖”状,将其改为“高潮”,更具恢宏气势。三是将水平曲线的高位部分称为“高峰”。这是将曲线由“水”状改为“山”状的一种形象的表述法。所要说明的那个实质没变,只是将“潮”形换成了“峰”形。前两个月,在研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我试着提出一种“高原”说,即想将“高峰”形改为“高原”形。所谓“高原”,顾名思义,即不是单个高山,而是高山群体;也不只是一个尖尖的山峰,而是大面积的突出“峰”状。或者说,它不仅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510 | 高度,还有广度、长度,其三维空间优于“高峰说”。如果将空间坐标置换成时间坐标,那么经历“高原”需比经历“高峰”的时间长,更能说明持续过程。

我以为,就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曲线而言,它的高部形成的是两个“高原”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一“高原”,就是延安时期。其代表作,仅举毛泽东个人,就有哲学、军事、政治、文艺等诸多方面的一大批名著。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核心的其他成员,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展开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而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历经10年左右,形容为“高原”也许比“高峰”更合适一些。当然,取“高原”说,并不排斥其他表述。上述几种形容法,可以兼容。取哪种说法,与研究者的语言习惯很有关系,这不是重要问题。如果把延安时期或者说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视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一“高原”,那么,从建国到八大前后,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二“高原”。作为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大架构,在七大已经明确了。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怎样进行革命并夺取胜利的理论政策、战略策略。建国以后,随着实践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也在发展。到八大前后,就形成了上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思想理论。这就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原”状。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二“高原”。这是第一次伟大革命在八大时期的巨大理论收获。与革命实践的辉煌相同步,也展现出了理论的辉煌。

三、八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

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现在看来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从历史的走向而言,这个起点很有可能是1956年的八大。有谁能料,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大曲折,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那么,应当怎样认识党的八大与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关系呢?我以为,主要表现为下述四个方面: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从《历史决议》到十三大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它明确了我国经过这些年的建设之后所处的历史方位,为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带根本性的依据。提出这个理论,蕴含了对几十年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也有许多思想的孕育和积累。根据这个理论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于何时呢?也就是说,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不在别处,正在八大。因为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阶段的历史界碑。社会主义改造的超前完成,虽然表现了一定的急性病,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①,但是毛泽东在当时毕竟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作了严格区分,这又表现了理论上的清醒。

毛泽东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就是进入了,你说还没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是不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②按照传统标准,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就意味着是社会主义了。当时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国都在敲锣打鼓,隆重庆祝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超越这个传统标准。尽管他对召开大会宣布、举行隆重庆祝这样的具体做法不一定赞同,但他不能不对这个为之长期奋斗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感到异常兴奋。庆幸的是,他在兴奋状态中发表的上述讲话,对后来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留下了很大余地。至于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要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是陷入了超越阶段的一种狂症,另当别论。毛泽东在1956年初对社会主义的进入与建成作的可贵区分,也为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留下了理论余地。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③毛泽东当时讲的进入社会主义,准确地说,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八大作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界碑,自然成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尽管它没有能够成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起点。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参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主要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换句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简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简称。这条路线的内容无疑有一个丰富、完善的过程,到十三大作了规范性的表述。但是,它的基本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就已事实上存在了。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在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③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512 | 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指导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①这也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形成情况。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提出有无历史的参照呢?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八大及其前后的正确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②就邓小平来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就是从恢复八大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来提出问题的。在被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呼吁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也体现了对1956年八大前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回应吗?他要求努力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高级干部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不使我们感到回到了八大的那个历史氛围吗?他提出的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了重申《论十大关系》和八大制定的一些政策。随后,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讲的“四个坚持”和提出的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等,既包含了八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中的思想,也恢复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科学思想。从理论认识上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内容,就是从恢复包括八大时期、而且主要是八大时期的正确思想起步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从恢复和继承建国以来特别是八大的路线和政策开始向前推进,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超越。《历史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③这既是为八大路线恢复名誉,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八大路线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关系。胡乔木在关于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讲话起草情况的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2页。

说明中指出：“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政策基本上没有超出《论十大关系》的范围。政治上也都是按照毛主席在八大提出的去做的。”^①这也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因素

八大前后，在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之后，对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探索。那个时期的实践，有如上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在理论上则为后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孕育了思想胚胎。

这里不妨就八大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获得的思想认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一些方面的极其概略的比较。这种比较丝毫无意要论证邓小平理论在八大那时早已有之，只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好的和比较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即怎样被继承而又怎样得到发展的关系。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之后经过七大就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中国自己的路，这个指导思想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从《论十大关系》开始的探索就是明确的。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对这条思想路线进行了分析。后来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同八大时期的思想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在八大时期没有。但是当时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还是有一定认识的。毛泽东从哲学角度谈论过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要分阶段的意见。到50年代末，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当然，这些思想都没有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八大对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有了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毛泽东甚至说过，我们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可惜，这些好思想没有坚持下去。

^①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514 |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在八大之前,周恩来提出过初始形态的四个现代化思想^①。这个思想写进了八大的党章。在八大以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三个现代化,随后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思想。这个时期也有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的安排,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现代化的基础,第二步是用10个至20个五年计划来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到80年代前期,这个“两步走”的设想在邓小平的思想里进一步明确起来。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战略就是以这些设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以及综合平衡等思想,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论十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讲经济体制改革。八大时期在这方面进行的许多探索,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前奏曲。刘少奇在1957年春天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思想,已模糊地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关于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改革构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起了有力的准备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八大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强调大会发言对工作要有批评,自我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没有生气。八大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对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八大也有一些改革设想。毛泽东已明确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在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只当名誉主席;取消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已在中央的考虑之中。和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有了相当基础。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吸取了当时的许多好的思想。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及其内涵的规定,在八大时期没有。但是,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和要求在那时已经有了。从文化教育层面说,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

^① 周恩来在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的四个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随后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思想道德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思想、道德、文化、纪律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在那时已摆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这是我们党一贯强调的。八大政治报告有专门一节就是分析政治保证问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关于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被视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当然,它的内涵是随着后来实践的发展而更加丰富和深刻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我们国家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形成某种封闭的局面。但是在八大时期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八大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表明了思想文化的开放政策。八大就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大会。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从经贸还是文化的交流看,也是一种开放态势。至于外交,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1954年已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八大政治报告及其决议,都强调要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为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在八大的三个报告和许多发言中,在毛泽东那时的讲话和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讲得还是比较充分的。当然,那时的思想内涵没有后来丰富和深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经验对这个方面也作了很大发展。

关于祖国统一的构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造和统一祖国的政治战略。但是,这个构想的基本内容在八大前后已经有了。在1955年,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问题。从1956年开始,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所松动。八大召开前,周恩来提出可以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八大开过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继续搞“三民主义”。后来又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就是对这些思想胚胎的继承和发展。

上述比较无疑是欠全面的。一是进行比较的内容不可能在较短的篇幅里作更为周到、缜密的分析;二是有相当重要的内容没作比较,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因为当时没有;三是为了说明历史渊源,比较时着重讲两者的连续性、继承性一面,而对后来的发展和飞跃一面讲的较少,但这里绝没有要贬低和否定这一面的意思。前面的定位交代已很清楚,这种比较是说明“历史因子”,而不是“因袭历史”。

516 | (四) 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干部的历史准备

从七大到八大,党的地位、任务和成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需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中央比七大中央扩大了一倍多。它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方面的优秀领导干部,经受了后来历史发展的严峻考验。从组织路线方面说,八大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相适应,在组织路线上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并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其中许多都是八大时期的重要领导干部。

八大为第二次伟大革命所作的干部准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备了核心成员。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惊心动魄的斗争,但仍然是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转变。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党的八大得到了充实。在酝酿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时,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期间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就设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发表了谈话,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推荐邓小平和陈云。毛泽东说,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他本人说不行,“我可以宣传宣传”。毛泽东宣传邓小平的优点,连着讲了七个“比较”好,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说他不行,我看行。”毛泽东还把邓小平同他本人相比较说:“邓小平不是没有缺点,也不是样样事都办得好,但是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①。对于陈云,毛泽东的评价也很高:“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毛泽东还特地指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②

毛泽东为什么向全党推荐邓小平和陈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呢?除了有上面的那些优点,还因为“他们是少壮派”,“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在他看来,多几道“防风林”,“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③历史的发展正

^{①②③}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像毛泽东所预料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其他成员“见马克思”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陈云鼎力相助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即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大为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奠定了难得的基础。

第二,为第二次伟大革命准备了大批高层领导干部。在酝酿八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时曾规定了一个提名原则,即主要是提“三八”式以前的干部,“三八”式干部一般不选。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开幕的会上对选举中委讲到,这次选举中委,“三八”式一般不选。“三八”式确有大批优秀干部,但牵连太多,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说服他们,让他们等几年,这样他们更成熟,更孚众望。现在还是让“三八”式以前的什么式的掌一下中央委员会的权。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用“名落孙山”的典故开导一些同志说:我们这个名单大概只管到20世纪。“也许是孙山以内的人将来起很大作用”,也许“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即名落孙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①。根据已确定的原则选举的中委,绝大多数是“老资格”。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许多人故去,个别人上了林彪、“四人帮”的贼船,有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八大中央委员,据不完全统计,占八大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候补中央委员的,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二。他们在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进入了高层领导,或在中央,或在地方,都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就是那些没有被选进八大中央委员会的“名落孙山”的“三八”式的优秀干部,在第二次伟大革命中也纷纷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同那些“老资格”一起,成为推进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中流砥柱。他们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巨大历史作用。

四、八大的不足与两次伟大革命没能实现交汇的历史原因

充分肯定八大的历史地位,并不等于八大没有缺陷。邓小平指出:“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②。这就说明,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八大、研究八大。

从建国到八大仅仅7年。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较多地来自于马列本本的概念和苏联模式的经验。虽然有一些实践经验,在

^①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18 |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之后也有过一些新的观念、新的设想,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新的政策,但是其中有的或不完整,或不稳定,因而不能没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比如,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在正确地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又将这“矛盾的实质”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表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讲,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都有些滞后性。只有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提出要生产力去适应生产关系变化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可能跑到生产力前面去。讲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发生矛盾,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规范表述。从毛泽东个人的思路看,他历来认为生产关系需要不断调整,甚至进行变革,不存在一种生产关系已很先进了,只需等待生产力赶上去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这种情况。在他看来,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是既相适应,又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不断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八大决议的这个理论表述的疏漏,当即被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提出了批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应当指出,毛泽东在当时只是批评这句话有毛病,并没有反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精神。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八大虽然肯定了知识界的进步,认为它“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①,但是它不仅没有重申半年多前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而且仍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这个认识的变化又成为半年多后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根源之一。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八大虽然提出了扩大民主和健全法制的任务,发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方面的最强音,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认识,未能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当作战略目标,因而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薄弱环节。

八大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困难、曲折和艰险,远没有像在七大时那样对于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困难程度有充分的认识,也缺乏实际的经验。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一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八大认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后,“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①。继续存在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解放台湾;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这就表明,八大对于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的范围、性质、特点及规律缺乏明确的认识。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远比八大的这种认识复杂得多。随后发生的国外的匈牙利事件,特别是国内的大鸣大放后引起的政治波澜,完全出乎党的领导人的意料。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直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与非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党对于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于突发事件作了过度反应,不仅认为国外和国内的突发事件都是阶级斗争,而且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与国外的阶级斗争相呼应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于国内的突发事件既夸大了大鸣大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成分,又夸大了阶级斗争成分中的敌我矛盾比重。这样,党的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就发生了逆转,在八大时以为基本结束了的阶级斗争,这时看来远没有结束,而且还需要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大鸣大放问题。到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完全地否定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肯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又是一个突发事件,也作了错误反应,进一步强化了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并把它引入党内。经过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这个观点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样,1956年的八大路线实际上就被否定了。

二是关于经济建设问题。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但并没有同时否定经济建设是党的主要任务,而且认为在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之后,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就毛泽东来说,他从来没有像在1958年那样全力以赴地抓经济建设。但是他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方法却坚持自己的一套。八大前确定的反冒进方针,他是不满意的,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右派扩大化后,他以所谓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口实为由,重新提出发展速度问题,并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批反冒进。毛泽东认为,不仅建设要加快,大干快上,超英赶美,而且可以大搞群众运动。他批评反冒进说: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抽象地讲,毛泽东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问题在于经济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520 | 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确定,而不能仅凭主观的良好愿望来规划。无论搞工业还是农业都要依靠群众,这也是无疑义的,但是首先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处理政治与技术、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不能只强调这一面,否定那一面。毛泽东大批反冒进,恰恰是这种历史效应。特别是它造成的那种政治氛围,产生的那种政治压力,实际上是把本人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批掉了。八大确定的关于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因而也被否定了。在三年“大跃进”运动以后,面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尽管提出了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但始终没有再肯定八大,要求回到八大的路线上来。

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两个问题,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后长期困扰着我们党。不能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及其关系,是我们党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但是应当说,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错误认识,主要是受以往经验的困扰而得出的。自中苏大论战、国际共运大论战展开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时论战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是否是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究竟有无阶级斗争?等等。这就不能仅凭经验,而要去找理论根据。各方都到马列著作中去找理论根据。为了压倒对方,证明自己的“正确”,就难免对马列著作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理解。我们党也有既把马列著作(特别是列宁的著作)中的某些论点教条化,又作了某些曲解的问题。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的理论根据,反过来强化了原来的错误理论观点。最初,接受斯大林的观点,我们党持“小过渡”论,即进入社会主义以前是过渡时期。这以后逐渐地转变为“大过渡”论,即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按照“大过渡”论,在这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都是主要矛盾。这样,原来的凭政治经验而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观点,到这时就有了“充足的”理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它具备了似乎更为完整的理论形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八大路线不仅被彻底否定,而且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在九大、在十大大加挞伐。这种情况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才得到根本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八大路线被恢复,并得到了巨大发展。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洪流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地展开。

怎样认识这段历史的曲折呢?一般地讲,谁都希望历史直线发展。就毛泽东而言,他懂得历史的发展是“之”字形。建国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希望搞社会主义比搞革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就是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他还说:“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 error,不要像革命

所犯的错误的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呢?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①但是,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走向和运动轨迹。其曲折,不是人们想避免就能避免的。掌握了规律,“之”字形的曲折可以小点;不认识规律,“之”字形的曲线则是大号的。两次伟大革命在八大交汇的可能性没能转化成现实性,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起点后移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与主观因素有密切关系,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又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就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实际上是处在幼年阶段。

说中国共产党在七大时期就成熟了,并不等于说成熟以后就不犯错误。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成熟的,也不等于说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是成熟的。事实上,那时的实践主要是民主革命的实践。说是成熟的,主要是指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当然,也有一些上升到一般的理论和方法。搞社会主义,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党来说,是陌生的、不懂得的东西,哪里谈得上什么成熟!这样,在探索实践中就难免不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

历史的发展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搞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曲线,同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的曲线有如“似曾相识燕归来”。研究历史最忌讳将历史简单类比,但科学的比较却有助于发现和深入认识历史现象。我们党搞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曲线,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第一次胜利是1924年至1926年的北伐战争。接着就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后来三次“左”倾路线的接连统治,特别是王明路线,使革命遭到惨重失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有如前述,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这以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曲线是什么状况呢?从建国到八大,前已指出是个辉煌时期。“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②如同遵义会议对民主革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民主革命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民主革命的规律。八大以后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同样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同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发展也

^①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22 | 很相似,都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长时期的辉煌。为什么会出现曲折和重新走向辉煌呢?也都是一个道理,即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由必然王国逐渐走向自由王国。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辉煌与八大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不仅恢复了正确的政策,而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①这就是说,如同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在走向成熟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走向成熟。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成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这个问题上成熟了,碰到新的问题又不成熟;这一代人成熟了,新一代人会自然成熟吗?不一定。这里没有“遗传密码”。因此,仍然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

现在,我们党正面临着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这个世纪之交,也要将继承和发展了八大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向下世纪交接。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嘱托。要实现这个嘱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以史鉴今”,吸取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深刻教训。纪念八大,研究八大,就是要认真总结这个教训,不断增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相聚研讨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我们也一定能为实现这个目的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和1997年第1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前期的党史^{*}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几位伟大人物的主要历史就是党的历史的一个“投影”。他们的活动对党的历史走向起着主导作用,构成党史的主体内容,是“党史大厦”的顶梁巨柱。同时,他们还对其亲历、甚至参与决策的许多重大历史活动有大量的叙述和评说。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党史人物之一。他那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与党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集他的著作言论之大成的《邓小平文选》3卷对中共党史有丰富的论述,其中不少著作和谈话就是直接讲述党史的。一代伟人谢世,作为党史工作者,纪念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的思想,努力开创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局面。本篇着重介绍邓小平对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即1949年至1978年)这段历史——我们权且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期的历史(这种称法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的一些论述,并谈点学习的体会。

一、邓小平论建国后党的历史分期

我们不妨拉开历史的广角镜头,从邓小平对整个党史的分期谈起。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邓小平对党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评价,认为党的发展在很长时间比较顺利,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犯过这

* 本文原为作者与薛钰、高远戎同志共同署名的。

524 | 样那样的错误,但“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对党的历史怎么分期?邓小平虽然没有像党史学家那样作专门论述,但他的观点是明确的。他关于党史的一系列谈话,实际上是将党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这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特别是从1935年开始,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经过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赢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第二个大的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的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国家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这29年,党走过的道路也很曲折。一方面,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犯过一些大的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邓小平总结这段历史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①

第三个大的阶段,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正是相对于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言,故称上一阶段为“前期”)。这个时期通过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系统总结,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它的“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将党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在党史界不会有什么异议。把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党史第一个大的阶段和第二个大的阶段的分期界限也不会有任何异议。这个界限是个不争的事实,长期得到了公认。目前存在的不同看法是,关于党史第二个大阶段和第三个大阶段划分的界限。一种认为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另一种认为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里涉及的,既是第二个大阶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的历史下限,也关系到把哪一个事件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起点,即第三个大阶段的上限,其实质是对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作为学术问题,这两种意见可以继续切磋探讨。但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十分明确。通过反复学习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的论述,愈益深刻地感受到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贯性、执著性和鲜明性。

邓小平对这两个阶段历史分期界限的看法,是以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辟党的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起点的方式来提出的。他的有关论述非常多。

——早在1979年3月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他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各方面的成绩后就指出:“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①(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1984年10月,他同德国外宾谈话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②。

——1986年4月,他同南斯拉夫外宾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③

——1987年4月,他会见西班牙外宾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还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28页。

526 | 在这些论述里,邓小平不仅反复地强调了历史界限的分期为什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明确地指出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起点的根本原因。这实际上也说明了他关于这个阶段的历史下限的看法。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9年党的历史异常曲折,许多事情极其复杂。邓小平亲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了解许多重大事件的原委,因而对这段历史的论述很多。他在总体上对这段历史作了肯定性的评价,并从许多方面加以论证。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获得从未有过的统一,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建立起了包括代表各个阶层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基本上解决了10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同时,邓小平也毫不讳言党所犯的错误,认为几经折腾,干了不少蠢事,使人民受到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在1988年谈到建国后的历史指出,“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对近十年的发展是比较满意的”^①。这里讲的“后十年”、“近十年”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属于社会主义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前期的历史来说,就是“头八年”和“当中那些年”。邓小平对这些年头,分别都有许多论述。

二、邓小平论建国后的头八年

邓小平对建国后的头八年(有时也说前七年)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非常的满意。他说:“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②

邓小平对建国后的头八年,至少从10个方面做了具体论述,即讲了10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69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成就。

一是认为“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①。这是肯定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二是高度评价了抗美援朝战争。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当时的中国,内战刚结束,困难很多。美国是个庞然大物,相比之下,中国的装备差得多,力量很弱。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②

三是肯定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认为最初在执行政策时有“宽大无边”的毛病,大大打击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后来纠正这个毛病,群众的积极性就高起来了。实践“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就要脱离群众”^③。

四是肯定了土地改革运动。认为在农村进行的这场斗争“干得很好”^④。

五是肯定了将丑恶现象一扫而光的社会改革。在旧中国,吸毒、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很严重。建国初期进行社会改革,对这些丑恶现象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邓小平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⑤。

六是肯定了建国之初的调整工商业政策。他认为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通过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表现出来;实行“调节劳资、两利兼顾”的政策,对资产阶级达到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纠正了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并说,“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⑥。

七是肯定揭露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没有错。邓小平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高岗、饶漱石进行广泛的阴谋活动,是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⑦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528 | 八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提倡建立互助组 and 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把资本家所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这个改造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将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他还指出：“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急了一些。”^①甚至讲：“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论。怎么理解这段话呢？我们认为，邓小平指出合作化搞快了，是从“搞得更好一些”的要求来总结经验教训而言的。联系他对合作化问题的所有论述，都不能说这里寓有否定合作化的方向的意思。上述意见是在1980年5月讲的。其实，前面引述的肯定合作化的论述也是在那个时候讲的。到了1985年，他继续肯定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③。

九是肯定1956年的工作。邓小平在1957年4月到西北视察时就对1956年的工作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说：去年一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④

十是在总体上肯定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国头八年的主要历史内容，归根结底就是干这件事。邓小平肯定这一点，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⑤

建国后的头八年是党的历史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如果说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有过1924年至1927年上半年的大革命和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的三度辉煌,那么这就是党史上的第四度辉煌,也是建国后党的历史的首度辉煌。 | 529
研究党史,特别是建国后的党史,应当深入揭示它的历史内涵。

三、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其他党史书中也叫做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邓小平简称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这是建国后党的历史最曲折的一段。其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同错误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反复多次。邓小平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基本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①这是他在起草《历史决议》时讲的意见。后来的《历史决议》对这一段的评价正是根据这个意见写的。有种看法,说邓小平没有讲过“成绩是主要的”,这不是事实。

邓小平对这十年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关于党的八大

邓小平明确了“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②。这是在党的十二大讲的。在1956年召开八大一次会议时,无论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还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都没有讲八大路线问题。有同志据此认为,不存在什么八大路线。从党的历史看,许多次代表大会都论及了大会的路线。八大前后的七大和九大也都讲过大会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一直在讲路线。八大没有讲,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但是八大没有讲,不等于不存在八大路线。邓小平的肯定,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问。

既然肯定有八大路线,那么八大路线是什么?八大决议讲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30 | 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可以视为对八大路线的一种表述。邓小平在八大闭幕后不久也曾说过：“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②这实际上是在讲八大路线。其实，邓小平在1982年的十二大回顾八大历史时是这样讲的：“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③这段话本身就再明白不过地概括了八大路线的内容，也可视为对八大路线最简洁的表述。

邓小平还指出了八大路线没能贯彻下去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这就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④。这个“思想准备不足”是什么意思呢？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不仅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比预想的要快，而且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也比预想的快得多，即仅仅只用了7年时间。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可能知之很多的。在那时，党也想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突破一些固定观念，但终究未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困难、曲折和艰险，远没有像在党的七大那样对于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困难程度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当后来的历史出现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时，或踌躇满志地去开辟新局面时，在那样比较封闭的环境下，更多的是援引历史的经验。但是，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等各种矛盾，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远比革命战争年代的事要复杂得多。即使过去的某些成功的经验，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正是面对这样一些新的问题，八大以后没能解决好，八大的路线没能得到坚持。从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在那时实际上还处在幼年阶段，要求不发生一点曲折不太可能。但是，大的、严重的、长时间的曲折是应当努力避免的。

（二）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前期，这是议论颇多的一个问题。邓小平也谈论较多。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他始终坚持认为：“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①

邓小平是怎样解释这两句话的呢？关于“必要的”，他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②

显然，这里讲的必要性，不是任何别的必要性，就是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可避免性。是否不可避免呢？这就要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建国初期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在50年代中期有没有这股思潮和这股思潮泛滥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反击和以什么方式反击，以及反击到什么地步等一系列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主要是在波匈事件后，我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政治动向，对于当时的党来说，很难不认为是一种阶级斗争。在1957年春夏，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呢？就是从目前来看，也很难说完全没有。问题在于对整个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错误估计，采取了过度激烈的错误反应。其实，就一种政治思潮而言，不是在一个短的时期就能消失的。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在国内就会有这种思潮反映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思潮也不能说停止了。那时以为采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给数十万人戴上政治帽子，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决策不可能不产生严重的后果。

对于“扩大化”，邓小平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③

所谓“打击面宽”，是指即使按照当时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来看，也把大量不是右派分子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了。运动的范围，从最初的高等院校、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扩大到地县市区、大厂矿企业，及至中小学职工。这样的“打击面”怎能不“宽”呢！

如果说“打击面宽”，是讲“扩大化”在“量”上的表现，那么“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则可视为从“质”的角度来讲“扩大化”。这里既涉及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532 | 定性,也涉及对其处理发落等问题。本来最初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后来则认定为敌我矛盾性质。既然如此,在组织处理上就加重了。凡戴上“帽子”的,轻则降级留用、在本单位劳动改造;重则或开除公职、开除学籍,或劳动教养、下放监督劳动等。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则一律开除党籍、团籍。这场政治运动使数十万人受到严重伤害,乃至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许多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忠贞的同志和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接受了历史教训,一方面坚持同错误思潮开展长期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明确宣布不搞政治运动。邓小平在1981年7月讲到思想战线的状况说:一些地方发表的错误言论,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对于这种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①。这或许就是他讲的“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②的一个内涵吧!

(三) 关于1957年下半年以后的“左”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前期29年里,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的。邓小平对此论述很多,不可能没有重复。如果要作点分析的话,就其侧重点而言,大致有这样几种说法。

——就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的时间起点言,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③

——就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与八大路线的关系言,邓小平认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④“左”的终点,在有的地方又说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就错误思想的状态言,有一个渐进发展过程。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⑤这说明“开始抬头”和“占了上风”应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有所区别。所谓“占了上风”，即是错误的指导思想或指导思想的错误发展趋向占居主导地位。

——就错误思想的表现形态言，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①

——“左”的错误的内涵是什么？邓小平也说得 very 明确：“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这是就“左”的错误的总体而言，至于具体的表现形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问题上也要作具体分析。从后面的介绍可以看到，邓小平是作了这种分析的。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左”，最突出、最严重的表现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可以说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全局上第一次“占了上风”。邓小平对这个时期“左”的思想的严重发展及其造成的比反右派斗争更为严重的危害也都有具体论述：

一是指出了1957年“左”的错误同1958年“左”的错误的关系。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又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③这里既说明了1958年的“左”是全局性的，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1957年的“左”不是全局性的错误的基本道理。

二是指出了1958年“左”的错误的特点、内容和后果。邓小平的以下几段话比较集中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④通过这些论述不难了解，说1958年“左”的错误是全局性的，不仅在于政治上“左”的发展导致了经济上的“左”，还在于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看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左”的政策，一方面要求生产力实现不可能真正有的超高速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25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13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115、234页。

534 | 展,另一方面使生产关系的变化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因而带来了大灾难。

三是指出了“左”的错误发生的反复。1958年“左”的错误到10月发展得愈益严重。从11月起,党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纠正一些“左”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①。这一过程直到庐山会议前期。只是在彭德怀写了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信以后,庐山会议风向的变化,才标志着“左”的错误重新占了上风。在开展反右倾斗争以后,“左”的错误愈演愈烈。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开始,“左”的错误进一步扩展到了党内斗争。庐山会议后期的八届八中全会,就是它的集中表现。邓小平论及这段历史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②连续3年“左”的错误,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困难时期。

(四) 关于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调整

这是在这个曲折发展的10年中比较复杂的一段历史。一是头绪较多,二是又有反复。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也涉及许多方面,这里着重介绍他的这样一些论述:

(1) 他从总体上勾画了这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这就是三年困难,经过三年调整,才使情况有所好转。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③

(2) 他高度评价了调整时期的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决策。在农村政策方面,他本人曾提出过,生产关系的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为群众所接受,就采取哪种形式的思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肯定了农村人民公社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在工业政策方面,他曾主持制定过工业七十条。他认为,“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当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页。

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①基本建设方面的调整,是那时具有决定性的一项调整措施。邓小平肯定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②这样一些重大决策。在科学技术方面,邓小平肯定了当时中央关于发展高科技的决策,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③在政治关系的调整方面,他曾主持过甄别平反工作,主张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他认为,当时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与党一起共同克服困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应当指出,这一时期重大的调整政策和决策,毛泽东在许多方面不仅表示赞同,而且作了很大努力。邓小平也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历史作用。他说:“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④

(3) 他盛赞人民群众信赖党,顾全大局,是克服困难、顺利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就指出,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是我们党的五大优点之一。他说:这些年来,我们跟人民讲清道理,“人民,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爱国民主人士也好,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都是相信跟着党走是对的”。因此,“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⑤。在1979年国民经济进行新的调整时,他谈及这段历史说: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党“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⑥。直到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他对那段历史还充满了怀念之情。他说:“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⑦

(4) 他指出了调整时期的实际上属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种发展趋向的变化。调整时期,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以前,党的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比较协调一致。七千人大会后,党的领导人在对形势的估计和一些重大调整政策上的不同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95页。

②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536 | 见逐渐显露出来,及至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党的指导思想的两端趋向则在不同领域并行发展。在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趋向再次抬头,愈益严重。在经济建设领域则继续贯彻正确的调整方针。到后来,错误的发展趋向压倒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叙述这个历史过程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①。他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②

四、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十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犯错误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使党本身、整个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本人深受其害,两度被打倒。他一生中的“三落”,有“两落”就在这段时间。这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着重讲了这样几点:

(一)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

邓小平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认定为“左”的极端,极左。他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又说:“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③

二是称为一场“灾难”、“浩劫”。

“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④——这是就经济的损失说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1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①——这是就政治的危害而言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②——这是一个总的概括。

三是叫做“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③这是16年前讲的。现在看来，确系如此，毫不过分。这段历史是不应当淡忘的，更不应当模糊。

（二）关于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疑应负主要责任。毛泽东的一大错误就是重用林彪、“四人帮”。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罄竹难书。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粉碎“四人帮”也已20年有余。历史证明，《历史决议》对他们的罪恶活动的分析和国家专门法庭对他们的审判是站得住的。邓小平对他们的论述着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有政治野心，“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④

——林彪、“四人帮”“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⑤这实际上是思想领域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⑥这既是讲他们政治反党，也是讲他们组织乱党。实行“帮领导、帮统治”，必然垮台。

——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从“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⑦。这是1975年讲的。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1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30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12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141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538 |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直接管军队,被丢掉了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

——“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①这是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对江青的看法时讲的。若论林彪反革命集团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也伤害了很多人。

——“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②这方面的损失,无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所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本身就有林彪、江青所起的坏作用。何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直是推动运动朝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方向发展!因此,说由于他们的干扰,国家的发展耽误了10年,并非言重。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③。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的孽何止这些?仅此,就足以说明他们是全民族的十恶不赦的罪人。

(三) 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

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他提倡的“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④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个问题还是在被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的。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一批冤假错案。这就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明确表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⑤这是后来起草《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邓小平是怎样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阶段的呢?

首先,强调要客观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文化大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命”造成的恶果,邓小平已作了有如上述的分析。要科学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还不能不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对领导者主观动机的重要影响。当然,领导者的主观动机也是由许多因素综合构成的,但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动机应当是明确的。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①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肯定这一点,就不可能对毛泽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不可能科学地历史地看待“文化大革命”。

第二,强调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要认定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一定要充分肯定成绩,缺点、错误要严肃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②

第三,强调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抗争力量。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错误的理论和路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形式、各种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争。尽管它不是完整地体现在某一个代表人物身上,但却自始至终有这股力量存在着。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影响较大的一次抗争。邓小平谈及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要作分析说:“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③

第四,强调对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要作全面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实行支左、支工、支农,搞军管、军训,即“三支两军”,是当时迫不得已的一项措施,后来有不少遗留问题。怎样看待“三支两军”的作用,在一个时期议论纷纷。邓小平明确表示,关于“三支两军”问题,只讲一句话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④

第五,强调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外关系有重大突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是错误的,没有什么需要肯定。但是,这不等于说在“文化大革命”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540 | 间没有做一件好事。就对外关系而言,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二是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恢复了中日外交关系;三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受到热烈欢迎。这三件事影响巨大。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①这方面成就的取得,是游离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本身的逻辑的。肯定这些,并不意味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某些肯定。

第六,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党?这也是一个时期议论的热点。一种看法认为,那个时期党不存在了,并否认召开的党的重要会议的合法性。这是把党犯错误同党的存在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了,即用对党的价值判断来否定党的存在的这个事实;也把党的具体组织存在与否,同党的总体存在与否这样两个问题混淆了,即用属于特称判断的一些事实来否定属于宏观的全称判断的总体事实。邓小平明确指出,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他还指出:“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②

(四) 关于 1975 年的整顿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二起”。这一起也是大起。先是受病重的周恩来之托主持国务院工作,接着又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也就是如周恩来所讲的,他已经全面地负起责任来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逐个领域地进行整顿。对于整顿的性质,邓小平实际上认为,它是“反前启后”,所谓“反前”,就是他说的“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所谓“启后”,一是他讲的“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的意思;二是包括他讲的“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的内容。^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30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255页。

整顿充满了同“四人帮”的尖锐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表现在具体事情上,就是“风庆轮事件”、《创业》电影事件、《园丁之歌》湘剧事件等等。这个斗争表现在思想理论上,邓小平着重批判了“四人帮”的两个口号,一是“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一是“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口号把贫穷与共产主义画等号,把四个现代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集中地表现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邓小平说:“四人帮”“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①这次斗争的结果,代表进步的正义的力量受到了挫折。如邓小平说:“我又被打下去了。”但是整顿“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因此,“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②这次群众运动“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③。

1975年整顿是对党、对国家、对军队的一次思想总动员。整顿——“批邓”——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这是中国政治舞台在一年时间发生的急剧变化,两种力量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整顿,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凝聚了力量,指出了方向。

五、邓小平论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前期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前期29年,历史的内涵极为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邓小平除对上述几个时期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外,还对人们关注的几个党史评价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一) 关于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

曾几何时,这17年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线”,还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被叫喊得震天价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直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这个斗争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后来扩展到各个方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段时间,不少人对这个问题还心有余悸。

邓小平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25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542 | 折,有错误。”他在另一处也说:“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①。尽管具体表述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意思。对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问题怎么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有过“黑线专政”的批示,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纪要”材料。在粉碎“四人帮”后自然成为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邓小平明确地否定这个“纪要”,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是他的主导思想。“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②邓小平的这个分析,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决了一个党史难点。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持基本肯定态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十分赞赏那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他多次指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广大青少年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出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③

(二) 关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达20年之久的“左”

对于这20年的“左”,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讲得较多,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前后几年讲得更为集中。邓小平对于20年的“左”的起止时间,在表述上没有完全统一,有如前述,是两个说法。一是讲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有时也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④二是讲从1958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20年。这两个说法的起止时间略有不同,但内涵是一个“左”,这是明确的。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如何看待这20年的“左”成了热门话题,并对相关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楚邓小平所讲的具体内容,并要作完整的准确的理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2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64页。

第一,邓小平对这20年的“左”是作了区别的,即将其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前10年是“左”,如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后10年则是“左”的极端,极左。如说: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云云。这个区别符合历史实际。前面介绍邓小平对这两个时期的看法,也说明他是作了区别的。因此,不能将这两个10年简单地混同,即可以说20年的“左”,但不能说20年极左。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不能忽视。

第二,邓小平认为这20年的“左”对国家的影响很大。他着重讲了这样一些意思:

——就中国社会的发展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在另一处还讲,“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②。这都是从总体上讲的。他还具体指出,在这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③。

——从世界的变化看,他说:这20年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拿科技来讲,“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④。

——从引出的经验教训说,“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⑤

这些论述,把20年的“左”的主要后果及其历史教训讲清楚了。

第三,邓小平还指出,对这20年“左”的认识也不要绝对化。他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⑥

这是从科学技术方面讲的。在其他方面做的好事和取得的成就,在前面介绍的他的一些论述中都已提及。邓小平是以科学的态度来辩证地看待这20年的,体现了他的辩证的思想方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②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116页。

544 | (三) 关于两年徘徊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两年,是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历史的最后两年,史称“两年徘徊”。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本来应该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那时,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无不有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喜悦之感。人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多么希望中国的历史能够尽快地掀开新的一页!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失望了。国家变化之缓慢,历史前进之艰难,与遭受10年灾难的人民的渴望和企盼相差太远。在这两年内,尽管也做了一些事,但一些重大的政治性决策不得人心。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有一种压抑感,甚至窒息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又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①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路线问题没有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邓小平对坚持“左”的错误的“两个凡是”有很多批评,认为它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在世也不会赞同。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总结历史不要仅仅着眼于个人的责任,更要注重社会历史根源的分析。根据这个思路来看,“两个凡是”也应当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这就是“‘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②民主革命时期的“左”的影响姑且不论,如前所述,仅建国以后的“左”从1957年算起就达20年之久。况且这个“左”,又与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紧密相连。要弄清楚这个复杂的历史是非,抛弃沉重的历史负担,非是短的时间所能解决的。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解开了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领导人不能解开的历史之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③这样,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为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走出两年徘徊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今天回头来看走过的历史之路,这两年在路线上的“徘徊”也许是难以避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1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347页。

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和路线是对立的 | 545
两极。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要从奉行过10年之久的一种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并去相信另一种新的认知体系,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巨大、太剧烈,没有一段历史的过渡和缓冲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年“徘徊”,从历史的角度讲,实际上是起着这么一种特殊的作用。回顾党的历史,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大转折,往往都有这么一段过渡作为缓冲。例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即从打日本到打内战这个转变也很剧烈。作为历史,这两者之间也有一个缓冲阶段,这就是从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近一年的过渡时期。再如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不是也有一个“三年准备”时期吗?因此,从党在建国后的历史来说,这两年“徘徊”实际上又起着从社会主义前期向社会主义新时期过渡的特殊作用。这可能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就此而言,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不当单纯消极地看待“两年徘徊”,还应当转换视角,给予它一个客观的认识。这是遵循邓小平的辩证的历史观应当引申出的逻辑结论。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修改)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 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党史是我们党的最新历史。如果说在这之前,邓小平还只是党的历史的重要亲历者和参与者之一,那么在新时期,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则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最主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当然,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不是某个杰出人物的意志能够完全决定的。但是,杰出人物参与历史的“杰出”作用,毕竟能够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

凡搞党史的都认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党史难写。不能说,这没有道理。这里有许多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尽管我们身在其中,许多事天天经历,说明某些问题的历史现象能到处捕捉,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也“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要说明历史的全貌,探究历史的原委,揭示历史的本质,既需要历史沉淀,也需要研究者作历史的反思。这都需要时间。当然,这也不是说新时期的党史就无法研究了。可以研究,总有第一个“吃螃蟹者”。即使不马上去动手,也需要作多方面的积累和准备。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把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论述弄清楚。邓小平担当的历史角色与这段党史的关系太密切了。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党史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论述,对于理解这段历史的进程,研究这段历史的发展,是太重要了。如何评论历史是非,那

^{*} 本文原为作者与薛钰、高远戎同志共同署名的。

是研究者的权利。但是,了解邓小平是怎样论述的,这是绝对必要的。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们就此作点尝试性的工作。由于新时期近20年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邓小平的论述也很多,有的广为人知,有的专有论述。这里着重介绍他对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论述,对有的问题谈点我们学习的体会,以与研究者们切磋。 | 547

一、邓小平论《历史决议》的制定和十二大的召开

说“文化大革命”是场大灾难,不仅是乱了党和政府、乱了经济、乱了社会,而且还乱了人们的思想,敌我颠倒,是非混淆。拨乱反正,既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就涉及对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怎么看。一个时期,无论社会上还是党内,思想异常混乱,各种议论纷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不断地对历史是非作了认真的清理。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关方面的各项政策。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①。接着,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这个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有明确规定^②,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③在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历史决议》科学地评价了建国以来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对这个决议是满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② 邓小平提出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548 | 的。他认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①。还说:这个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②

《历史决议》的制定,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证明邓小平主持制定《历史决议》是个无比正确的决策。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乱有多方面原因,从精神生活领域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在邓小平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倒,最根本的是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国家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历史决议》的制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正确地对待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条件,或者说,《历史决议》在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方面,起到了精神领域的“定海神针”作用。

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十二大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确定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分两步走,在20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奋斗目标,指出:翻两番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不算多,叫做小康水平,但是就总量来说,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元,国家的力量大了。它把贫困的中国变成了小康的中国,可以说是种变化。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起点呢?邓小平认为,到本世纪末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①。

这涉及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变化。十二大提出“两步走”设想后,到1984年夏季开始,酝酿第三步奋斗目标。第三步的奋斗目标,最初是要“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②。经过反复掂量,到1987年2月,才明确为“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③。这第三步是一个更为宏伟的蓝图。对这样的宏伟蓝图,毛泽东曾经也朦朦胧胧地有过一些设想,但是他的思想起伏大,没能坚持;同时缺乏科学的论证,没能成为制定政策的根据。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同时也有了一条新思路。沿着这条新思路前进,十二大的两步走设想,到1987年扩充完善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对这个目标寄予巨大希望。他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④历史的时针接近本世纪末时,第二步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已提前五年实现。这说明,十二大提出的目标是求实的、留有余地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将继续证明,第三步发展战略也会在中国大地成为现实。

十二大还有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完成了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改组,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⑤这是就党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应当承认,这个“过渡”是历史形成的,有当时的各种原因。要走完这个“过渡”,最终形成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需要时日。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让老一辈革命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次被打倒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才复出的,即到1977年7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决定恢复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十一大,邓小平尽管也进入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但并未发挥核心作用。因为当时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没有解决。邓小平真正发挥核心作用是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发表的那篇被称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550 |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了揭开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的宣言书。在这次全会上,增选了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为中央委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格局才初露端倪。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薄一波等为中央委员,增选彭真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随后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又变动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在免除几位同志的领导职务的同时,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①。邓小平认为,这几次中央全会都是开得好的,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②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另一项议程,就是再次调整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改选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③。十二大进一步调整了中央委员会,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二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使党的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④。这样,就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组建任务。这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伟大革命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作用。

二、邓小平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

邓小平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如果说在十二大前已大体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那么十二大以后则进入了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

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稳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形式。邓小平热情赞扬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性。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全国的指导。”^①党中央积极支持农民的创造,几年功夫在全国推开。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八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迅速发展。邓小平认为,中国农民还有一个伟大创造,就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②,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这一创举的意义也很重大。它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农村改革的这两大成功,使农村面貌的变化非常快,使农民生活的提高非常显著。这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③。

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对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前一次三中全会(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引者注)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④,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邓小平论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⑤。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3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552 | 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①邓小平对党的许多文件都有评价,但是像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这样给予的赞誉则是不多见的。

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的难度要大。因为城市是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枢纽,比农村复杂得多,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它既涉及改革管理体制搞活经济,也包括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对象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还包括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等各个领域。邓小平运筹改革开放全局,对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大量论述。他的许多精辟见解直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由于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更复杂,而且有很大风险,因此,邓小平把进行城市改革称为摸“老虎屁股”。尽管如此,邓小平对城市改革仍然充满信心。他说:“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②他提出,城市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③他认为,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相信会成功的”。^④

关于企业改革。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部门。这是邓小平考虑最早的改革之一。他在提出农村改革的同时,就提出了企业改革问题。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就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所有的企业必须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试点,主要的就是企业改革的试点。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城市改革,也把深入进行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强调: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下放,政企分开,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搞企业联合,形成企业集团,这样就有力量,信息也比较灵通。他认为,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8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①他的这个思想解除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企业改革的诸多形式,包括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合作制等等,都在神州大地上进行广泛的试验。

关于物价改革。物价问题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活力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否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重大问题。实行计划经济,物价由国家规定。特别是作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和各种副食品,其收购价格同销售价格长期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不多了,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更少了。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中央充分估计到了物价改革的难度,决心从80年代中期开始要过物价改革关。1985年7月,邓小平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②这里,既要理顺生活资料价格,也要调整好生产资料价格。1988年夏天,国家决定放开几种副食品价格,尽管刮过一阵抢购风,但没有影响大局。于是,邓小平表示了更大的决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③经过10多年的努力,物价改革的难关终于闯过去了。

关于金融改革。这也是邓小平比较早就关心的改革。还在1979年10月,他就指出了财政、银行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说:现在对财政、银行有很多反映。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是银行制度不允许,这样卡得死死的,怎么行呢?“这不是个简单的财政集中分散的问题。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还说:“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④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⑤他甚至对借外债这样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借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27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554 | 债不可怕。有些国家通过借外债很快由经济落后的国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人家的经验。90年代初,他继续关注金融改革,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①。为了搞活经济,他提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都可以试验。这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他对上海寄予期望,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②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这些年的金融行业有许多重大改革。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在世界名列前茅,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关于建立经济特区。这是经济改革的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③。建立经济特区是经济开放政策的首选形式。它是在邓小平的倡议、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发展起来的。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4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邓小平对正在建设的深、珠、厦三个特区作了考察,对特区发展得快感到很高兴。他要求把特区办成“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使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④。这以后,他对特区建设不断有新的思考,特别是对举世瞩目的深圳特区更为关注。在80年代中后期,他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都可采用。深圳搞了七八年,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是个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⑤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批准海南全岛成为经济特区。邓小平也非常关心。他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⑥1992年早春,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珠海,对特区的巨大发展异常兴奋。他回顾历史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3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⑤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社’不姓‘资’。”^①这不仅仅是对特区建设的定性，也是对那些怀疑经济改革的不同意见的明确回答——中国的改革姓“社”不姓“资”。

关于开放沿海城市和开发浦东。继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之后，1984年4月，又决定开放沿海14个大中城市。1985年2月，进一步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春，继续扩大开放区范围，建立浦东开发区，并以它为龙头，带动长江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样，我国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开放格局。邓小平对建立这样的开放格局有许多指示。在1984年6月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之初，他就指出：我们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不会冲击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它“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②在1988年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区范围之后，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对于开发浦东，他表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要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③1992年春，他视察上海时，还指出：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④上海尽管开发得晚一些，但有人才优势和后发优势，一年一个样，三年变大样，继“深圳速度”之后创造了“浦东速度”的奇迹。这又使邓小平感到欣慰。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1977年5月，他还未复出工作，就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⑤。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继1975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之后，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的观点。这为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作了重要的认识积累。他很关心科技和经济的结合问题。1985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556 | 年3月,中央正在制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指出:“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①这以后,邓小平继续密切注视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1986年10月,他提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②1988年10月,他继续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③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小平的科学技术论,为确立科技之国战略奠定了基础。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邓小平也高度重视教育。他复出工作后曾自告奋勇地表示,要抓教育。“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④他首先抓了对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对教育体制改革十分关心。198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他很高兴,认为也是个好文件,并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几年前曾讲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还是这个态度。“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扎扎实实抓它几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⑤教育改革虽然不像经济改革那样能立见成效,但是教育作为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也正在日益发展起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空前浩劫,给整个国家造成的严重混乱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80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2页。

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①因此,他强调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②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1986年到1987年间,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③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向三个方面进行,即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总的目标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后来虽然没有制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文件,但在十三大报告中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节,在十四大报告中阐述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邓小平把它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一次革命,当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破坏,制造混乱,走向愚昧和贫困;而是真正在建设,朝着富裕、民主、文明的目标前进。改革的滚滚洪流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华大地的面貌。

三、邓小平论十三大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内国际政治风波

历史进入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任务。这就要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回答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把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改革的性质说清楚,从理论上阐明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这就涉及对于以往数次提到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予以完整地科学阐释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558 | 的问题。这就是历史赋予十三大的使命。

邓小平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①还说：“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②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由此来说明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以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问题。邓小平赞同这个设想，批示：“这个设计好”^③。

1987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分析了我国社会在现阶段的主要特点，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涵义，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我国从50年代中期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要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任务；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个理论的确立，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基于这个理论，大会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对十三大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指出：十三大的精神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政策。“在十三大以前,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人民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会连续下去,十三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人民和国际朋友都放心了。”^①他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路来反思过去“左”的错误,并作了新概括,即“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示了对十三大的赞许。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不少人对十三大产生怀疑。邓小平多次表示了鲜明的态度。这年5月底,在准备改组中央领导时,他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③在6月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他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④9月,他对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⑤11月,他会见外宾,再次强调“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⑥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对一次代表大会像这样多次地给予评价,也是罕见的。

改革不会没有风险,前进的路不会总是一帆风顺。1989年春天,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

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前,出现过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事件。那时,邓小平就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⑦。他还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560 | 律、法律手段。”^①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爆发前夕,邓小平已闻到了某种气息。他多次表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②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他说:这场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所谓国际的大气候,就是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谓国内的小气候,就是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讲四个坚持缺乏一贯性,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原来要求“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③。他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把过去某些方面的失误尽快地纠正过来,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他还强调,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总结过去,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在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没有多久,在国际上又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党密切地注视着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及时地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

还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已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世界上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争取和平作为首要任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80年代末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剧变。我们党的看法怎么样呢?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国际上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①

邓小平认为,国际风云剧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即针对第三世界的冷战和针对社会主义的冷战已经开始。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谓没有硝烟,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别的国家应当尊重当事国人民的选择。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曲折不能不引起我们党的反思。东欧、苏联的动乱发生后,邓小平认为,东欧、苏联乱,不可避免,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②从外部条件看,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起了“催化剂”作用。他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③

为了使我国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1989年9月,他概括过三句话:第一,冷静观察;第二,稳住阵脚;第三,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1990年12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④面对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他要求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当坚持:我们中国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也永远不称霸,谁搞霸权和侵略就反对谁;不参加任何集团,但同任何国家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心中要有数;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不随便批评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维护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不打别的国家的牌,也不允许别的国家打中国牌,不欺负别人,也不在别人面前示弱;反对别人对我发号施令,也决不对别人发号施令;不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也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的国家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这些实际上成为了我们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四、邓小平论实现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决策

“一国两制”构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在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邓小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4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562 | 平参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时就已形成了它的雏形。当时是从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提出的。在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党和政府首次表示愿与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1957年春,又进一步表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政务仍旧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1963年初,周恩来将毛泽东在此前提出的一些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这个意思^①,表示中国整个是社会主义,有那么一块地方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未尝不可。这就使“一国两制”的思路逐渐明确起来。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平统一台湾工作没能推进。周恩来说: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毛泽东、周恩来播的种、开的路,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提出“一国两制”的决策作了重要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曾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三大历史任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就是作为实现祖国统一方式而提出的。邓小平对这个构想的提出和决策的实施有巨大贡献,同时也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论述。

（一）党的“一国两制”构想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②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契机。1978年12月,中美两国政府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③并建议两岸恢复通商、通邮、通航。同年3月,邓小平会见前来了解中国对香港问题态度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说:“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

^① “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4页。

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的人民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①同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再次表明了党和政府的构想,强调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1981年9月底,叶剑英代表我国政府提出的“九条方针”^②,把上述构想具体化了。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李耀基解释“九条方针”时说: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③。这是迄今查到的文献中,邓小平首次使用的“一国两制”概念,也标志着我们党的这个构想的明确形成。1983年6月下旬,邓小平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杨力宇时,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具体阐释。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大陆和台湾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我们承认台湾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将叶剑英的“九条方针”归纳为“六点办法”。这就是:“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④。这样,两代领导集体花了28年时间,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至此,基本上具有比较完备的形态。

(二) 党的“一国两制”构想是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唯一正确的办法

如果说“一国两制”用于解决台湾问题还只是理论性的构想,那么把它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则是具有实践性的决策,并且可以说,是党在新时期作出的与改革开放这一决策具有同等意义的伟大决策。它犹如双峰矗立,举世瞩目。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来北京“投石问路”时,党和政府还未将香港问题摆上议事日程。但是邓小平仍然给了他这样的信息,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

①③ 转引自《瞭望》周刊海外版1987年3月30日。

② “九条方针”包括:“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等。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6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564 | 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用哪种政策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①1982年1月,邓小平明确使用“一国两制”概念时,我们党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大体确定。1982年9月,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谈判。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谈判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他说: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前提下两国政府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可以再等一二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第二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这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第三个问题,是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②。两年以后,邓小平说:“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③对于中国政府定的调子,英国没有表示积极的态度。随后,双方的多轮谈判十分艰苦。

1983年4月,我党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1984年6月,邓小平对来访的香港知名人士比较展开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构想和对香港的政策。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谈到对香港的政策时,他重申: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还说: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港人治港”,就是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

^①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他们爱祖国,爱香港。”^①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代表党和政府郑重宣布:“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这等于给了香港同胞一个定心丸。他说:“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②邓小平阐释“一国两制”决策的这篇谈话,既使香港同胞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也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府的谈判。

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直接指导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84年9月,中英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12月,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同前来签署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会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政府的“一国两制”决策。他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③在谈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策时,他说,中国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时,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解决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这就“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④对于为什么香港政策“五十年不变”,他解释说:这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因为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需要。邓小平的谈话丰富了党的“一国两制”构想。先是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三年后,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566 | 声明的签署,这使“一国两制”构想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邓小平说得对,“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①。

(三) 党的“一国两制”决策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完善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的过渡时期。从1985年7月开始,中国方面着手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专门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内地委员和香港委员共同组成)来负责。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工作,异常复杂和艰巨。同时,这也是使“一国两制”构想完善化、实证化,并且使其法律化、程序化,具有可操作性的过程,因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起草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困难,也提出了不少需要明晰的新问题。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已紧张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就众所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党和政府的想法与政策。

一是关于“一国两制”的两个方面不变。邓小平说:“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这是一个不变,也是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变。还有一个不变,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②

二是关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这涉及对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怎么理解。邓小平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难道在特别行政区就不会出现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吗?比如1997年以后有人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个时候,北京过不过问?那就非干预不行。“如果中央把什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页。

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①

三是关于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表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现在就不是实行英美的制度,也过了一个半世纪。“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②他也不赞成香港马上搞普选。因为普选不一定能选出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来管理香港事务。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③

在负责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就党的“一国两制”决策发表了很多次重要谈话。这是他就这个问题讲得最长的一次,把许多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也消除了基本法起草工作中的难点。在他的指导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一系列文件在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通过。这就宣告体现党的“一国两制”决策的法典终于诞生。邓小平对于这个基本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法,世界上、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法。“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④

（四）党的“一国两制”决策的伟大意义和邓小平对这个决策的意义作的多方面阐述

他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⑤我们党提出这个决策,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是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语言。

——这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既坚持社会主义主体经济,又允许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成分作为它的补充。“一国两制”决策正体现了这个特点。邓小平说,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各方面

①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568 | 工作的政策已经见了成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①邓小平不仅在讲这个政策的提出时是如此,在解释这个政策五十年不变时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②

——这是把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的创举。和平共处原则是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制度的地区之间是否也可以和平共处呢?这是一个新问题。邓小平谈及党解决这个问题思考时说:“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③还指出:台湾当局提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④

——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范例。邓小平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一国两制”的办法,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有些国际上领土争端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⑤他还指出:过去好多争端引起武力冲突,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为各方接受的合情合理的办法。我们就是要找出这样一个办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办法,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会“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0页。

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①。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之日。邓小平曾多次表示,他很想在这一天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到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这虽然已成为憾事,但是他为之运筹帷幄的事业已完满地实现。历史充分证明,党的“一国两制”决策无比正确。

五、邓小平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我们党已走过了70多年的路程。召开过14次党代表大会,中央领导层发生过多次变化。邓小平了解这些事件,有的为其亲身经历,后来甚至参与决策。80年代末,邓小平以新的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演变。

邓小平认为,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以前的领导,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很不稳定的,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②这个领导集体还包括任弼时、陈云。到了中共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说: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③

从毛泽东逝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邓小平看来,党的中央领导层处于过渡阶段,华国锋说不上是一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说:“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④

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310页。

570 | 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邓小平参与了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组建,寄予厚望,作了语重心长的“政治交代”。

邓小平首先强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具有改革开放的形象,使人民看到希望,感到放心。他说: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向人民亮相,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①。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路线正确,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举第二代说,人民对我们这一代“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②。因此,他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开放,大开放,“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③。他还告诫说: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关门可不行啊。“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④

邓小平强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坚持反对腐败、取信于民。他说,这次(指1989年春夏之交)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口号是反对腐败。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口号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认真抓这个问题,要清理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而不是假的。他提出,惩治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对腐败、贪污、受贿,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拿事实给人民看。“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⑤

邓小平强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胸襟开阔,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第三代中央领导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组成的。邓小平说:“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但是,进入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314页。

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由于责任不同了,领导我们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①他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②。还说,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开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开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当有这样的要求,“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③。

邓小平强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江泽民,必须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维护这个领导集体。

——早在1989年5月底组建这个领导班子时,邓小平就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④。

——6月中旬,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从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⑤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每个人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⑥

——同年9月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并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他决心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这时,他再次强调了要维护江泽民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问题。他对中央常委同志说: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重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⑦。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30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⑤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572 | ——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郑重宣布:“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①他说:江泽民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军队建设得更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90年12月,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如何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时,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一年半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表示满意,强调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赞扬“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②,并寄予殷切期望。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子的人在,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③

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地强调,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呢?道理并不玄奥,就是因为它事关中国的前途。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④在这里,邓小平是从政治角度提出问题的,但不能不说,也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310页。

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历程^{*}

今年(1999年——编者)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2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而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它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以及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无论从其所产生的理论意义还是历史作用来看,都值得纪念与回顾。

一、对本世纪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再认识

(一)周扬同志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曾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作过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现在看来,这个评价经受住了历史检验。20世纪即将过去,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内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而每次历史性巨变都与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回顾思想史,这无疑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冲决封建罗网,破除了以孔夫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使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提出的

^{*} 这是作者1999年5月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的“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574 | “睁眼看世界”变成较为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上世纪末由求索救亡图存之路的维新变法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先进分子,由于思想解放了,面向世界,才能接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1915年到191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发生。

(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除了穿插开展的“抢救”运动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外,党内斗争一度出现的偏激、过火、乱上纲,也是一个缺点。但是,从思想路线上说,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以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是非为是非、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批判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及其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在40年代末建立新中国,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是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

(三)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那种以晚年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极大地冲决了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达20年的“左”的思想束缚。就历史的具体发展而言,它为召开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从历史的宏观发展来看,它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革命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没有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辉煌历史。因此,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时,反思历史,对它的伟大作用应该进行再认识。

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几点思考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一起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来看待,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确的。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

解放思想。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党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因此,讲解放思想,首先要从全局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把握。

(二) 解放思想的历史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呈曲线、波浪式、台阶状。有时表现比较突出、集中,甚至尖锐、激烈,即呈现出高潮;有时则相对地缓和、平静,呈非高潮状。

就思想解放的高潮而言,我以为,从近 20 年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主要表现为两次“最大潮”和若干“次大潮”,即高潮的峰状等级不完全一样。这种区分是相对的。高潮的等级不是就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其社会影响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

(三) 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最大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它解决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首先就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巨大的混乱,是非扭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去掉了精神桎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

(四) 真理标准讨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也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在 1978 年这次“最大潮”之后,还有三次“次大潮”,或者说,一个波还掀起了三个浪。

第一个“次大潮”,是 80 年代初起草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 4 000 人的广泛讨论,以后又有全党的学习讨论。《决议》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或者说是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来重新审视党的历史,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认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否定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说,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对党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结论。

第二个“次大潮”,是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要制定全面改革的经济政策,但从指导思想来看,开始触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的问题。小平同志在 1980 年 4 月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过去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根本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属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外壳”,而不是它本身的内在要求。这个决定第一次

576 | 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搞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不能跨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在某些表述上还不很妥当、彻底)。因此,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由于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就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以这个决定为标志,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影响很大的思想解放。

第三个“次大潮”,是1987年的十三大。小平同志对这次大会评价很高,认为十三大的精神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会,比如,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初步地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等等。理论上的这些新认识,充分地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大会,比如提出了事实上的“科教兴国”战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机制、“两个一切”(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的生产力标准,以及明确提出以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重大决策。完全可以说,十三大是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道路上的探索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这样,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就不能仅限于1978年产生的影响来认识。有如上述,1981年的《历史决议》、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1987年的十三大这三次“次大潮”,都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最大潮”的直接延续。后来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发生打断了它继续发生影响的进程。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最大潮”,是以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发端的。南方谈话从总体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这次谈话的背景,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国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同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样,仍然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西方化、自由化,像苏联、东

欧国家那样“易帜”，改换门庭，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作出明确回答。二是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要不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像一些人所要求的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是坚持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回到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走1957年以后“左”的老路？面对当时的各种议论，不少人感到困惑。南方谈话的发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南方谈话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宣言。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南方谈话中这样的一些论述和分析，坚定了人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

同时，南方谈话又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新宣言。小平同志以同样明确的态度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些谈话消除了长期束缚人们的许多困扰。

南方谈话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直接历史成果就是十四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由南方谈话引发的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其震撼力不亚于真理标准讨论那一次。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那一次思想解放，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南方谈话的发表则标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两次思想解放都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具有划分历史阶段意义的巨大影响。因此，就思想解放的历程而言，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次“最大潮”。

（六）十五大是不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怎样对它在思想解放历程中的作用进行定位？理论界有这样那样一些不同意见。这可以开展百家争鸣，不必统一认识，定于一尊。我个人认为，第一，十五大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从历史长过程来看，这次思想解放是南方谈话那次思想解放“最大潮”的继续。

十五大是在邓小平同志去世后召开的。国内外又都很关注中国向何处去，即

578 | 新的党中央能否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和路线。十五大在党的重要文献上第一次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新的称谓,向全世界明确宣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十五大对党章作了重要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思想。如果要说思想解放,这是第一位的内容。回顾历史,自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概念以来,实际上就已提出了党在新时期是否要增加新的指导思想的问题。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直到十五大,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很不容易。这是从根本理论层面讲的思想解放。从实践层面看,这次思想解放同南方谈话那次一样,仍然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四大着重解决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十五大是进一步要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怎样搞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并胜利地到达彼岸。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结构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以及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的新发展。相对于过去固守的一些观念而言,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但是,无可否认,这次思想解放的“震级”没有达到南方谈话那样的强度,在党的历史发展上也没有形成像 1978 年真理标准讨论和 1992 年南方谈话所产生的历史阶段性影响。它所掀起的波澜,大致相当于十三大那一次,因此,属于“次大潮”。

(七) 对于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最大潮”产生的影响,应作充分的估计。它不是经过十四大就完结了的。事实上,我们目前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影响之下;对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思考,还没有离开它的指导和笼罩。只要目前这样的历史发展态势不被打断,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影响就会继续下去。它的社会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

(八) 一般地说,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与理论认识前进甚至飞跃的幅度和改革开放的力度成正比的。思想越解放,新的认识就越多,改革开放就越活。但是,我们不能片面追求什么思想解放的“最大化”。那种脱离客观实际,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所谓“思想解放”,只能是主观的空想和胡闹腾。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度不是也被视为思想大解放的成就吗?但是,中国人民备尝苦果。这样的“思想解放”决不能再要,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每次思想解放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当然,而只能是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满足实践的要求,使主观认识不断符合发展着的客观实践。因此,讲思想解放决

不能与实事求是相割裂,分离,甚至对立,而应当把两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党的完整的思想路线来认识。这是使我们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思想解放与百家争鸣和“不争论”

(一)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表现层面。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对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认识;在学术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认识。就涉及政治层面的思想解放而言,不容易表现为百家争鸣形式。但是,就涉及科学文化发展,包括理论发展的思想解放来说,则与百家争鸣形式可能密切难分,甚至互为推动。也就是说,这个层面的思想解放要求,会带来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会体现和推动思想解放,而且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载体或表现形式。百家争鸣虽然是1956年4月才作为党的方针提出,但这种现象却早已存在。姑且不论古代诸子百家的争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有无百家争鸣呢?我以为有的。不仅那时宣传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在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争鸣中披荆斩棘,高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奋勇前进,而且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在同反对它的各种思想和政治势力的争鸣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先是在知识分子中有了信徒,接着又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手中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二) 以延安整风运动为载体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属于政治斗争层面。这不可能采取百家争鸣形式,而主要是在党内领导层开展思想斗争,在全党普遍进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教育运动。

作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延续,在1956年八大前后,我们党也经历了一回思想解放的“次大潮”。这一次思想解放是受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引发的,主要是解决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搞经济建设,即由过去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转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它的特点,从指导思想来说,是继延安整风运动在革命问题上不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之后,在建设问题上也破除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以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这次思想解放,不仅直接表现为党的在思想路线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原则,而且它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提出后,反过来又推动了科学文化方面的思想解

580 | 放,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空前繁荣。尽管其时间短暂,不久即被 1957 年的政治运动中断了,但它的影响至今尚存,使科学文化界人士甚为怀念。

(三) 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解决了思想政治路线,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随后发生的几次,不但在理论认识上有重大突破,而且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相继出台。同时,在科学文化方面既破除了“文化专制主义”,也迎来了新时期科学文化的春天,呈现出翘首久盼的繁荣。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同样表现为两个层面。就科学文化方面言,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百家争鸣问题。对此,看法也不尽一致。就理论界来说,我认为,这些年在总体上贯彻了百家争鸣方针,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是建国近 50 年最好的时期。否则,无法解释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理论认识的不断向前发展,理论研讨会的空前活跃,理论出版物的琳琅满目等。当然,也有这样那样一些不足,甚至遗憾。比如,个别时候出现过异常状态;有的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预不尽恰当;有的争鸣文章讲理不够,拿大帽子吓唬人,等等。更重要的,是缺乏像市场经济那样的运转机制,或者说,百家争鸣“市场”的发育还不完全,因而,缺乏规范性、有序性、和谐性。

(五) 百家争鸣与“不争论”,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理解,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主要是指政治层面,即对党的政治路线、政策和决策不要去争论不休。这主要是对党政领导部门而言的。百家争鸣则是学术界的事,只要这方面有思想解放的问题,就不可能不展开百家争鸣。事实上,也一直在争,一直在鸣,只是表现形态不完全一样。有的同志抱怨“不争论”,认为妨碍百家争鸣,这是把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了。至于学术界有的同志对政治层面的问题感兴趣,对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想要“争论”,那就“越位”了,因为那些不属于百家争鸣范围。若想“鸣”,可以通过别的渠道,通过某种程序去进行。过去,这些界限是不清楚的。十五大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方面也应当立法,逐渐走上法治轨道,从而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新的繁荣。

20 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奇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它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记取。

伟大的思想解放

——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 30 周年*

人类四百多年来的近现代文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这既有由科学革命或文艺复兴引发的,也有由政治诉求或哲学启蒙产生的。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也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

一、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的界定

这里应明确几个概念。

一曰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为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而言,回首当年,应以 1977 年 5 月邓小平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谈话为这段历史的起点。如果将真理标准大讨论比喻为一场大戏,上面的谈话就是序曲。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1978 年 5 月中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 6 月下旬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这场大戏的“开场锣鼓”。邓小平的三个讲话(1978 年 6 月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9 月视察的“北方讲话”和年底发表的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

* 该文发表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文汇报》,同年第 13 期《新华文摘》半月刊全文转载。这里有个别文字增补。

582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邓小平成为唱大戏的主角。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这场大讨论作了重要总结,是“压轴戏”。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补课的最后一篇报道性文章,意味着这场历史性的讨论大体结束,即大戏谢幕。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经历了4年半时间。

二曰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要求,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党一直坚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伟大理论成果是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解放思想不是实事求是之外的另一个东西,而是实事求是内在的要求。这是主观认识客观事物的两种表达方式,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动态表现形式。邓小平说得好:“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①因此,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就将解放思想明确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十七大党章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20多年来,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一要求始终未变。这充分说明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影响力是长时间起作用的。

三曰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历程是波浪式的前进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一方面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涵,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另一方面,思想解放历程的状态,同任何事物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呈波浪式,有时比较突出、集中、波澜壮阔,处于高潮状;有时则相对和缓、平静,为非高潮状。就高潮言,由于起潮的能量不一样,它也有大有小,表现为大高潮、次高潮之类。30年来,思想解放的大高潮经历了两次,次高潮有若干次。第一次大高潮就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再一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思想解放的次高潮有多次。一是发生在两次大高潮间,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党的指导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新思想新政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有新的认识。二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作为较大的次高潮，如1997年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宣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引发的思想解放。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的十六大，系统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理论讲的新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去年的十七大，阐发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论也贯穿了思想解放的精神。以上这些，都可视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源头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的继续。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也可说是全方位的。最主要的：

首先，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既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中国进行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纠正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异常艰难。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ABC，但“两个凡是”作梗，却需要重新破除迷信，进行启蒙教育。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真理标准大讨论，才实现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此后，不仅拨乱反正工作全面迅速展开，而且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正因为有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才有当代中国的30年巨变。十七大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表明我们党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影响力将持续下去。

第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既是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巨大推动力，又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发动和不断展开提供了丰富的干部资源。推倒“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全党衷心拥护的邓小平迅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随后，不仅“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得到申雪，而且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也得到改正，广大受迫害的革命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焕发革命青春，成为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强大中坚。思想的大解放，有利于一批

584 | 批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又有领导能力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茁壮成长,平稳、有序地实现了各级组织和领导的一次次新老交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国家30年发达兴旺的组织保障。

第三,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直接掀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当代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批判“左”的错误之后,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经过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实践证明:这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异常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都能顺利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层面说,探索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层面讲,是创立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的最初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随后又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十七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上述理论创新,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邓小平理论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原创理论,此后的理论都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个理论体系是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因而,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还会对今后的理论创新发生深刻影响。

前不久,胡锦涛讲到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说: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5%以上;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约8%;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000多万;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这些成就也可视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的伟大成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乃“精神变物质”的伟大成就。真理标准大讨论,推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功绩将光耀青史。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

人类的近现代历史,越来越凸显思想解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幅度。我国近现代以来,经历了数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就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言,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上个世纪80年代,曾说真理标准讨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又说辛亥革命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学术问题,不必定于一尊。即使加上辛亥革命,也不如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深刻、宏伟,气势磅礴,对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推动持久。

——辛亥革命前后引发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作为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开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河。但讲思想解放,还要上溯到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那时,维新派思想家严复对“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译介,康有为、梁启超对变法思想的宣传,引发了跨世纪的思想解放;随后,革命派创办刊物、发表时论,鼓吹革命,传播共和思想,接续和扩展了思想解放潮流,尽管其内容不尽一样,但面向世界、变革社会的精神是相通的。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影响主要在知识界和革命党人中,并未播及社会底层成为广大民众的思想武器。因此,没有多久,革命成果即被袁世凯窃取,社会经历了一段不短时间的反动和动荡。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发的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从政治层面言,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从思想层面言,始于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影响力比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解放要大许多。它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担当着辛亥革命没有解决的思想革命任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立有两大功勋。一是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罗网,破除了以孔夫子的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促进了中西思想文化的真正交融。民主与科学这两个伟大思想,直到现在还激荡着中国社会。二是使不断地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而不得之后,接纳了十月革命的礼炮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成为观察和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催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是,随着始于北伐战争的大革命的失败,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遭到窒息。

——延安整风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这个运动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通过系统学

586 |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既提高理论水平,又增强革命本领。整风学习,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特点;另一方面,将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使之具有理论形态。这样互动的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党的指导思想既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创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不仅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而且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党的指导思想就犯了“左”的错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一“左”就是20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同上述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比较,这一次有几个新的特点。第一,它区别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领导、有组织、自觉地进行的,力度空前。第二,它区别于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规模空前。第三,它的锋芒指向是党自身的两位主席。直接指向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指导思想,间接指向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毛泽东又是延安整风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存在这个问题。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批判已经不在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领导人,其阻力不能同这个时期相比。因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深刻程度空前。第四,它的高潮时间空前。以辛亥革命为代表跨世纪的思想解放,其高潮很短,有如昙花一现。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高潮,从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引发的论争,有4年左右。延安整风思想解放的高潮,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到七大召开,也有4年多。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通过前述界定,有4年半时间;也有算到1987年十三大的,因为它首次提出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就有10年,其高潮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就社会影响力言,将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发的思想解放和延安整风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并列为中国20世纪的三大思想运动,我以为是站得住的。

四、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封建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过卓越贡献,创造的财富曾

雄踞世界之冠达 1 500 年之久；直到 1820 年，大清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占全球 GDP 的 33%。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但是，风水轮流转。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仅看 GDP 的指数。到了近代，中国封建文明急剧衰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异军突起。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在短短的几百年内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发展，又与 14 世纪以来的三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有密切关系。

——首先是 14 世纪至 16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历史的发展使中世纪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欧洲从 14 世纪开始衰败，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束缚，高举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大旗，揭露教会的黑暗腐败，反对禁欲主义，颂扬尘世生活，宣扬以人为本思想，强调张扬个性的人文主义。这是欧洲文明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它以但丁、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一大批文化巨人为代表。恩格斯高度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指出：文艺复兴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发生全面转折的伟大时代，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解放了人的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西方神学世界观的基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其次是 16 世纪至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在远古时代，人们只能凭直觉观察和认识宇宙。古希腊天文学家提出的“地球中心说”，与基督教宣扬的上帝创造地球和人的“创世说”相吻合，遂被宗教利用，成为中世纪神学的理论支撑，统治欧洲社会 1 600 多年。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从 16 世纪始，先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挑战这个维护神权理论的“地心说”。随后是布鲁诺、伽利略等在教会围剿“日心说”时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不惜献出生命。伟大的科学家们追求真理而进行的科学革命，不仅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且将人们的思想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人学反对神学的斗争，那么，这场经历百年的斗争则是科学反对神学的伟大革命。它引发的思想解放，推动世界历史步入资本主义时代。

——再次是 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资产阶级与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愈益尖锐，冲破宗教压迫、打碎专制统治的要求更加强烈。启蒙运动发源于英国，鼎盛于法国，风靡于欧洲，波及到北美，是一场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思想文化运动。它高扬理性精神，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是人与生俱有的权利，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解放。它的两个重要思想成果，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这两朵最绚丽的思想之花结出了

588 | 两个最灿烂的政治之果：一是打败英国殖民主义的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二是摧毁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这两大革命的胜利，既是两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也是启蒙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的伟大胜利。

上述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犹如思想革命的接力棒，推动着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它撒播的思想种子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又继续引发新的思想解放，掀起震撼世界的更加伟大的思想革命。这就是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就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而言，也可称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人类实现了一个自觉地创造历史，一代接一代地去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这既是人类思想史的一次空前伟大的革命，也使尔后的历史进入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以及被压迫的民族为争取解放而前仆后继进行英勇斗争的壮丽时期。它的理想蓝图正在以各种方式变为现实。

上述四大思想解放运动，都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近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直接受惠于启蒙运动，搬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作为反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武器。延安整风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直接源于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人们比较熟悉，这里姑且不论。就其与前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关系而言，它直接进行的思想解放虽然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明显关系，但也有重要影响。这个影响，一是间接的，如我们所说的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与此有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吸纳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上述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革命精神的结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将西方最伟大的文明成果融入了中国文明。二是直接的，即吸收了它们的某些思想元素，如七大的政治口号就是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里有启蒙运动思想的鲜明色彩。

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更是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里也暂且不表。就与前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关系言，它既与西方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剪不断的渊源关系，又使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进一步结合，更加融合。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主题，就直接源于继承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尽管否定“两个凡是”的实事求是

乃中国文化形式,但其内核是西方文明思想。

——二是党的指导思想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所谓当代化,就是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这里的“时”与“世”都融入了西方文明的优秀元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如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的提出,莫不如此。

——三是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路线,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与各国的交流合作更加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更加突出。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西两大文明正在空前地融合,尽管在融合中仍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四是思想解放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手段。西方文明的三大思想解放,都是为了反对神权,要求和发展人权。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也是要求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在使中国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最后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思想解放的精神是相通的。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近代历史比中国的近代历史整整早 200 年,上述三次的思想解放更早。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一个历史的和精神的因素。但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指标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吸收,西方文明没有的,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创造。这种精神状态正在成为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强大动力。如果说上述三大思想解放,曾经使西方文明引领世界风骚,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指导下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伟大成就,也使当今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不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属于世界的,仅从它创造的世界奇迹这个意义上讲,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同样既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五、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还要继续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史巨变,靠的是解放思想。十七大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今后要发展进步,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当然,在

590 | 不同时期,解放思想有不同的要求和内涵。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坚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谁敢说这样的话?领导层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改。因此,解放思想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要付诸行动、并要有点闯的精神的大智慧、大胆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说:恐怕再有 30 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以为,这不仅是指市场经济制度,也包括民主政治制度、文化发展制度和社会建设制度等。这就需要深化改革,深入进行各个领域的改革,特别是目前比较滞后而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那么协调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才能经过 30 年时间——建党百年左右,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是中国人民的企盼,也是今后思想解放承担的重任。

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

——从编辑《邓小平论中共党史》说起

一、编辑《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的缘起

1995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手撰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前期的党史,即1949—1978年的党史。对这段历史,首先毫无疑义,要逐个地作专题研究,翻阅大量的档案材料,采访重大事件的亲历亲闻者,等等,做好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这段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问题,这就需要有立论的参照、准绳。

什么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准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准绳。但是,这个《历史决议》对一些问题的论断很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讲了这段历史,但也带有简明读本性质。再者,历史发展了这么多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卷又先后出版了。在《邓选》中,对这段历史有大量论述。要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这段历史,就要看看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同志很早也很小就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他亲身经历了党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全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进行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可以说,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大的时期,他都经历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

* 这是作者1997年10月下旬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的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发言。

592 | 成员,又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那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是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亲历并参与决策了党的许多重要历史活动。他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①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2年起,他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八大以后,他又是党的总书记。建国后前17年这一段历史的变迁,他或是有些事件的参与者,或是有些事情的决策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两落两起,也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对两年徘徊时期的许多事,他同样很清楚。因此,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当然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党史的重要参照。不仅如此,他对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的看法,对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的看法,都具有指导作用。在他的著作中,虽然对党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论述,但是《邓小平文选》毕竟不是专门讲党史的,这就需要将《邓选》三卷中有关党史的论述摘录出来,编辑成书。因此,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十易其稿,由最初的70万字压缩到43万字。“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最后编成的,就是大家手上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这个本子。

为了使《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体现“史”的特点,突出它的“史”味、“史”感,我们不仅在章节标题的表述上,而且在条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都尽量做到像“史”。为了使它成为工具书,起到“一书在手,要查就有”的作用,在编辑体例上基本采用语录体,对绝大多数条目冠以提要式小标题,对包含内容多的大的章节,或按历史时间,或按理论逻辑,再设若干“目”层次,使“节”的内容不致杂乱无序。这样,《邓小平论中共党史》就构造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体系。它分八个专题,另加附录,即:邓小平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邓小平论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邓小平论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历史,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党的历史的新时期,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事件,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若干历史性决策,邓小平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谈自己,附邓小平谈与党史有关的人物。这些专题基本囊括了《邓选》中有关党史的论述。

二、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的主要观点

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论述,从党史理论的角度来看,有六个方面的重要观点。

(一) 关于党的历史分期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这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期。新中国的成立,将党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这在全党没有疑义。新中国成立至今将近50年,对这近半个世纪的党的历史是否还要作进一步的划分呢?怎样划分?历史的界限在哪里?邓小平在庆祝建国30周年时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党的历史是可以再作划分的。

邓小平还认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时,他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①。1986年4月,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②1987年4月,他进一步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③在这些论述里,邓小平不仅反复地强调了历史界限的分期为什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明确地指出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起点的根本原因。这是确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分期,包括党的历史发展的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 关于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

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但是,这个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与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论述有密切关系。

关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内容,邓小平在1985年8月会见外宾时讲过:“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④这个论述改变了过去不少人把第一次伟大革命只简单地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念。这是十四大报告进行概括的一个重要根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594 | 关于第二次伟大革命,其主要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思想,邓小平早在1978年10月就已经提出了。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邓小平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1984年我国的全面改革展开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②以后,这个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丰富。

邓小平关于党领导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是对党的70多年历史内容的一个新的概括,为研究党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十五大报告提出20世纪的三次历史性巨变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因子。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不息的革命史。这也是对“告别革命”论的一个有力驳斥。

(三)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

这里主要谈毛泽东思想。自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没有成为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由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毛泽东思想加以篡改、割裂,搞简单化、绝对化,因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毛泽东思想还能否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少人产生了怀疑,个别人甚至公开反对,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了混乱。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使党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149页。

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界定: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强调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思想理论,是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那些思想。他的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三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由一系列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应当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新时期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也是对中共党史的一个特殊功绩。可以说,没有邓小平那样伟大的胸怀和坚定的立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得到坚定的确立和坚决的维护。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个重大历史关头,对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丢刀子,极尽诋毁之能事,搞全盘否定。如果那样,这20年的历史将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再就是邓小平的选择,像上面所论述的那样。历史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一选择,是我们国家有今天、党有今天的一个重要精神因素,它在精神领域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薄一波把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概括为两条,并将这条列为第一条,一点也不为过。

(四) 关于党的历史的若干重大事件

党的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许多重大事件。邓小平对其中的不少事件都有论述。比如,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29年党的历史,他有非常中肯的评价。

对于建国初期,邓小平认为,“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596 | 面的差距”。^①他对于这个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改革,调整工商业,揭露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都有评述。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邓小平认为,“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②。对于这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如党的八大、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60年代前期的国民经济调整、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等,他都作了具体分析。他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经过调整,“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③。

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邓小平的论述也很多。一方面,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走到了“左”的极端,是极左,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浩劫,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的“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④;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客观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抗争力量,要肯定国家对外关系的突破等等。对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如大家所知道的,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带有拨乱反正性质,是后来改革的试验。

对于“两年徘徊”,邓小平认为,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在这之后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因而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

邓小平还分析了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的20年间的“左”的错误。他指出:这20年的“左”对国家的影响很大。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⑤。当然,他也指出:这20年的前10年和后10年也有不同,要作区别。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研究和编写建国以后的党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 关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认为,在党的70多年历史上,领导人出现过不少,但是作为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只有三代。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53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②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很很不稳定的,没有形成过真正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①这个领导集体还包括任弼时、陈云。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②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的。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同志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众所周知,邓小平处在一个关键地位,即是这一代领导的核心。但是,邓小平说:“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③。

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十四大,在一中全会上又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样,我们党顺利实现了由第二代中央领导向第三代中央领导的转变。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寄予厚望,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表示满意。

邓小平在80年代末提出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观点,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他从党中央领导集体人员变化的角度来谈党史,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但是,自从这个观点提出以来,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看法,主要是对于第一代领导应当怎么认识。这里有个怎么理解的问题。在不少人的观念里,总以为第一代应当是陈独秀、李大钊这样早期的领导人。毫无疑问,陈独秀、李大钊等参与中央领导(陈独秀甚至还是党的前五届的第一把手,简称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比毛泽东早得多,但是就参与建党来说,毛泽东与他们是同一代人。就李大钊而言,也只比毛泽东大四岁,比朱德等党内“五老”(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还小一些。邓小平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是从党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不是就党的领导换届更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30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310页。

598 | 而言的。这样提出问题,对于加强中央领导班子建设有重要作用。它可以促使人们不断思考:既然西方敌对势力把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几代、第几代身上,那么怎样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不改变颜色呢?这就要靠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路线不动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中央领导班子的建设。邓小平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①因此,邓小平关于三代领导集体的论述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顺便指出,在《邓小平论中共党史》里,编了“邓小平谈自己”这个专题。没有编书时还不知道这部分内容有多少,经过编辑才发现邓小平的自述,尽管散见书中各处,但摘出来系统化后却很完整。“我的经历”一节,基本概括了他本人的主要工作简历。其他各节也大致反映了他的思想风貌和个性特点。从而,这个专题为研究邓小平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原本的,也是权威的文献资料。

(六) 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尽管是阶级的政党,但它没有任何私利,自创建以来,它一直以拯救中华、振兴中华为己任。党走过的70多年的历程,尽管发生过不少曲折和挫折,但使人民翻身获解放、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使国家实现现代化、走向富强这一奋斗目标,始终没有动摇过。经过不断艰辛地求索,现在已经初步地找到了一条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大道。但是,目前许多人,特别是广大青年,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对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进行党史教育。他号召大家学点党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②。党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对如何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何研究党史,也有重要论述。由于一些党史问题错综复杂,他强调研究党的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原则。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评价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①

研究党史,还有一点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即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不要过分纠缠具体细节,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这个原则在研究那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疑难问题时,是需要认真贯彻的。

三、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是座丰富宝藏

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是一座丰富的党史宝藏。江泽民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留给全党的宝贵精神遗产。按照这个逻辑,对于中共党史工作者来说,除此之外,邓小平还留下了论中共党史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对于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编辑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一书,虽然是语录、文摘形式,但绝不是提倡本本主义,制造新的“凡是”,搞“句句是真理”之类的形而上学。

对毛泽东的论述,邓小平一贯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要着重于掌握其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于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同样也要坚持他本人一贯强调的这些原则。邓小平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既有一贯性的一面,也有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一面,这就要精心研究,找出其一贯的和有变化的思想脉络及其发生变化的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不能孤零零地抓住一点而不顾其他。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也应当指出,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论述,并不是党史本身,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论述,也不能代替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学习《毛泽东选集》来代替学习中共党史,这个教训要认真汲取。我们强调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既不搞“凡是”,也不搞“代替”。由于邓小平熟悉我们党从开始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知情人,再则,他的阅历比我们丰富,他的视野比我们开阔,又有卓越智慧和深邃的判断力,因此,他的论述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坐标参照系。应当说,这是我们强调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党史教育与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刚刚度过 75 岁生日。经过 75 年辉煌而又艰辛的奋斗,她由最初创立时的 50 余人发展到今天 5 700 多万党员。随着历史的延伸,随着党的队伍的不断扩大和新陈代谢,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的新老更替,通过党史教育来加强党的建设,已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一座丰富的精神宝库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座丰富的精神宝藏。她坚持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怕任何困难、不惧任何艰险、不惜任何牺牲的英勇奋斗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群众拥护的优良作风;以及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成功与胜利的经验 and 遭受挫折与失败的教训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历来重视党史教育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指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对于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

^{*} 这是作者 1996 年 7 月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研讨会上的发言。

帮助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和教育党的干部。邓小平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①。他所讲的“要懂得些中国历史”,主要指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他的著作里充满着对于党的历史道路的回顾,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评说和对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非常娴熟地运用党史经验来说明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为他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一样,邓小平的党建理论从根本上说,主要是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历史经验创立起来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通过党史教育来加强党的建设。江泽民曾经说过:“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党史工作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他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把这项工作作为“党要管党的重要内容”。^②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鉴于走上领导岗位的广大中青年干部不仅没有经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而且多数未能直接参与建国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在曲折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不太熟悉,明确要求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教育。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五年规划报告时,进一步强调了党史教育对党的建设的作用。我们感到,中央领导同志突出了这么一个思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走上领导岗位的大批年轻干部,很需要进行党史教育;在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的情况下,党史教育更应该加强。广大年轻干部由于没有经历过去的事情,缺少实际锻炼,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党史,不了解过去,就很难做好现在的工作,更不要说指导将来的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勉励党史工作者,努力做好党史工作,认真总结、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发挥好“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些精神既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党史教育对党的建设的作用,也使我们更加感到党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二、党史教育“资政育人”具有多方面的“鉴今”作用

党史教育“资政育人”所具有的“鉴今”作用是多方面的,开展教育的内容极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② 江泽民:《1989年3月25日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602 | 丰富。它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某些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是无可替代的。

我们知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伟大成果,同时又给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四大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央先是决定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为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学习教材。接着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党章),要求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联系实际,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既是党的建设的任务,同时也是党史教育的任务。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在全党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党史学科的特点,或许在推动学习、研究和宣传这个理论的活动中还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从而使其具有某些特色。

例如,通过党史教育,结合党的七大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历史教训,来说明在当前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重要性,就会很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大党。历史经验证明,用正确的理论统一全党思想,革命事业就取得胜利;反之,错误的理论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革命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在党的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用比原来预想短得多的时间,接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八大之间所取得的这一系列胜利仅仅只有11年多一点的时间。为什么在这样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的七大,作出这样的政治决策并实现了这个任务,是很不容易的。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遵义会议以前,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中国革命事业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延安整风运动系统研究党的历史,对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时期

作了比较,分清理论和路线是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史教育活动,对加强党的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通过这次党史教育,使包括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在内,都心悦诚服地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伟大意义。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到七大前夕,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空前统一。至此,全党更加自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决执行七大制定的路线和政策,从而取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经历过曲折,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也经历过曲折。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又经历过两大失误(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取得了比较顺利的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在此期间,经过可与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六大以来的党史相比拟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系统地研究建国以来党的曲折发展的历史,在十二大之前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十四大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作出了基本总结。有了这样的基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全党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全党统一了对这个理论的科学价值和伟大意义的认识,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的正确抉择。

不难看出,十四大的这个重大的政治决定,是吸取了七大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现在,党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句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党像当年团结在七大的旗帜下一样,团结在十四大的旗帜下,以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值得吸取,党的历史上失误的教训也值得借鉴。历史的发展既不是笔直的,也不会是平静的,有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党的历史上既有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经受住了风险而没动摇,取得了预期胜利的成

604 | 功经验(如上面所讲的七大到八大之间);也有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却未经受住风波发生动摇,造成重大失误的沉重教训。比如说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今年是它召开的40周年纪念。在那次会议上,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于那时缺乏经验,对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未能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地对待八大后不久国内和国外出现的复杂形势的干扰,致使八大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挫折。这个历史教训值得全党引以为鉴。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在10年之后的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②这些思想包含了对历史教训的鉴戒,表达了我们党在未来的岁月中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信念、期望和嘱托。这样的党史教育,无疑有助于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领导干部首先要了解党史,学习党史

江泽民最近在纪念我们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75年来,我们有一条基本的经验,这就是: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国家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保证改革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胜利实现,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又鉴于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素质还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江泽民提出,要把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作为全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这不仅是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党史教育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大批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开拓前进;模范遵纪守法,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勤奋敬业,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能力的高素质的干部。这是党的事业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不必说革命先烈、老一辈革命家们英勇卓绝的光辉业绩和令人敬仰的高尚风范对党的事业会产生巨大影响;就是像建国以后的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还有这次江总书记提到的孔繁森、李润五、马恩华、李国安、吴天祥等,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干部的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也是推动党的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不是讲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反差吗?首先应当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样的进步和成就是全面、正确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这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现象。这不是全面、正确地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恰恰是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未能充分贯彻执行的结果。这不应当称之为,也不属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现实社会现象是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应当混淆。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而言,不存在反差。如果讲的是那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不仅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反差,而且格格不入。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正是要消除这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会存在着那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现象呢?原因很多,情况比较复杂,要作具体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消极、腐败、丑恶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和部门,都与那里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历史知识素质等,在某些方面至少是不合格。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现实中就很难不发生扭曲和变形。江泽民尖锐地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在讲到对干部的“高素质”要求时,他再次强调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

606 | 国的发展,否则,“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①。

为了落实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要任务,党史教育应当充分发挥参与、配合的作用。一方面,从党的历史发展,包括它的辉煌与艰辛、成功与失误、胜利与挫折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党的建设的基本道理;另一方面,对党在各个时期的各条战线、各种岗位上的高素质干部的光辉代表的业绩、品格、风范,包括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思想方法、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都应广为宣传,为正在成长和肩负重任的广大干部树立学习的榜样。过去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今后还应当加强。包括改进形式、扩大领域、拓宽思路,结合重大的党史事件(例如抗日战争胜利、长征胜利)和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使党史教育更加生动活泼,效果更好。

党史教育对于党的建设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是一项永无完结的工作。在当前,我们应当以江泽民的讲话为契机,为大力推进党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解放日报》1996年8月28日)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2页。

世纪之交的党建前景展望

一、历史交错发展：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有时也会成为失败之母

党的历史,从诞生至今已经 75 年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尤其是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共产党来说,75 年可说是还仅仅处于童年,刚刚学会走路。75 年来,党经历过辉煌的发展,也遭受过失误与挫折。大体上讲,党的历史上曾有过五度辉煌。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成立后不久,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进行了北伐战争。这是中华民族进入 20 世纪以来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从历史意义来看,仅就其革命的彻底性、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正是由于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观察和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才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20 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才干。

第二次,抗日战争时期。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不断遭受外国列强侵略,一直处于被瓜分的境地,几次对外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抗日战争第一次打败了外国侵略者,对外夺取了全面胜利,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新的形象。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通过抗日战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

第三次,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华民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创伤之后,人民群众渴望和平。我们党曾努力争取和平建国的局面。但是历史的

608 | 发展不以人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国民党蒋介石害怕经过抗战而觉醒的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其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反对,破坏了在抗战中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发动了内战。战争开始时,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国民党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号称三个月至多半年就能消灭共产党。然而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局面很快扭转过来,仅用3年时间即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原来所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到战争后期,形势发展确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这是在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下演出的中国战争史上、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有声有色的活剧之一。

第四次,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伟大胜利时期。在这8年中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经济建设的成就,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较,都是属于前列的。新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中国人民从未有像这8年雄赳赳,喜洋洋,高昂地抬起了头。在这8年中,还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尽管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从宏观上来看,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是成功的,使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党史的角度讲,这一时期中有相当多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五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阶段。经过拨乱反正,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8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他各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第五度辉煌还会持续下去。这是我党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段辉煌。

回顾五度辉煌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党的历史是交错发展的。在取得一段时期的巨大成功之后,往往会发生一次失误。而在总结了上一阶段的成功与失误的经验教训之后,又取得了再一次的成功。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有过两次大的失败。第一次,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影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重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人。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使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两次失败给我们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以后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后头8年的辉煌成就,都

是由于深刻吸取了两次失误的教训,认识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及特点,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发生过两次大的全局性的失误,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再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又是由于从失误中吸取了教训,逐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及特点,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因而可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然而历史同时也表现出另外一个方面,即在取得成功以后,又要栽跟头,又会发生失误,成功又往往成为失败之母。其原因就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两次失败,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有两次骄傲的结果,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再往后来,比如经过8年抗战和3年的解放战争,革命胜利的到来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又经过建国后头8年的比较顺利的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也比预定的要快。原定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的时间完成三大改造,结果到1956年就提前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又开始产生了骄傲情绪,觉得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头脑发热,工作不那么谨慎了,这就酝酿着以后的失误,发生了“左”的错误。开始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接着政治方面的错误发展到经济方面,搞“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过这次失误,毛泽东曾作过探索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点及规律的努力,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但一方面由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定难度,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根子并未完全根除,所以经过“八字方针”的调整,到1964—1965年形势好转以后,又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时间更长的“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失败是成功之母,还应该认真注意成功又往往是失败之母。我们党75年历史中的胜利与挫折、辉煌与失误交错发展的曲折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启示。

当前,我们党处于75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段胜利发展的时期中,又面临着世纪之交,回顾党的发展历史,要认真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18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也要看到潜伏着的各种问题。潜伏的问题往往与取得的成就是相伴相随的。在成就很大的同时,往往问题也很多,二者并不成反比,有时往往是成正比。譬如,经济的发展,从速度来说,两位数的增长率不算低,在世界上居前列。但对于如何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地快速稳步发展,避免大起大落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说我们目前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没有完全摸到。再如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一部分效益较好,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亏损,远没有改变被动局

610 | 面。这是个大问题。要长期靠国家背着,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农业的发展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徘徊局面。过去对农业问题总是看得简单,一段时期丰收了,达到一定水平了,就认为万事大吉,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须知,对农业问题决不能一时解决就一劳永逸,需要有长期稳定的基本政策,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另外,还有关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务是提出来了,但实现转变的具体对策、可操作的行为规范等等需要摸索。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问题就更多了,在某些地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已经到了严重混乱无序的程度,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很不满,也很忧虑。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拿出有效的对策。

二、现实与理论间出现反差：干部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中介，而部分干部素质的低劣却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

在我们回顾党的历史,客观全面地认识当前工作发展状况的时候,不难发现这样奇异的现象:过去几次大的错误,都是在理论认识、指导方针首先错误的情况下发生的,建国前的几次不必说,建国后的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当前,在理论上,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路线上,有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都很明确,而且18年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有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却还在相当大的社会生活范围内出现与理论要求相背离的情况,而且有些问题相当尖锐,现实与理论形成较大的反差呢?当然,目前存在的问题同过去几次大的失误不能相提并论,也不能简单类比,但是,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改进党的工作这个角度出发,这个“反差”现象值得认真思考,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

应该看到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个领域的客观发展规律都有待逐步认识,各方面工作不可能一下子都做得很好;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的素质不到位,包括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斯大林、毛泽东都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可以看到,凡是较好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变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地方,都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干部队伍;凡是发生问题较多,使理论、路线在现实中发生扭曲、变形的地方,主要在于领导班子、干部队伍素质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像共产党员的样子。所以,党要在世

纪之交及进入 21 世纪后,能够真正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华民族的广大国土上完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一定要不断改进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要全面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当前则应抓紧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干部队伍。这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不当李自成:共产党人必须过好权力关、金钱关

当年从西柏坡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同周恩来有一段关于进京赶考的著名对话,指出不要学李自成,不要再退回去。这就是我们党能不能把天下坐稳,能不能过执政关的问题。现在看来,相当大多数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是有警惕的,过了这一关,没有当李自成。但也有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忘记了毛泽东的教导,没有过好这一关,甚至完全丢掉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权力是谁给的,搞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变成了“李自成”。这个过执政关的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不仅涉及一代人,而且要涉及一代又一代人。这一代人过了,下一代人能不能过?以后一代又一代人是否都能过?这都是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周期率(律)”的问题,需要继续努力探讨如何才能解决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过去我们国家很穷,现在变富了一些,富了以后还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一个要引起警觉的问题。过去说富了就要变“修”,这话不对。如果富了就要变“修”,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贫穷的。那么,还有谁会愿搞社会主义?这个说法显然不对。但我们确实需要考虑,在条件改善、逐步富裕起来以后,能不能以及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说,除了要解决执政后的权力腐蚀问题,还要解决富裕之后的金钱腐蚀问题。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现象。因此,防范金钱腐蚀,从个人讲,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从国家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是一个关系“周期率(律)”的问题。从国际上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搞了 70 多年垮了。东欧的社会主义搞了半个多世纪也垮了。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能不能始终高高飘扬?这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我们一定要解决权力腐蚀和金钱腐蚀的问题,否则就会丢失政权,或使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异化。解决这两方面问题,首先要有信心,要坚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一定要有明确的措施:宏观的、长远的、阶段的、近期的,要成套。像搞成套技术设备那样,治党治国也要有“成套设备”,搞“系统工程”。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四、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要继续加强制度建设，也不可忽视思想教育、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教育

要解决好前面谈到的各种问题,担当起我们面临的各种任务,关键在于前面所讲的改进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这里首先有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革的力度不小。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组织制度等方面革除了一些弊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为什么目前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更不要说被根除?应该看到,除了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而形成了很多缝隙、漏洞,使权钱交易有了条件。因此,要加大这方面改革的力度,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形成健康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不断涌现出来,使这样的人成为党的干部队伍的主流。孔繁森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轰轰烈烈。孔繁森是伟大的,宣传孔繁森也是正确的,广大干部应当学习孔繁森,使自己成为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但是从组织部门来说,也应当通过孔繁森的经历,得到反思,使党的干部制度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尽快完善起来。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不仅指国民教育,也不仅指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而且是包括干部、领导干部,还有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在内。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削弱了;干部总去教育别人,干部自身的教育削弱了,这就严重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是出现王宝森、陈希同这类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不能不引人发问,别看有些人高官厚禄,但其世界观、人生观、精神境界怎样还很难说。这是广大群众引为忧虑的问题之一。前不久,为准备迎接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了一个周恩来研究述评讨论会。我在会上讲了这么一个观点:要使我们中华民族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必须首先在下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一条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再一条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除了理论和路线之外,还要有周恩来那种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一个是“灯”,一个是“路”,有了“灯”和“路”,还要有人去干才行。否则,理论再好,路线再正确,没有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去干,那么理论、路线就难免要落空。而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首先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提高精神境界,做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

己,这样,精神的力量才能通过广大群众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制度建设与思想教育,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制度建设是客观方面的、外部性的约束,思想教育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具有主观方面的自我约束。多少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制度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及党的建设所必不可少的,但制度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制度是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执行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党员、干部的思想因素更具根本性的作用。如果党员、干部的信念不坚定,缺乏思想上的自我约束,内在的防线一放松,只靠制度是防不胜防的。因此,应该明确,要制度建设与思想教育两手并重,靠这两个方面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的建设。

世纪之交,既是百年之交,也是千年之交。这是千年一遇、千载难逢的时刻。我们个人能够“千年走一回”,真是三生有幸。我们党能够经过这“千年之交”,更感到责任重大。12万万同胞都看着我们党。党的建设好坏,关系中华民族的安危。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一定能够建设好,不会辜负12万万同胞的重托。到下一个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会创造更大辉煌。中华民族将在世界历史上显示从未有过的辉煌。

(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7期)

党的生日话党史：高举邓小平 理论旗帜继续前进

一、1997：党的历史的不寻常年

人过生日长一岁。党也一样，去年 75 岁，今年 76 岁。

1997 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它将以三件大事记载于党史上。

第一件大事是我们国家收回香港，结束英国在这个地方的殖民统治。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范例。“一国两制”的构想即要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第二件大事是今年秋天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迎接 21 世纪。这是公元纪年由第 2 个千年到第 3 个千年相交替的世纪。面对千年一遇的世纪之交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可想而知的。

这两件大事是在 1996 年以来人们就不断在说的。此外，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今年 2 月离开了我们。

从邓小平个人说，他以 93 岁的高龄谢世，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间，这是不多的。他比毛泽东高寿 10 年。就党来说，在十四大之后，特别在 1994 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之后，已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交接，党和国家的发展都比较平稳。各个方面都在朝着健康的方向运作。这是邓小平应当感到欣慰的。相对于 20 多年前毛泽东主席的去世，邓小平可以放心地走。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论哪个国家的历史都带有历史伟人的印记。在我们

国家,就我们党来说,从1935年到1976年这40多年党的历史和20多年新中国的历史就带有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是个很有魅力的历史伟人。这段历史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性格的烙印,不管这段历史的辉煌与挫折都是如此。毛泽东不在了,历史就会缺少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或者说还应当包括1975年的全面整顿,这近20年的历史也带有邓小平的印记。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不是溢美之词。

历史确系如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无不凝聚邓小平的心血和智慧。其中许多决策和政策的实施,一些理论的提出与表述,和对一些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判断与决定,更与邓小平有密切关系。比如,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形式;实行先富带动共富的发展战略;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确立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科教兴国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调整对外关系,重新确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并使我国国家经受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的严重考验;以及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取消“四大”,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要求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这些与邓小平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紧紧相连。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①这里,无意去将邓小平与马克思作简单类比,但是,恩格斯讲的“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就邓小平之对于中国而言,是可以借用的。这个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党的历史将会失去邓小平的个人特色。

二、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邓小平的中共党史论

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精神遗产。集邓小平言论、著作之大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616 | 《邓小平文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作，对中共党史也有大量的论述。邓小平那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是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亲历并参与决策了党的许多重大历史活动，特别是其后半生与党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他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①三卷雄文中的不少论著和谈话，就是直接讲述党的历史的。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党史学家，但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对党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论述。例如：

（一）关于党的历史分期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这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将党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这没有疑义。新中国成立至今将近50年，对这近半个世纪的党的历史的发展是否还要作进一步地划分呢？怎样划分？历史的界限在哪里？邓小平在庆祝建国30周年时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建国以后党的历史是可以再作划分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时，他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②1984年10月，他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③1986年4月，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④1987年4月，他进一步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①在这些论述里,邓小平不仅反复地强调了历史界限的分期为什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明确地指出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起点的根本原因。这对于研究建国以后党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二) 关于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

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但是,这个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却与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论述有密切关系。关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内容,邓小平在1985年8月会见外宾时讲过:“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②这个论述改变了过去不少人把第一次伟大革命只简单地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念。这是十四大报告进行概括的一个重要根据。关于第二次伟大革命,其主要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思想,邓小平早在1978年10月就已经提出了。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③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邓小平这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1984年全面改革展开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④以后,这个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丰富。邓小平关于党领导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是对党的70多年历史内容的一个新的概括。

(三)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

自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没有成为问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618 | 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由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毛泽东思想加以篡改、割裂,搞简单化、绝对化,因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毛泽东思想还能否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少人产生了怀疑,个别人甚至公开反对,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思想混乱。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使党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①

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界定: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强调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他的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三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由一系列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应当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

(四) 关于党的历史的若干重大事件

党的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许多重大事件。邓小平对其中的不少事件都有论述。比如,对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29年党的历史他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③他对于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1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53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个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改革,调整工商业,揭露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都有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历史,他认为“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①。对于这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如党的八大、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60年代前期的国民经济调整、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等,他都作了具体分析。他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经过调整,“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②。对于“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他对于各个具体事件的论述也很多。一方面,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走到了“左”的极端,是极“左”,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浩劫,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的“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③;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如要客观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抗争力量,要肯定国家对外关系的突破等等。对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如大家所知道的,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带有拨乱反正性质,是后来改革的试验。对于“两年徘徊”,邓小平认为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在这之后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因而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邓小平还分析了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20年的“左”的错误,指出:这20年的“左”对国家的影响很大,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④。当然,他也指出,这20年的前10年和后10年也有不同,要作区别。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写建国以后的党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 关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认为在70多年党的历史上,领导人出现过不少,但是作为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只有三代。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很不稳定的,没有形成过真正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还

^{①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620 | 包括任弼时、陈云。到了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①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的。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同志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众所周知,邓小平处在一个关键地位,即是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但是,邓小平说,“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②。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十四大,又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此进入了第三代领导。他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寄予厚望,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表示满意。这是邓小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人员变化的角度来谈党的历史,也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六) 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自创建以来一直以拯救中华、振兴中华为己任。中国共产党走过的70多年的历程,尽管发生过不少曲折和挫折,但为使人民翻身获解放、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使国家实现现代化,走向富强这一奋斗目标,始终没有动摇过。经过不断艰辛地求索,现在已经初步地找到了一条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大道。但是,目前许多人,特别是广大青年,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党史教育。号召大家要学点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③。党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对如何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何研究党史,也有重要论述。由于一些党史问题错综复杂,邓小平强调研究党的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原则。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任何问题都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3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31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评价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①研究党史，还有一个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即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不要过分纠缠具体细节，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这个原则对于研究那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疑难问题，是需要认真贯彻的。

三、从党的历史展望十五大

党的70多年分为3个阶段的历史，共召开过14次党代表大会。

在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过7次党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六大，党才长到“7岁”，不可能要求幼年的党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都正确。但是，经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党在成长。10年土地革命战争和8年抗日战争的艰苦磨炼，党成熟了。七大的召开是全党成熟的标志。“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②

在第二阶段的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召开了4次党代会，唯有八大开得是成功的。邓小平说：“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③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犯了“左”的错误，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22 | 命”，“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变成了极左，使国家遭受了一场大灾难。九大和十大都是在贯彻“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在第三阶段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已召开了三次党代会。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开得好，是改革开放的大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大大地发展了八大的路线。如邓小平在十二大所说：“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①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以往的14次代表大会，绝大多数在党的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召开的三次代表大会都是成功的。这说明我们党对于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成熟，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在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面对世纪之交，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不可能不产生更多的期盼。许许多多的期盼，归根结底，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悼词》中所表示的：“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5月底，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对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不动摇这一点，邓小平生前谆谆告诫过全党。早在1980年2月，他就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1984年6月，他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他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多、更明确。就在6月的那次讲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中,他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同年10月,又说:“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①两个月后,他还指出:“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②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说得更加明白,“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③邓小平生前向新的中央领导人说过他的“政治交代”。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全党的“政治交代”,对十五大的期望。

怎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全党都很关心,也正在认真研究的大课题。作为理论工作者更应当广角度、多侧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走过的历史道路,深入研究这样几点也是有意义的。比如: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开拓创新、敢闯敢试的精神状态。近2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寻找新路子,创造新办法,制定新政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今后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仍然需要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和用这样的精神状态去解决。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江泽民总书记也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

——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是在1996年纪念党的生日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深得党心、民心。无论从干部的现状还是事业的需要来看,“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这是千真万确的,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同时也应当说,目前为解决这个任务提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624 | 供了空前良好的时机。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到该解决的时候了。要使我们的干部既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又是艰苦创业、反对腐败的榜样,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干部制度,建立和健全造就这样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良好机制。一个时期,对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放松了,没有一以贯之,这是需要努力纠正的。1996年江总书记的讲话,就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也滞后了,这是造成干部素质不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一手抓教育干部,一手抓制度建设。从某种意义上看,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对于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曲折和艰险,作更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有深刻教训。党的七大,不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而且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中对未来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转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设想了17种之多,这就表明了一种清醒的估量和前瞻,从而使全党对于在复杂变化的形势下坚持七大的正确路线不动摇,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建国以后八大的正确路线没能坚持下来有许多原因。邓小平讲的“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其中就包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困难、曲折和艰险,远没有像在七大时那样有充分的认识,因而面对国内外政治风云发生的突变,就缺乏清醒的估量,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导致改变八大路线的一个因素。要研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就要研究这样的历史教训。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②我们相信,十五大组成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沿着邓小平所指引的方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原稿写于1997年5月,发表稿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7年第7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我观邓小平

WOGUAN DENGXIAOPING

第五编

南方谈话论

当代中国历史航船的伟大指针

——重新学习邓小平 1992 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

1992 年春天,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对于这段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越来越为历史所证明。一年多前,笔者曾发表过学习南方谈话的体会的长篇拙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这以后,笔者同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感受到,南方谈话那闪烁真理的耀眼光辉和那震撼山河的强大威力;也更加认识到,南方谈话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又是指引当代中国历史航船开创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伟大著作。

一、消除困扰、解放思想的新指针

历史的发展是曲线式的,而不是径情直遂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发展总的说是在光明大道上胜利向前,但也有一波三折。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小的曲折。这以后,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困扰。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①。拨乱反正虽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曾经遇到过像“两个凡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 页。

628 | 是”的困扰,但毕竟是把搞乱了的思想拨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轨道上来,“正本清源”,因而仅经过四年时间基本解决了。从十二大开始的全面改革,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没有任何现成的“本本”和经验可以遵循,对它的疑虑不时地困扰着人们。随着改革的深化,这样那样的困扰越来越多。如果说拨乱反正时,还有一个曾经被公认的“理论坐标系”(即人们所说的“传统观念”),比较容易统一思想,那么在全面改革阶段不仅要继续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还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当前的时代特征出发,将过去一些(而不是全部)视为“正”的东西加以否定,更新某些观念,确立新的“正宗”,并逐渐建构新的“理论坐标系”。这对相当多的人来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从改革的实践看,在工作中确实出现了某些偏差和失误,在现实生活中滋生甚至蔓延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尽管是不符合党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要求的,但是一部分人往往误以为是现行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特别是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国家制度骤变的巨大冲击,使一些人在反思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时,没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并部分地陷入了误区。这样,谁也不会想到,在经过10年的全面改革之后,到90年代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会产生那么大的疑虑,如果不克服,就会成为继续前进的思想障碍。

邓小平高瞻远瞩,洞察到了这一切,及时地视察我国南方,发表了那“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要谈话,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主要回答了以下五个重大问题:

(一) “一个中心”与“两个中心”问题

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制度骤变之后,盛行一种观点:经济建设是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是中心。乍一看来,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仔细琢磨,它实际上是要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事关重大。南方谈话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还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①邓小平以这样斩钉截铁的语言否定“两个中心”的错误观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长期不变,这在他的著作中还是第一次。这个鲜明态度完全解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一个时期的重重忧虑。

邓小平肯定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并不是说处于非中心的问题就不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是很重要的,如十四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①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反的问题。是像过去那样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全民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还是重在正面教育,实行上下、内外有别?二是放在什么位置来反。是放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作为“中心”?如果放在一定范围,服从于党的基本路线,就不成问题;如果提到“中心”位置,宣传“两个中心”论,那就不对了。因为“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实际上没有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反和平演变中心论”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不同认识而形成的两条不同的思路,也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不可能并列共存。提出“两个中心”论,只能削弱、损害甚至否定作为“一个中心”的“经济建设中心论”而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

(二) 改革姓“资”姓“社”问题

这是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老问题。自上海浦东开发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后,这个问题一度成为报刊舆论的热点,并对扩大改革开放造成较大压力。南方谈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实质。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②他列举办特区和“三资”企业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这就是:“特区姓‘社’,不姓‘资’”^③;“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④。

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上海浦东开发区的改革开放政策引起的姓“资”姓“社”争论,不在于要不要问,该不该问,而在于怎么问法,允不允许摸索和试验?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言,毫无疑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是关注姓“资”姓“社”问题的,否则,我们党就不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不必努力纠正实际工作中一再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但是就改革开放的某些举措而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630 | 它可能要突破过去长期被视为姓“资”的观念,允不允许摸索和试验?这是争论之所在。一种态度是囿于固定观念,坚决反对;一种态度认为可以试验,为社会主义所用。从认识路线看,后者是正确的,也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的开拓精神。当然,前者就其主观愿望而言还是想维护社会主义的,“也是出于好意”^①,但是,其认识观的方法论是不可取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多少曾经被判定为姓“资”的事物,其实姓“社”。这10多年已在不断地平反改正。过去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南方谈话了结了这桩“公案”,平息了一场抽象争论。

(三) 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也是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到90年代初,争论得更为激烈,在经济学界甚至形成两派。南方谈话拨开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重重迷雾。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其实,这并不是邓小平首次亮明的观点。对这个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曾讲过10多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次:一是他最早在1979年11月讲的,曾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③。当然,他也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二是在1985年10月,他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提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④三是在1987年2月,他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⑤四是在1990年12月,他继续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15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①南方谈话就是这些思想的发展。如果说过去的有的谈话只在较小范围传达过,那么由于南方谈话的广泛宣传,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就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那种不合时宜的固定观念,加快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

(四) “左”与右的倾向问题

主要防右还是主要防“左”?这是90年代初期的又一个热门话题。右是主要倾向,这在一个时期似乎成了定论,人们产生了困惑。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惊雷,震垮了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十分辩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严厉批评一些不正确的宣传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还尖锐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

邓小平的这个论断,使一些同志一时转不过弯子,难以接受。其实,只要放开视野,拓宽思路,这个问题是不难想通的。

第一,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看,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长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与主要受了“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许多国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除了有客观上的缺乏经验等原因外,从主观上说,则是思想僵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长期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且把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神圣化,盲目地照抄照搬。这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很快,更不必去说从劳动生产率上去超过发达资本主义,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其正当的期望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不仅经济建设没搞好,党的建设也没搞好。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使这个党严重丧失群众基础。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诱导,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国家的变化,有右葬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有在发生右的倾向之前,“左”为其被葬送作了某些准备;有的国家还直接是“左”葬送的。

第二,从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看,所犯的主要错误不是右,而是“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根深蒂固。民主革命28年,全局性的右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632 | 错误主要是 1927 年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时间只有半年。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是局部范围的。“左”的错误属于全党性的先后有三次。仅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就达 4 年之久,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建国以后,没有发生过全局性的右的错误。过去被指责为“右倾”的,属于冤案,已经平反。仅从 1957 年起的 20 年间出现的错误来看,属于全局性的都是“左”的错误。光是“文化大革命”就长达 10 年之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搞好,主要不是右,而是“左”,这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程看,探索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所遇到的阻力,也主要来自“左”。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不仅仅是体制上的革命,也是人们的活动方式、思想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转换一些固有观念的难度不亚于体制变革本身的难度。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无不遇到很大阻力。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起,对改革也有冲击,其危害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左”带有革命色彩,常拿大帽子吓唬人,再加上长期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不正常状态而形成的“宁左勿右”的社会心态的影响,破除“左”的阻力更为艰难。凡是经历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变革的人们,都会有深切体会。因此,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也是 10 多年的一条历史经验。

(五) 关于整顿与发展问题

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不断发生“左”的错误。1956 年的冒进,1958 年的“大跃进”,1978 年的“洋冒进”等,人们还记忆犹新。多次的“上马下马”、大起大落,确实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怎样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呢?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在一部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中逐渐形成了求稳怕乱,谨小慎微,没有胆子,迈不开步子的心理;前些年又被是发展还是整顿的抽象争论所困扰,成为影响 90 年代初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一个思想障碍。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解除了这方面的困扰,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

首先,邓小平放眼世界,立足于国际大环境来看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①时不我待。这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5 页。

关系到政治稳定。为什么一个时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的说法呢？对那些居心叵测者当作另论，但有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思考。我们虽然有自己的优点和优势，这是社会主义江山坐得稳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经济的发展长期上不去，优势就可能被转化掉。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科技革命飞快进步，一些发达国家继续繁荣、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有着难得的机遇。邓小平过去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①正是基于此点，在南方谈话中，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几乎是在疾呼：“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②

第二，邓小平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充分肯定了1984年至1988年的大发展。在治理整顿之初，如何评价这5年的经济状况，有微词、贬词者不少。邓小平比较了80年代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指出：那5年票子发得多了，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要全面地看那5年的加速发展，“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③邓小平还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加速发展与治理整顿的辩证关系上来评价。他说：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这几年的“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④这样，一时沸沸扬扬的不同意见，被邓小平的犀利的、深刻的辩证分析折服了。

第三，从总结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一个阶段经济的加速发展是可能的。邓小平认为，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机。据国际机构有关资料，亚洲“四小龙”在1965—1980年的1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超过8%，其中有的年份连续超过10%；特别是韩国从1962年到1991年的29年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2美元增至6245美元，增幅达76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634 | 有鉴于此,邓小平提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①

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的分析,为我们经济发展宏观战略的确立和长远规划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当然,强调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也不是鼓励不切实际、不顾客观的需要与可能的“高速度”。邓小平不仅注意到可能产生的这种倾向,而且提出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协调、发展与效益的辩证关系。他倡导的加速发展,“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②因此,邓小平讲的“加速发展”是有条件、有前提的,那种脱离实际、不讲效益、不讲质量、不讲协调的盲目发展,是不符合南方谈话精神的,也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南方谈话对上述几个问题的回答,消除了长期的困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90年代中国经济的大腾飞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观点

南方谈话在精辟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提出或进一步明确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主要有:

(一)“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③。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有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这个问题,不仅在马列主义的书本里,就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动力,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基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认识,毛泽东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改革的思想,号召党外志士仁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①。在他的脑海里,一度还闪耀过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许多阶段,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会发生尖锐矛盾,会有多次社会革命的思想。但是,毛泽东比较成熟的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这也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观点。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③,就包括这种情况。过去长期流行的这种观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邓小平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存在的尖锐矛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④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状况的新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就邓小平本人言,“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并不是在南方谈话中首次提出的。他的这个思想也带有一贯性。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不久,他就说过:“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⑤1985年在通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他又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还说:中国的改革“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⑦,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更能解放生产力”^⑧。在十三大召开之后,他还指出:十三大“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⑨。但是应当指出,南方谈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观点。邓小平以前的谈话提出了这个命题,并未展开论述。南方谈话的新思想在于,一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角度论证了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并建立起解放生产力的新经济体制,从而赋予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772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⑤ 新华社1984年11月21日讯。

⑥⑦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35、148—149页。

⑨ 新华社1987年12月25日讯。

636 | 力”这个命题以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二是把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说:过去讲的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①。这也是一个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新思想。所谓“讲全了”,就是说社会主义承担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重任务。过去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当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就不能不进行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解放生产力,也为的是发展生产力。这样,目的和方式、任务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就辩证地统一起来了。这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认识。当然,就为了解放生产力而言,所采取的“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革”两种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前者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进行的;后者则是有领导、有步骤、从上而下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它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二) “三个有利于标准”论

生产力标准问题,虽然不是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的,^②但是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并明确使用“生产力标准”这个概念之后,就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③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赞同十三大的观点的。但也有一些同志持有异议,认为“生产力标准”和基于这个标准而概括的“两个一切”^④是“庸俗生产力论”。因此,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困惑,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当然,在宣传中有将“生产力标准”论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如把“最主要标准”、“根本标准”说成是“唯一标准”,就是一种曲解。因为许多具体工作的成败得失还有其具体标准,不是这个根本标准所能替代的。

但是,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本身却不是什么“庸俗生产力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② 在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4页。

③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8页。

④ “两个一切”,即十三大报告讲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归根结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它的吸引力才会不断增强。有一种看法,把毛泽东关于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搬出来,说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也应当是标准。不错,这两条是辨别重要政治是非的标准,但是,这并不能否定生产力标准是属于“归根结底”性质的根本标准或最主要标准。这是在不同层面上讲的标准,即标准的层次性问题。生产力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讲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政治上讲的,不属于最终意义的,因而不是根本性质的。试问,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这两条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实,生产力标准思想,既不是十三大的发明,也不是邓小平的创造,而是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最早提出的。^①十三大报告的贡献是,将毛泽东的思想作了科学抽象,使其具有了更为鲜明的理论性格。

人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谬误,就是脱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这种谬误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而消失,有的人还持这种观点来评论改革。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自以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辨别改革是非,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其结果只能是使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声誉扫地。马克思主义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首先必须承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这样那样的主观随意性。不承认生产力标准,说到底,是不能彻底地坚持历史唯物论的表现。

如果说十三大明确“生产力标准”,是为了澄清当时的一种思想混乱,那么南方谈话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同样是为了继续破除困扰人们的错误认识。前述的一些抽象争论,当然不仅仅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但它以那样尖锐的形式展开却是与没把意识形态问题摆在正确位置有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意识形态

^①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638 | 领域的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面积累有丰富的经验。否定或者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后果是严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应引以为鉴戒。应当密切注意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倾向。但是,如果任意地把意识形态斗争抬到至上的位置,认为它高于一切,干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这方面,我们党也有沉重教训。对这个问题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一方面,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密切关注其动向;另一方面,如同不能把反和平演变当成中心一样,也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至上论”。在当前,至高至上的,只能是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那个“中心”,其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为了纠正“抽象争论至上论”倾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不搞争论”。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①过去说“清谈误国”,“空论”、抽象争论何尝不会误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清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就是为了根绝此弊。当然,所谓“不争论”,是指对现行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与决策持有异议者,不主张在报刊发表文章公开争论;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反映,不要对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造成干扰。至于那种为了使党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更趋正确、合理和完善的积极建议,是欢迎的;属“双百”方针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在此列。

南方谈话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将“生产力标准”论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邓小平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这显然扩大了“生产力标准”论的外延。说这是发展,第一,它既坚持了“生产力标准”论(这是“三个有利于”中最主要的),同时又使“生产力标准”论由较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变得较为实际。后两个“有利于”是对前一个“有利于”的延伸、补充和具体化,因而对实际工作者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第二,从认识观上说,它更具全面性。“生产力标准”论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的本质和核心,这是无疑的。认识事物首先要抓住本质,但是在抓住本质之后,还要注意事物的其他联系和关系。这是认识的全面性要求。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是否就一定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就一定提高?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来看,不一定。理论上本应当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上却往往存在反差。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第三,它更明显地体现了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并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在语言表述上,既突出了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的根本任务,同时又强调了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联系起来。他在提出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一起,作为判断党的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的不可分离性,就不仅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更有利于体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 “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这是在社会上引起较大震动的又一个理论观点。在一些同志看来,这个观点首先与传统的认识不一样。多少年来宣传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是讲: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其次,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的表述不一样。如十二大概括社会主义特征,论列了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还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再次,与邓小平本人过去的一些讲法不一样。如他多次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③，“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④，“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⑤,云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640 | 怎样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呢？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探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南方谈话既是新的概括，又是他过去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诚然，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过程中，有如上述，他论列过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但是，他讲得更多的，还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条。如1986年9月他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的谈话，就集中地完整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①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还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南方谈话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对这些谈话的思想的进一步概括。“社会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概括有这样四个优点：

第一，突出了拨乱反正的针对性。邓小平多次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在过去一个长时期里，我们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从1957年起，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本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四人帮”却鼓吹“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与贫穷画上等号，这就严重地败坏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因此，他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③。还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④“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发展生产力，与要努力纠正几十年来对发展生产力的忽视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曲解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有利于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1页。

第二,突出了包含新思想的创造性。前已指出,邓小平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是不完全的,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是一个新思想。既然有了这个新思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就不能不把它包括进去。把解放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来理解,就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这就是说,解放生产力,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而且贯串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个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性。社会主义虽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它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的状态之中。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大阶段,还将分几个小的阶段,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至少达100年。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将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既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也不可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就完全实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用了一串动态词,正是要体现这个历史特点。它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完全实现,只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即可能要到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才能完全实现。这有利于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稳定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政策。

第四,突出了追求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经常讲:“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①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③。他在南方谈话中也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④。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概括,充分体现了这个目的性。

有一种看法,对邓小平的新概括没有提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感到不理解,认为这是从“老祖宗”起一直讲下来的,怎么能不包括到“社会主义本质”中去呢?其实,只要深入思考是不难释疑的。首先,不提不等于否定这两条。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不能实现的(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许多谈话中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这两条是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42 | 为前提,不言自明地、理所当然地包括其中了。根据这个新概括,妄以为搞社会主义可以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了,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误解和曲解。其次,没有突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与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点有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科学的讲法是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即还必须要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和非按劳分配的其他分配方式作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讲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了。但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不能仅局限于说明其初级阶段,而应当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适用。从社会主义的最终要求讲,当然是要实现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但强调这一点又不符合其初级阶段的现行政策。这样,在表述上就出现了很难同时照顾的“悖论”现象。为了不造成新的困惑,聪明之举是不在字面上表现这两条。我想,这不能不是一种考虑。最后,这也是为了突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相对于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这两个原则来说,只具有前提条件和方法手段的意义。这就是说,它们与那两个根本原则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它们本身不是最终目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然重在突出目的性,因而对它们就没有必要加以特别强调了。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前已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当然,他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一是最初他主张的市场经济只是限定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范围,还没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考虑在内,那时这些成分还没有发展起来。二是在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开始还是强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①,后来党的文件上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也没表示过异议。但是他个人讲得较多的,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②,或“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③这样的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说明他的认识的发展历程。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不仅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且明确宣布作为市场经济重要运行机制的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可以坚决地试验,为社会主义所用。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
营方式、管理方法。”^①这就不仅是把市场经济作为一般的经济手段的抽象,而且
把它提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到“现代化生产规
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高度来作理论的论证了。这是邓小平思想的又
一个发展。它表明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虑已经成熟,
因而表现了要推行它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和不可逆转的决心。这对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论在我们国家的最终确立,即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起了关键性作用。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市场经济被看
作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认,是第一次将市场经济与
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物“焊接”在一起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对马
克思主义破天荒的发展。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这个
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说它
“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
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
确认,相对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的提出来讲,更是我们老祖宗们没有
说过的新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更大的飞跃。

南方谈话的上述一系列新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是,作为
发展也有不同层次。如果说前述有的新观点尚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观点、
个别结论的发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则
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认,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要从
根本上改写了。

当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和确认,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有效建立和有序运行,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路程。我国过去是一个有着几
千年自然经济历史传统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的商品
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实行规范化的市场经济的基础较差;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1页。

644 | 来尽管在不断地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但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大中型企业由计划经济机制向市场经济机制的转轨,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培育完善,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都还存在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这就使得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在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很难同时有效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再加上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不少人的经济生活、利益结构、活动方式,以及相应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动,甚至会出现一些社会扭曲现象。这样,如何把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同解决经济建设和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结合起来,使得在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又要精神文明建设不滑坡,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向上走,并且能够抵御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是个异常艰苦的任务。因此,由理论观念的确立,进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总体设计和模式创造的研究,再进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解决好上述诸多矛盾和冲突,不能不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深感欣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认,就表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理论的巨大突破,必将在实践上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带来巨大的飞跃。

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宣言

南方谈话对一些错误倾向的尖锐批评和一些新的理论观点的鲜明提出,使一些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一时转不过弯子,对加快改革开放的政策忧心忡忡,甚至对南方谈话本身也怀有疑虑。一个时期,叽叽喳喳的不少这样那样的奇谈怪论,归根结底是,如同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姓“社”姓“资”一样,也怀疑南方谈话存在姓“社”还是姓“资”问题(至于海外一些报刊大造舆论,诋毁南方谈话,那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评议,历史将自有公论)。其实,无论是从南方谈话的内容本身来看,还是从根据南方谈话制定的方针政策的两年实践来看,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南方谈话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宣言。

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致党中央的辞职信中写道:“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①事实正是如此。邓小平投身革命后,几十年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如一日,都在执著地追求、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片热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早年旅法勤工俭学时,每每听到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相争辩时,他“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①。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邓小平便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他的一生“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接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②。这以后,中国革命历经艰辛,他个人也屡遭磨难挫折。但无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那血雨腥风的日子,还是在百色起义红七军辗转作战的艰苦岁月;无论是在江西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十年浩劫时期,他都从来没有怀疑过所选择的信仰和追求的事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新复出,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他自己所说:改革虽然是我最早提出来的,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③。无论是在70年代末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初泛之时,还是在80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雪崩”之际,邓小平都是力挽狂澜,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勇敢地捍卫社会主义事业。这10多年间,他在主要批判和纠正“左”的思潮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对右的思潮的警惕和批判。实际上,他对四个坚持既讲得最早,也讲得最多,而且一以贯之,不存在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接受邓小平的辞职请求的决定中表彰他的卓著功勋,认为邓小平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决定说: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④。党中央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实事求是的。邓小平能获得如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对南方谈话的疑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这个谈话的误解、甚至曲解。只要认真通读谈话,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根本不应当产生姓“社”还是姓“资”问题。

首先,从南方谈话全部内容看,虽然重点是放在批评“左”的倾向,把人们从一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④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646 | 一些抽象争论的困惑中解放出来,以便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效益,更加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但是这丝毫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意思。如果说南方谈话的前三部分主要是在论述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点,那么后三部分就是侧重阐释基本路线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而且,讲到后者重要性时所给的分量和力度不亚于前者。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①他还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②看,一个为社会主义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战士,非但没有忽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其信仰是多么的坚贞如初啊!

其次,南方谈话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表南方谈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出现了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倾向。邓小平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啊!那么,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在邓小平看来,这个倾向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是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关系到国家前途、社会发展和人心向背。我们国家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能发展得这么快,人民群众能这么拥护党,社会能这么稳定,政治能这么昌盛,就在于有这条基本路线。邓小平与广大人民的心是相通的。谁坚持这条路线,人民就拥护谁。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谁就被打倒”。因此,他再三强调:“说过来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一变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就人心不安”，“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①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讲100年不变，不是说只管100年，到了101年就要变；而是指坚持基本路线的长期性，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②邓小平所以强调“一百年”，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是一个上百年的历史阶段，这条基本路线是管整个初级阶段的，而且在于它本身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怎样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锦囊妙计就是长期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使人民真正感到“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③，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优越。这样，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才算基本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④。因此，邓小平提出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就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这个根本点出发的。

但是，怎样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变呢？重要的在于教育人、培养人。这不仅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讲的一个问题，也是在他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的着眼点又是什么呢？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⑤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⑥。

在邓小平看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③④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648 | 心”^①。他发表南方谈话,就是立足于这个战略高度。通读南方谈话,不难发现,这是贯串全文的一根红线。

第三,南方谈话提出的新观点都姓“社”不姓“资”,其阐发的大政策都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但他不是以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条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因而,他敢于摒弃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固定观念,在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观点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传统,其实,它开阔了认识社会主义的视野,使社会主义立于科学的现实基础之上。南方谈话提出的所有崭新的理论观点都姓“社”。南方谈话阐发的所有大政策都是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

比如,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和经营管理方式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言,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过去把它视为只姓“资”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和某种社会制度相结合,确实有一个姓什么的问题。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姓“资”。现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要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而它姓“社”不姓“资”。

再如,“三资”企业问题。这是我国目前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三资”企业就资本主义那部分来说,当然姓“资”。允许发展“三资”企业,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发展“三资”企业只要适度和健康,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又一次地对此作了具体剖析。他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②他批评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③为什么不怕?有社会主义经济作主体,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又如,建立经济特区,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一些同志从一开始对办特区就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先后两次考察了深圳和珠海特区。他对特区的发展是满意的。在1984年考察时曾题词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①8年后再次视察,在南方谈话中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②

还有分配问题。邓小平一贯强调共同富裕原则。这在前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率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为了纠正长期以来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左”倾顽症。过去把共同富裕视为同步富裕,而同步富裕只能是普遍贫穷。“致富”的客观规律只能是部分先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后共同富裕。这样的政策在一个时期、一部分地区可能会导致穷富差别的一定扩大,但是如邓小平所说:“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要“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③这说明邓小平的头脑是清醒的,是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目前分配中存在的问题的。

凡此种种,不一枚举。不难看出,南方谈话的新观点、大政策无一不是为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第四,南方谈话对一些敏感的政治是非问题的态度没有退让,表现了一如既往的坚定立场。

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邓小平早就明确界定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贯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整个过程中的长期任务。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重申了这个观点,并且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④他特别对“特区”敲起了警钟,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⑤有的同志往往不从政治上看问题,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想当然地看成只是搞“大民主”,或一般的非政治化倾向,或宣扬一般性的错误观点,因而对邓小平鲜明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72、374页。

^{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650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理解。这是一种认识的错位。邓小平多次说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①。“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②“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③。“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④因此，这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政治概念。模糊或淡化它的政治内涵是有害的。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如邓小平本人所说，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⑤。与上述倾向相反，也有的同志把一些属于学术理论上的错误观点，甚至是不同意见，往往不加分析地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高度来横加批判，从而混淆了学术是非与政治是非的界限，混淆了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立场问题的界限。这种任意地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内涵和外延的倾向同样是有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防止这两种倾向。

反和平演变问题，如前所述，是90年代初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在强调“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⑥因此，他提出“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⑦，强调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⑧他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⑨虽然说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在一定意义上，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是这次空前的曲折反复确实提出了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当然，这种反思应当是科学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邓小平正是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提出和思考这个问题的。因此，他既批评了把这个问题放在不适当位置的错误倾向，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反对腐败和廉洁政治是党风和政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反映愈益强烈。邓小平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南方谈话也强调了反腐倡廉、净化社会风气的斗争。他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⑥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①他还以历史经验为借鉴,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②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许多情况已经同50年代很不一样了。反腐倡廉,打击经济犯罪,净化社会风气的斗争比那时要艰巨复杂得多。但是,如邓小平指出的,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只要不手软,靠法制,并把它“作为大事来抓”^③,常抓不懈,各级领导率先垂范,那么,这个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④,共产党的性质,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高度

南方谈话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也提出了引起社会震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不仅如此,而且在进一步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以新的观点和新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南方谈话既是邓小平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标志着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化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过程中,邓小平就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早在1979年春天,他就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⑤在他主持制定并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条道路的一些内容作了最早的概括^⑥。这可以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始形态。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⑥ 即《历史决议》最后一章第(35)条所讲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10条。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44页。

652 | 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第一次以规范化的形式明确提出。从此,这个概念就成了这个理论的科学称谓。

从思想史的发展看,人的认识都要经历综合(总体)——分析(部分)——再综合(总体)的阶段。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在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理论概括时,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他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对这个理论的概括属最早的综合性的认识的话,那么这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邓小平对这个理论的思想也逐步地深入了,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愈益深刻的见解。由于长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不少同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存在相当大的误解甚至是扭曲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思考,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通观《邓小平文选》第3卷,他的这个思路再明显不过了。

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论。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84年6月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针对长期忽略发展生产力的“左”的观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②在这之前,邓小平针对“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的谬论,在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就已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了个设想,提出到本世纪末建立小康社会。他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③在这篇谈话里,他继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④;社会主义恰恰是要消灭贫穷,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社会,“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⑤。这以后,邓小平反复讲这个根本观点,有些思想还作了进一步发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还作了部分调整,即将原来设想的到下个世纪中叶在经济上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国家的水平。^①在1985年4月,他谈到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②

其次,以肯定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为基础,阐述全面改革开放的思想。既然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怎样发展生产力?除了注重生产力内部诸多要素的发展外,就是要改革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二大,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以后的主要历史内容就是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重点也转向这个方面,强调它的伟大意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我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这里的改革既包括农村改革,也包括城市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既包括对各种旧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对与其相联系的各种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变。因此,改革是一场异常重大、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开展与深化也是异常艰巨复杂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决定颁布之后不久,邓小平强化了对改革意义的认识。他先后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③(1984年10月同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④(1985年3月同日本二阶堂进的谈话);“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它“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⑤;“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⑥(1986年9月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在邓小平看来,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① 1987年2月18日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说:“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同年3月8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也说:“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654 | 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开放,开放政策是改革的一部分。这样,从80年代中期起,基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而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思想理论就在逐渐地进行建构。

第三,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虽然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早已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但是,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要求对我国的国情作出深入的具体分析和科学的理论论证。这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这个报告以这个理论作为立论的根据,在从理论上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国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明确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肯定了十三大报告的这个思路,批示:“这个设计好”。在大会前,他指出:我们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①。在大会后,他又说: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②。

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完整的科学表述。这个科学表述以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上述重大问题的理论思索,标志着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回答。这也意味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过对各专题的分解性认识之后又在总体上有了一个综合性的轮廓。十三大报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第一次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二个基本观点,并且正式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科学概念。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体系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十三大以后,邓小平的思想还在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在继续深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理论又作了新的概括。如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论述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12条共识;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就邓小平本人而言,将主要由他创立的这个理论根据新的实践的发展使之系统化、体系化,则是南方谈话。

说南方谈话是篇体系化的著作,不仅在于它所论述的内容构成了体系,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他长期思索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涉及了,而且在于同《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其他文献相比较,是篇综合性的将其思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邓小平文选》第3卷119篇文献,除了个别讲党史、军史,悼念历史人物和表达个人辞职心愿的文献外,凡属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献多为短篇的专题性谈话或讲话。这些谈话或讲话多系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要求,着重分析和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有的侧重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的侧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有的侧重于谈坚持改革开放,有的侧重于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侧重于讲“一国两制”的构想,有的侧重于讲国际关系的世界格局,等等。与其他各篇文献不同,南方谈话不是对某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是对整个理论的综合论述。它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篇幅最长、理论分析最完整的著作。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终卷篇,实际上可视为对全书阐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总结。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南方谈话对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除了使之形成体系外,还在于给这个理论赋予了许多新意,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前述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些新的重要观点,既说明了这个理论的新发展,也体现了它的新境界。但是,对于南方谈话达到的新境界的认识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南方谈话虽然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但不是过去思想观点的简单重复和总汇;它用一些尖锐、鲜明、透彻和凝重的语言来表述,即“旧话新说”,丰富了其内涵,提高了其意境,使之具有引人注目的新鲜感。

比如,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长期不变,这是邓小平过去讲过很多次的一个思想。早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656 | “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①随后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讲:“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②1986年9月,他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还说:现行政策肯定不会改变,“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③。就是在处理1989年政治动乱最紧张的时候,他仍然镇定自若,对中央负责同志交代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④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变动之后,国内国外都有不少议论,担心基本路线会变。邓小平会见海外人士和外宾时不断指出:“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⑤应当说,这些都讲得很明确。当然,在不同时期,邓小平讲这些话的背景和内涵不完全一样。南方谈话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无疑是要重申他过去的思想,但是他使用了一连串凝重的语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⑥这不仅使原有的思想具有了新意,而且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再如,像改革要敢闯敢冒、大胆试验、错了再改,这也是邓小平带有一贯性的思想。在1985年3月他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就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这件事尽管有风险,但必须做,我们意识到了这种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345、34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稳,走一步,看一步。”^①随后在6月的一次谈话中,他举深圳特区为例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②1986年9月,他重申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时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现在做的事“是一个试验”。改革“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③。1987年4月,他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也说:“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④但是,在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对于加快改革,党内外都有些不同意见。改革的快与慢成了当时议论的问题之一。针对这种情况,在这年7月,他讲道:“改革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了问题就要进行调整。去年和今年我们继续在搞改革、开放,但步子放得稳重了些。现在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步子太慢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大胆一些。”“实践证明,步子放大些有利,当然步子大风险也就大。”^⑤到了1988年,他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改革步伐。他说,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⑥到1989年后,国家进入治理整顿阶段。邓小平仍很关心改革的快慢问题。他在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再次指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⑦一年以后,南方谈话中的相关内容正是上述思想的继续。但是,它使用了一些具有尖锐性和鲜明性的语言,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658 | 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①还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②这些话,不仅有明显的针对性,而且其思想之意境和内涵有了很大的丰富,使之产生了“不似首次,又似首次”讲的社会效应。

第二,南方谈话的一些新观点,既是对新的客观情况、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是邓小平以往思想长期积累的理论升华,因而这篇谈话产生了具有“海纳百川”式的新境界。

比如前述“三个有利于标准”论,骤然看来是个全新的思想,但是,仔细思索,又会感到这个观点不仅吸取了毛泽东的一些好思想,而且邓小平本人以前也有过接近它的表述,因而也可视为是他本人以前思想的飞跃。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1978年9月,他就讲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一年以后,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又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④到了1983年初,他进一步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⑤显然,南方谈话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论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再如,“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问题,这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新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邓小平以前思想发展的新概括。反倾向斗争是邓小平十多年来一直讲的一个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重点是防止和反对“左”的干扰,认为这是在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主要倾向。在1981年3月《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他说,“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但是他强调:“对‘左’的错误思想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①。1985年8月,他回顾历史经验说:“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②同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继续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左”的大亏,“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③1987年是邓小平讲反倾向斗争最多的一年,也是他对主要倾向讲得最突出的一年。在这年初处理学生闹事之后,他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较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④随后在4月的两次谈话中,他又强调了反“左”的干扰是主要倾向。在4月26日,他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⑤在4月30日,他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⑥6月,他进一步讲到历史教训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⑦7月,他讲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时,进一步说:“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⑧10月,他又回顾历史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660 | 整整二十年。”^①经过上述若干次谈话,邓小平对“左”右两种倾向的认识愈益鲜明了。在1988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进一步说明了历史上“左”的错误的内容,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南方谈话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再认识,又是上述邓小平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则是基于上述认识,再加上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的历史反思而在理论认识上产生的飞跃。这个新观点,既源于以前的认识,又高于以前的认识。南方谈话在理论上达到的新境界,这种情况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南方谈话相对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其他著作来说,不仅有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论断,而且还有对这些观点、论断的较为深刻的阐释,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它的理论力度。这是南方谈话的理论呈现出新境界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邓小平说过:他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③。邓小平以前的一些谈话较多论断,较少论证,更强化了 this 印象。南方谈话由于有较多的阐释,相对地讲,就突出了其理论角度的色彩。

比如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如前所说,这个观点,邓小平在此以前讲过多次。就对这个观点本身的表述而言,也没有使用比过去更新的语言。但是,南方谈话对这个观点作了一番理论的阐释。不仅列举证券、股市这些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来分析,而且把市场经济上升到“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来认识,这就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理论感。

还有南方谈话第二、三节,讲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问题。这个思想,他过去也讲过许多次。远的不说,就在1988年1月,他曾在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④1991年8月,他又说过:“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还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注释第99条。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指出:“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①不难看出,四个月后的南方谈话与这里所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有些连语言都一样。但是,南方谈话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展开论证,从几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并且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还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新思想,^②这样,南方谈话所讲的这个问题比起四个多月前的谈话来,就有了更为厚实的理论底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五、结论

南方谈话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还可以从其他视角或侧面来加以论列。但是仅从上面分析,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篇著作的巨大分量。它是总结邓小平思想的煌煌大作,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正因为这样,它成了十四大报告的思想理论基础。

1992年2月,江泽民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讲到十四大报告起草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指出:报告要通篇体现邓小平今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报告出色地体现了这个指导方针。在对邓小平的思想特别是南方谈话的思想进行再认识之后,它明确地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并且以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冠以邓小平名字的这个理论作了新的概括,论述了其包括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6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662 | 它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①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全党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到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再到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认识的历程。

对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认识往往需要时间。它诞生时，人们很难完全认识它存在的意义。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伟大才能越来越为历史所容纳。马克思主义是如此，列宁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是如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将是如此。

怎样认识这些理论的伟大意义呢？也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论列。但是，我想，首先要了解这些理论的精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在于它有两大发现：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所以成为列宁主义，最根本的就在于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开辟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理论体系来认识的总理论），所以能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能否说最根本的，在于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理论形成的时间还不长，一方面，这个理论还有待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对它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可以推动我们去进一步研究这个理论的价值。

对这些理论的以上认识能成立的话，我们就不难把握这些理论的伟大意义。如果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的伟大贡献是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则可视为使社会主义由一国道路变为多国道路，那么邓小平的贡献就是使社会主义由传统走向开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放。以他为卓越代表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具有更大的包容量,包括吸收和消化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知识和技能,使之变成社会主义的营养物,从而给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以新的生命力,使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中国社会主义在蓬勃发展的伟大奇观。

十四大报告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简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要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在当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就是学习这个理论。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评价。我们认识了邓小平理论的上述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会作如此高度的评价。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我们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

(原载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 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十年了。这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无论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看,还是从新中国 50 年的历史看,这十年是我们国家进步最快、变化最大、成就最为显著、大喜大庆之事最多的十年。其中许多得益于南方谈话的发表。就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而言,也是如此。南方谈话既汇集了理论的创新之果,又推动了理论的创新之潮。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是南方谈话发表以来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最重要的发展。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现了伟大的创新。

一、以南方谈话为根本标志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

老祖宗一直教导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作等同的理解,因而也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这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呢?只是原本理论的扩展、充实、深化、个别理论观点的创新,还是包括着理论形态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是一个理论形态发展至今,还

^{*} 这是 2002 年 1 月作者在广东深圳召开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是在原本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又会产生出新的理论形态？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怎么认识的问题。

按照老祖宗们的辩证法讲，任何事物都包含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也应这样分解。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东西，只具有普遍性而不存在特殊性。如果这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属于这个系列的任何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应具有的共同内容，可以列举这么一些：如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剩余价值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承认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无产阶级担当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成功后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不断改革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长，使传统观念得到根本改造，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未来的社会大体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等等。在马恩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属于他们个性、特殊性的东西，也可以论述这么一些：如主要依靠无产阶级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统一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消灭了商品和货币，各尽所能、通过劳动券按劳分配，等等。当然，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那些内容从来没有单独孤立地存在过，最初也很难将两者加以区别，何况随着历史发展也会发生转化。这是根据后来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进行反思所作的纯理论的抽象分析。因此，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也不可能作这样的具体解剖。属于共性的那些内容，与实际上属于马恩特质的那些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它寓于带有马恩特质的理论形态之中。科学研究的作用，就是要拿起辩证法这把解剖刀，对它进行理论的解析。

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分析，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出发，改变属于马恩特质理论形态中的社会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理论观点。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又为提出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建成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为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他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建设理论，并提出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

666 | 初步探索。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上,将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强化了计划经济;在生产资料领域实行产品调拨,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承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等等。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等等。显然,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对马恩特质理论形态的重要发展,也有一些重要变化。但它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认识没有突破马恩的特质理论形态。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对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作了巨大贡献。他领导中国革命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特殊途径。他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强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对外关系、国家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与政策。这些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对马列特质理论形态的重要发展,但也未能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取得根本突破。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失误,虽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但也深深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就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特别是通过南方谈话,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以及苏联、东欧建设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正反经验的总结,提出和深化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并且建构起了既是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又同以往几个理论形态有重大区别的新社会主义观。比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邓小平在十三大前已明确,在南方谈话中加以强调,并在后来又有了丰富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从分析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上百年。这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理论是我们党为什么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据,有助于克服我们国家数十年都未能克服的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急性病,并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衔接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个理论的创立,为构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年的长期思考和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创立是对具有马列特殊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巨大变革,是一个区别于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形态的新的社会主义观诞生的根本标志。

——社会主义主体论。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造。既然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未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共存同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政治关系方面,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在少数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这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期。社会主义主体论是相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纯粹论”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过去讲得较多的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尽管过去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却往往是在这种意义上去认识。其实,这些并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性内容,许多是属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质的东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界定,改变的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质内容。他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①无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68 | 要求来看,还是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来说,这两条确实是最重要的,属于最本质的东西。其他几条,或是实现它的手段,或是它派生的属性。单一的公有制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第一,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表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形式;第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形式。因此,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特殊形态的概括,也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那种理论形态。

其他像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等,都给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了新质规定。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艰辛求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在十四大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将它进一步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且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就其理论形态的特殊性言,是一个区别于老祖宗们那种观念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形成了同具有马恩特质的理论形态很不一样的又一个理论形态的新阶段。

理论形态的发展,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会显现出不同质的阶段性或层次性。一个半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按照我国理论界以往的习惯说法,有马克思主义阶段(狭义的,或称马恩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邓小平理论阶段,云云。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以为这样的分法不是很准确的。从哲学上讲,仅这样来说,就把阶段的层次性简单化了,没有将各阶段作具体分析。其实,这几个阶段的质的规定性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部分质变的大小是不同一的,因此不是处于同一般大小的阶段,即属于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有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较大的阶段,有的发展则是一个较小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构成了一个与传统认识很不一样的大阶段。正因为如此,才称之为新的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什么能构成一个大的阶段呢?归根结底,还是列宁说的: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

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①马恩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是基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的推论。他们那时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的理论认识是否正确,要由社会主义的实践来判别。所以,他们自己也只把那些认识视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从不认为是现成的模式。他们的有的观点,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有的认识,则由实践作了修正。列宁主义的发展,就是对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部分修正。但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经历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比较短。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对在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带有极大的开拓性。既然如此,那就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不成功的教训。这些都是后来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宝贵财富。正因为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作先导,有苏联以来七十多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积累,再加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丰富经验,因此,邓小平理论就具备了能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条件。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发展阶段作这样的区别,是否贬低了那些未构成大的发展阶段的理论形态的地位呢?我以为,不会。第一,这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理性问题。在科学研究的入口处,要抛弃任何情感好恶因素,只能用理性思维来衡量一切。历史是最终的裁决者。第二,历史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殊建树。有的在这方面的贡献更突出,有的在别的方面的贡献更大。分析某个历史伟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丝毫不意味着贬低别的历史伟人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第三,这里只是分析理论贡献,而不涉及对历史伟人的总体的、全面的评价。通过分析,得出邓小平理论对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构成一个大的阶段,丝毫不存在“扬邓抑毛”。毛泽东对现代中国革命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对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以出其右。还是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永远把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但是,就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来说,尽管作了艰辛探索,主观上也很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巨大发展,事实上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观点,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和主观方面诸多因素的作用,终究未能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此,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670 | 物。“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①对于毛泽东,既不能脱离历史条件予以苛求,也不能将历史没有提出的任务提前赋予。事实上,毛泽东没能实现的夙愿,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成了。这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如果把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作为这个理论的前期积累,那么也可以说,它是“始于毛,成于邓”。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也包含了毛泽东的贡献。

二、南方谈话的巨大思想解放作用与“七一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尽管是对各方面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南方谈话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仅为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观起了总其成的作用,是科学社会主义又有了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而且为继续丰富和发展包括它自身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解放思想的强大武器。

南方谈话产生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无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是巨大的。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思想解放的历程。但是,思想解放的历程同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呈波浪式和涌潮状。既然如浪潮,就有高潮和非高潮、大潮和非大潮。思想解放是否高潮、大潮,主要不是就其具体内容言,而是指其震撼社会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引发观念变革的深度。这些年来,每当我们国家的发展处于重要历史关头时刻,就要经历一次极具震撼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大潮。

第一次大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我们国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选择:是走过去犯过“左”的错误的老路,或改换门庭走资本主义的邪路,或另辟蹊径走发展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义的新路。这次思想解放着重批判成为当时主要倾向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帮助人们解除长期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作了重要准备。这次思想解放,由于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们国家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他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既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指南,也对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作了深刻总结,是党面向世界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第二次大潮就是南方谈话的发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使我们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重要历史关头。苏联、东欧“易帜”后,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当时出现的一些议论和倾向,使不少人感到困惑。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它,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不仅如此,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等,以及前面论及的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陈旧观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大解放。这次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就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生的影响看,这一次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巨大。那一次思想解放产生的能量,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理论宝库,也可以视为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谆谆交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南方谈话为指导,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精神,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法宝。江泽民在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指出: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因

672 | 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①历史发展正是这样。十年来,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影响之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都在它的光焰的照耀之下。这里,最重要的:

一是根据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解放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四大不仅初步地建构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等进行阐述,使之初具理论轮廓。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许多政策规范,进一步将十四大的理论轮廓具体化了。经过这两次阐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建立起来。党的十五大继续以南方谈话为指导来分析形势、制定政策和提出任务。十五大在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阐发,并在党章中正式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机制作了新的表述,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新的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决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过去的一些固定观念。这样,在南方谈话的指引下,经过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初步解决了。可以说,这是1978年以来两次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

二是江泽民代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在2001年发表的“七一讲话”。“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春天视察南方时提出,犹如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样,将展现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江泽民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全党推出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十五大,讲了75年党的先进性,基本上是“一个代表”思想,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间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基本思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党早已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跨世纪的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建设,即把党的建设置于改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1页。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同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要求党的建设有一个宏大、长远的战略眼光。既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那么,党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它的自身建设也不可能离开世界。把党的建设放在世界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将使党成长得更加坚强,能经受得住各种严峻考验。同时,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有利于增强党的素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就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在过去党的许多文献和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也有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大量论述,但那比较多地是在党的任务的层面上讲的,且是分别而论的;从来没有像江泽民把那两方面的内容,提到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并作为三位一体的完整思想加以提出。讲党的先进性,相对于讲党的任务而言,在党的学说中,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作出的明晰理论概括。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是第一次。不仅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和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念,以及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还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大潮已扑面而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在进入千年世纪初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在我们国家,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从政治层面讲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社会主义问题,第二是党的问题。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作了精辟概括,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既然如此,怎样进一步认识党的问题,就需要努力解决。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党的建设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度还比较突出。邓小平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组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时明确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此后,第三代中央领导一直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力量,作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十多年来,制定了不少条例、采取了各种措施、处理了许多大案要案,努力惩治腐败,纠正不良作风,加强党的建设。这样,在十四大、十五大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

674 | 义”这个根本问题之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已有的丰富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又一个根本问题。既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那么同样可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回答,也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还在继续。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以“三个代表”的新理念,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奋斗业绩及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前瞻并规划了党在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它的科学内涵、立论依据、基本要求、体现途径,以及相互关系等都更加明确起来。这就使 2000 年春天提出的“三个代表”这个新思想,初步地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形态。当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还没有完结。到今年(2002 年——编者)秋天召开的十六大,对它可能还有新的丰富和发展。经过“七一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形态已经建构起来。

不仅如此,“七一讲话”还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的变化,面对党的地位、环境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许多新观点。如:关于判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主要标准、关于判断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成员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主要标准、关于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分子入党的主要标准、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称谓、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等。这都是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阶层构成的分析作出的新论断。这里的许多看法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无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的创新。从南方谈话始,我们党有两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如果说第一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那么,这一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的创立,则是对党建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七一讲话”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解放思想的又一个宣言书。它提出的那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同样要求人们改变长期以来的许多观念。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

义的态度,第一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不坚持会迷失方向;第二是始终反对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此,“七一讲话”特别强调要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了深化“三个解放”、研究“三个规律”的任务。即:一是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二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三是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便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七一讲话”号召全党,坚持科学态度,大胆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每进行一次理论创新,既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又会引发一次思想解放浪潮,巨大的理论创新,会带来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从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2001年发表“七一讲话”所进行的理论创新,使我们正在经历并将继续经历再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这一次思想解放同样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历史作用,还不仅仅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思路。因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要求改变过去与此不相适应的那些政策和规定,还要求深化对党自身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去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而是对那些不能体现“三个代表”先进性要求的具体制度、工作方法和运作机制加以改革。只要按照新思路深化了对党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那么,沿着这个理论的思路和历史的逻辑走下去,就势必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辟出新路。

从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个视角看,党的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建设,深化对党自身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执政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当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在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领导能力、执政水平。党治理好了,对于国家的治理来说,就解决了最为关键的大头,也就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因此,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一方面,提出了“治国先治党”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坚持在

676 | 实践中“不断探索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①的实施原则。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也就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新的动力。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提出的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决策，就是以期“通过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可视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新途径，有助于开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三、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激荡

党的理论的创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不会没有斗争。除了同反对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作斗争、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以外，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来说，即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它具体表现为：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一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指南性、科学方法性和不断发展性。我们的老祖宗，自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始，就不赞成对他们的理论采取非科学的态度。恩格斯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理论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作为科学来看待。如果不把他们的理论“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把马克思“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②恩格斯批评的这种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个半世纪以来，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决不会因良好愿望而减轻。特别是当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更要充分认识这种教条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它一旦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就会祸害无穷，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最后酿成亡党亡国的惨痛悲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奋斗的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其表现形式时隐时现，时伏时起。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8页。

将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称之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也叫做“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臭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根据“七一讲话”精神,我们姑且称之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前期和新时期初期的都不说了。就南方谈话发表10年来,每当社会的发展进入重要历史关头,每当进行巨大的理论创新时,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就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是南方谈话前后和十四大时期。在国内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有所扩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等根本重大问题的怀疑、动摇的倾向有所抬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经典之论不仅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有对搞乱人们思想的思潮的尖锐批评。经过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对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关系我们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决定,从而使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导作用更加牢固。

二是党的十五大时期。1997年2月,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逝世,我们党能否继续沿着他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为国内外举目关注。坚持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噪音又有所增大。但是,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宣告:要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针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学风,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

678 | 立起来,没有出路。这些论述,再次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对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赋予了新的内涵。

三是在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特别是“七一讲话”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的观点之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凸显出来。什么“七一讲话”专门为私营企业主入党敞开了大门,要把新资产阶级大量拉进党内,云云。于是,这类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议论的热点、困惑的难点。

这两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思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做了长期的、大量的调研工作,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重要著作,研究了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长期执政的政党垮台的情况、有关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通过调研,江泽民深切地感到: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和国家要应对挑战、继续前进,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如果僵化半僵化、因循守旧,国家就会落伍,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七一讲话”所提出的新的思想观点,正是以两年来大量的调研为基础,集中全党的智慧,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七一讲话”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格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所有制不同、富裕程度不等的各类社会群体。应当怎样看待他们的政治表现、社会作用,以及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不应当固守过去的老观念,而应当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出发,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出发,实事求是地、与时俱进地来看待这些问题。“七一讲话”提出的新的思想观点,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精神,而是老祖宗们所倡导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具体体现。

两种马克思主义观表现出来的这一次又一次的尖锐对立,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十分不易。它同样具有异常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就加强教育而言,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教育。就克服教条主义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更具有普遍意义,更能长远起作用。实际上,老祖宗也是这样强调的。恩格斯一再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指

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他明确提出，在研究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①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教育，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宣传普及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铸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辉煌，同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前已指出，讲两种马克思主义观是就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而言的，并不是说整个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就只有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斗争。就整个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而言，不同思想的相互激荡是激烈的。别的不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至少还有一种反对和否定的思潮不容忽视，其危害不能低估，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同样是异常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因此，就整个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言，存在着两个层面（或两种不同的类型）的斗争：一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坚持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后者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对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斗争，既不能混同，也不能重此轻彼，更不能只反一个而不反另一个。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肩负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坚韧不拔地将这两方面的斗争一代又一代地进行下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十多年来作了重大的理论建树。应当怎样予以评价呢？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和“七一讲话”发表以来，人们越来越关心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和对发展了的理论的定位问题。我以为，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异常辉煌的成就，使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已载入党的文件，为全党所公认，成为不争的事实。至于理论的发展是否构成为新一个阶段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权威部门来决断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作为普通学者，我个人认为：第一，要看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问题早就同世界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紧密相连。过去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就不能不跟作为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密切相关。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的发展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680 | 更是离不开世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就是时代主题已变成和平与发展这个大背景的产物。一方面,这个时代主题不是短时期就能改变的;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发展也会呈现出阶段性。这就要研究大阶段内的小阶段的特点。第二,要看目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否发生变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①这将我们国家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是要管相当长的时间的,能否在短期内加以改变,出现新的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这需要有战略的思考和历史的观察,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它也决定理论的发展是否构成一个新的大阶段的重要因素。第三,要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否构成新的历史性飞跃。衡量历史性飞跃的标准,即所要解决的历史基本问题包括上述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否有显著区别,因而是否形成了与前一个理论形态有阶段性变化的新理论形态,以及在其指导下社会历史面貌的变化是否形成了新的历史性大跨越。根据党的历史经验,理论和实践上这样的飞跃跨越,在以往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构成历史性飞跃的党的指导思想,从建党算起到党的七大经历了24年。邓小平理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十五大确立为构成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也经历了20年。如果加上此前的探索积累,那就更长了。当然,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理论的发展也不会不加快步伐,确立构成又一个历史性飞跃的新的指导思想的时间,要从新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上三条权且作为研究党的指导思想发展阶段的一个参照。当然,即使没有构成历史性的飞跃,没有构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可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目前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实际上也是当作党的指导思想来对待的。因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它是否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就研究党的现阶段理论发展史来说,从南方谈话到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的主要理论任务,是在建构邓小平理论体系,确立它的指导思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想地位。这以后的任务,就是努力丰富和发展它。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到“七一讲话”发表所形成的新的理论,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的卓越典范。 | 681

属于新社会主义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如果说其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这个理论形态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构成一个鲜明的新社会主义观,则是南方谈话。“七一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南方谈话,使新社会主义观包括了党的建设新理论,因而更趋完善。

新社会主义观的创建和发展,凝聚了以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智慧和心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这个新社会主义观的创始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深入,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又一个发展阶段。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

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历程,说到底,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程。在艰辛探索过程中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毛泽东思想阶段。第二个阶段,先是讲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等创新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就应当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首推邓小平在 20 年前发表的南方谈话。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今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具有异同寻常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为什么说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①。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主要体现在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和第 3 卷为代表的科学著作中,但从单篇著作言,则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伟大代表。它可称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识性著作。

第一,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从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载体《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来看,在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著作有170多篇,除个别讲党史、军史、悼念历史人物和表达个人心愿的文献外,凡属涉及理论问题的文献多为短篇的专题性谈话或讲话。这些谈话或讲话多系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要求,着重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各有侧重。相比之下,南方谈话不是对某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是对诸多理论问题的综合论述。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他长期思索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都涉及了,因而是一篇将其思想形成为比较系统化的综合性文献。它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篇幅最长、理论性格最鲜明的著作。

第二,南方谈话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比如改革姓“资”姓“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体炒作的热点,对扩大改革开放造成巨大压力。南方谈话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实质,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举特区和“三资”企业的情况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①再如,“左”与右的倾向问题,也是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南方谈话辩证地阐述这个问题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还严厉批评一些不正确的宣传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一个时期,对这个论断有很多异议。应当怎样看待呢?从理论上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应当超越“左”与右的思维定势。然而,历史印迹的消除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倾向那种倾向的出现往往不以人们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684 | 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了,在实际工作中就应当有右批右,有“左”批“左”。但根据历史惯性,“左”比右难以识别、难作批判。邓小平的许多论断是立足于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讲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具有战略性意义,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南方谈话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过程中已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精辟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过去一是只讲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②南方谈话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一是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二是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南方谈话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同人民利益标准联系起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谈话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1096页。

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这既是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正确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它更加凸显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新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本来是党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点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左”的思想发展起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事实上不够格”^②。因此,邓小平不断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南方谈话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摒弃关于整顿还是发展的争论,不仅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而且鲜明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他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样的“发展就不要阻挡”。“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③这个思想对于后来国家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先导。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过去一直没有规范性的表述,比较多的宣传主要讲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④南方谈话在破除人们的思想顾虑时进一步作出了振聋发聩的理论性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这个概括尽管带有“定义”性,但不能脱离了具体时空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解读它。第一,它是基于过去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所犯的错误的而突出拨乱反正的针对性提出的;第二,它是基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提出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5、3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36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86 | 第三,它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因此,它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如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运行机制;乃至毛泽东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等,但都不是要从根本上去否定计划经济,尽管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闪光思想。囿于传统观念束缚或“左”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时期,鼓吹市场经济被视为离经叛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1979年始,邓小平本人就在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前后讲了十四五次之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①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②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发展。

南方谈话正是由于有上述特点和贡献,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的那些理论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二、南方谈话为什么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

南方谈话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有诸多原因。从客观上说,与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在上个世纪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2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国际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瓦解,中国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吗?在国内,经历了政治风波,改革开放的路线对不对,还要不要坚持?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许多困惑和疑虑,提出的有些问题带有极大的尖锐性,各种思潮在激烈的冲撞和博弈。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航船面临着一个驶向何方和道路选择问题。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点,及时地回答了那时出现的各种尖锐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是南方谈话,而不是别的文献,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无疑又与邓小平本人的阅历、信仰、学养、经验、智慧和胆识等有密切关系。他的个人特质对南方谈话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务实,很少有思想框框,看问题比较辩证全面,善于抓住要害实质。按照他自己说的,“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都是些很朴实的道理。大本子很多,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种悟性,不仅是一般学人不可能有的,也是一般政治家难以获得的。邓小平能够获得“人才难得”的美誉,他的南方谈话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首先得益于这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即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毛泽东非常欣赏邓小平的这一点。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和建国初期讲话,都号召广大干部要学习邓小平讲的“按照辩证法办事”。所谓“按照辩证法办事”,从唯物论角度来说,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②正因为这样彻慧彻悟,南方谈话能够在“老祖宗”头上“动土”,破除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铁律”,并提出其他许多新的观点,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688 | 其次,对实际情况的真正了解和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政治决断能力。

邓小平是历史伟人、政治领袖,但他始终根植于祖国和人民的土壤之中,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而自励。他非常注意了解我们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况;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是否正确,以人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标准。这个思想像根红线贯穿在9 000多字的南方谈话之中。他举“傻子瓜子”问题为例说明党的取信于民的政策不能改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影响改革全局。因此,他谈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时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谈到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时也说: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地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正因为这样坚持人民的态度作为衡量党的事业的标准,所以南方谈话将“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善于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世界眼光。

邓小平早年旅欧勤工俭学6年,游历和考察过一些国家,对于后来形成宽广的世界眼光起了重要的培根作用。他在南方谈话前一年视察上海时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他说:那时有过“风庆轮事件”,同“四人帮”吵过架。风庆轮是个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10万、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那样用锤子敲打。现在厂子多了,这是质的变化。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所以能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那深邃的世界眼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改变过去对于世界发展走向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根据;通过对世界各国

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南方谈话中,这个宽广而深邃的世界眼光得到进一步的生动展现。他不仅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思想解放、敢于试验、敢冒风险的革命精神。

这是邓小平突出的个人特质和风格,在南方谈话中,极其鲜明地展现出来了。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①他讲到办特区的往事说: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他批评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并告诫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②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劲头,所以,南方谈话能提出那么多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理论观点,能发出催人奋进的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南方谈话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伟大宣言。

第五,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晚年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回忆旅欧勤工俭学的思想说: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90 | 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去西方学习。他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法的5年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自传中写道:加入共产党后,“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①从此,邓小平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党,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是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的所有著作都浸透了这一点。南方谈话也展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面对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挫折,邓小平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②坚定信念是一种精神动力。在南方谈话中,这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精神动力。

三、南方谈话的历史启示

南方谈话的发表虽然过去了20年,但洪钟巨响,声犹在耳。在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我曾写了二学南方谈话的文章——《当代中国历史航船的伟大指针》,认为它是指引当代中国历史航船开创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伟大著作。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在茫茫大海中劈波斩浪前行,南方谈话不啻是指引这艘航船的伟大指针。

第一,南方谈话是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的指针。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但不少地方或部门所指目标和具体对象缺乏,往往流于形式,成为空喊一阵的口号。而在一些为民众和媒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时,有关职能部门又表现为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申报制度。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民主政治的

^① 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一大进步。老百姓非常拥护,但又不满足于此,希望此项制度制定得更完善和彻底一点,不仅申报登记,还要公布于众、公开曝光,让广大群众知情,便于监督。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只要思想放得开一点,也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有关部门对于这个要求的答复却不尽如人意。据说有些技术性问题还没解决,目前公开曝光的条件不成熟,云云。其实,这就是顾虑太多了,如邓小平说的,“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①。用小道理压住了大道理,用技术性问题敷衍了政治性问题。邓小平说,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从政治角度看,广大老百姓的呼声相当强烈,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人的收入、财产不公开影响老百姓对党的干部乃至党的形象。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不公开,网上乱传,如果以讹传讹,对党十分不利。只有公开了相关信息,就会消除那些负面影响。多一分公开就多一分监督,群众也多一分对党的信任度。如果说县处级以上干部牵涉面大,情况复杂,那么省部级以上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做表率,说明我们党高层领导干部是过得硬的,不害怕公开曝光亮晒,这对老百姓增加对党的信任、消除一些负面看法,有极大好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像邓小平说的,胆子要大一点,冒点风险,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干部财产公开一小步,民主政治前进一大步。南方谈话解放思想的精神完全适用,一定要讲大道理,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全局道理管局部道理。

第二,南方谈话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南方谈话发表20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在有序进行,全方位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这里着重谈谈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应跟进问题。南方谈话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10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2010年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20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是南方谈话当年发表时未曾想到的。但也要看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一样,有两面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凸显。这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692 | 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的力度没有使其相应跟进有密切关系。邓小平一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坚持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这些年,我们党明确了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但是,怎样具体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应当说还在进一步探索过程之中。既然如此,不仅南方谈话讲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现代化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思想仍然有指导意义;而且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剥离术”和“结合术”的科学方法,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应有借鉴意义。

第三,南方谈话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针。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新思想就是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现在还不放心啊”。^①这些年,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但是,正如胡锦涛在最近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这是由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它会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色迷权失,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对症下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有利于制衡和制约。首先明确,这个分权不是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比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没兼,地方省市区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也没兼,为什么其他的一定要兼呢?这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尽管过去兼职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现在来看弊端不少,书记权力太大,若把握不住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有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也会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可以大胆地试,坚决地试,搞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坚持这种态度,就不会犯大错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南方谈话的告诫,应当成为指针。

第四,南方谈话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这个决策是适时的。发表南方谈话那时,尽管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但是它所涵盖的那些思想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一直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南方谈话中,他继续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精学马列,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新加坡等“四小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这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五,南方谈话是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指针。大家都记忆犹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②这些年,会议少多了,讲话也少些了,是很大的进步。但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来要求,形式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新党八股的文风问题很突出。“坊间”议论:一些干部的讲话往往是套话成堆、大话盛行、空话连篇,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思想内涵,而是拼凑排比句、罗列讲重要性的各种词语。这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694 | 议论可能有些夸张,漫画化了,但形式主义的文风,确实到了需要大声疾呼、坚决整顿的时候了。事实上,已有不少舆论呼吁,要讲短话、讲真话、讲实话、讲新话、讲管用的话。这方面,要学毛泽东,要学邓小平,讲话直白、生动、风趣,没有那么些“穿靴戴帽”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规范语言”。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学不到,但讲短话、讲真话、讲实实在在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会讲话,应当敢讲话。除了重大场合、重要会议需要念稿以外,一般情况最好不拿稿讲,口语交流,亲切生动,受众爱听。一些海外政要有这种训练,共产党的干部也应当有这个本事,不仅在讲话形式上让人爱听,更要在讲话内容上真正让老百姓满意。按照邓小平说的,要超过他们,才能更加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能耐。要充满自信,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伟大的历史文献往往会跨越时空的局限,南方谈话正是这样伟大的文献。

(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南方谈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感召^{*}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被称为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对于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①。2002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时,我撰文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怎样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在文章中还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阶段”,解读为一个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形态;

* 这是作者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撰写的系列著作之一,《北京日报》在2012年1月16日的《理论周刊·学习与答疑》专栏发表时改题为《重温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696 | 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10年过去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形态。这个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涵很多,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至科学发展观,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许多创造性发展,但这些理论创新的最突出的代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党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思想,则是由于20年前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因此,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具有非同寻常的伟大意义。

(二)为什么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呢?

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若要鼓吹市场经济,就是离经叛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必说20世纪前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外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探索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遭到严厉批判;就是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一个时期,尽管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宣传媒体一直将此视为禁区,任何人也不能越雷池一步。邓小平本人自1979年始在小范围谈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研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前后达十四五次之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①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②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十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2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相继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使这个理论愈益丰富和完善。因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三)为什么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呢?邓小平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战略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按照陈云的说法,邓小平虽然不是一把手,但实际上是新时期的“第一位的领导人”^①。他发表南方谈话时,尽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关心和思考党和国家大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②。他的权威仍然对党和国家发挥着巨大影响。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既然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更大优势,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已有了明确结论,那么他就不能不表明坚决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他的许多谈话都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党的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论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一个时期有一种舆论,要否定十三大。邓小平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③邓小平这样鲜明的态度,无疑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壮了胆,解除了他们的许多顾虑。起草十四大报告征求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采用哪种方案的意见时,他毫无保留地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因此,南方谈话实际上起到了政治感召的巨大作用。

(四)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它使我们国家在较短时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3页。

698 | 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讲,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那时这么讲,主要是强调改革的伟大意义,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觉悟。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意义。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改变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不完全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南方谈话所以把问题讲全了,最重要的就是再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理论创新。对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早就有这个认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生产力;城市企业下放自主权,是解放生产力;建立经济特区,也是解放生产力,等等。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某一个领域或方面的。只有实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才是全局性的。这才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如果说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同汽车在普通公路上跑的速度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则犹如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犹如动车在高速铁路上奔驰。它的历史起点则无疑从南方谈话始。在党的十四大形成全党共识将其作为党的重大决策通过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0 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也正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 10 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家庭。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 2010 年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超过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从 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 20 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这是邓小平当年发表南方谈话时未曾想到的。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英明决策和此后制定的政策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五) 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凸显,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 页。

导向作用。

邓小平早就说过,实行改革开放,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会产生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①。改革,无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万全之策,总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经过权衡,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就应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双刃剑,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且负面效应的“杀伤力”不会很小,但是如邓小平所说,有办法克服,可以抵御。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使其正面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使其负面效应受到最大的遏制,将其消极作用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容词,或点缀作秀的虚语;而是牢牢地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紧箍咒”,起约束负面效应的抵御作用。

纵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 年的情况,尽管对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作了巨大努力,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但政策的制定往往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漏洞太多,使下面的“对策”化解了上面的不少政策,从而其消极作用没有得到老百姓所期望的有效遏制。这集中表现为“四大失衡”:权力失衡,钱权交易,一些官员腐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相关政策没有使暴富者很好地带动未富者,有产生两极分化的潜在危险;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丧失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等使人们的心理感到缺乏保障;四是生态失衡,一些地区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生活环境污染的治理缺乏力度。

这些问题的凸显,虽然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发酵的结果。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因为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走富裕和繁荣之路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指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②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700 | 机制经历了至少 200 年,我们国家才只有 20 年。期盼在短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个愿望很好,但要在短时期完全消除其负面效应,恐怕不现实。第三,这与不少人忽视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即社会主义四个字有密切关系。忽视了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堵住各种漏洞的制度建设,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

(六)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必须坚决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倾向。

“义”与“利”,历来是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义”为先,还是以满足个人私欲的“利”为先,一直是区别善与恶、高尚与低劣的一个重要标尺。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是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是个人利益和与个人相关的集团利益第一。有如前述,我们国家所以强调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一样,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约束其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负面效应,但是,不少人对这个“紧箍咒”很不以为然。如邓小平所说:“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所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①同样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也只讲市场经济,忘了我们所讲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掉了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任其负面效应危害社会。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值和利益的最大化,根本不管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姓什么,把套在其头上的那个“紧箍咒”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对社会诚信、国家利益至上等等,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些观念。为了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和利益的最大化,什么坑蒙拐骗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了那个“紧箍咒”,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资本的原始积累时引述的一段评论所说: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会开始活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②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不法分子不正是这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9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71 页。

吗?! 只要有资本存在,不管在什么社会,其运行规律就是如此。在我们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如果不套牢社会主义的“紧箍咒”,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走向也必然如此。

长期以来,不能说对这种现象没有任何认识,也不能说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没有打击和惩治,但是,思想顾虑重重,严惩的力度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遏制不住,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在努力健全和完善其体制机制,堵塞各种制度漏洞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倾向,要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正道理管歪道理。

(七) 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都会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起重要作用,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准备,但是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

邓小平在 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此后他不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也很难坚持下去。这是因为我国原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连为一体的,旧的计划体制是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社会的运转的。要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不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因此,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就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一项异常艰巨复杂的大工程。它牵扯的面既广且深,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利益,处理不好,社会震动大,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也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谨慎从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①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不去直接攻坚,而是先易后难,进行了诸如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监察制度、国家机构的精简与调整等许多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6、177 页。

702 | 在我看来,目前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以后要进行的社会体制改革等,也体现了这个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改革既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起重要作用,也在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重要准备。有一种看法认为,目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替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存在没有改革的问题。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作某种准备但代替不了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两者的内容根本不同。

但是,对于那些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顾虑的人也不能不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单纯是经济体制问题,有如前述,它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目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凸显,与我国政治体制现状存在的弊端的关系太密切了。上述四大失衡,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因此,加大力度,继续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基础,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八) 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关键。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旗手。在上个世纪,他发表了两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一个是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它既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指南,也对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了深刻总结,是党面向世界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二个就是南方谈话。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面临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人们产生了许多思想困惑。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等,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的陈旧观念,使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它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其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深切感受。就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生的影响看,其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那样巨大。如果说前一次思想解放释放的能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那么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个新阶

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 703

如果说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那么它在20年后就应当是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那么回事，我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①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的步子不太大，是否与邓小平讲的缺乏那么“一股气呀、劲呀”有关系，值得思考。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一些顾虑消除了，在制定具体方案时就会有一些大的举措。又如邓小平说的：“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只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只要坚持这种放开的态度，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就会有如老百姓所期望的那样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未来发展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

弹指 20 年过去,当年南方谈话发表的爆炸性反响,还声犹在耳。它的冲击波是巨大的,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谈谈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未来发展,纪念其发表 20 周年。

一、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①。2002 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10 周年时,我撰文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并将这个“新阶段”解读为一个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形态;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10 年过去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这个理论体系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形态。这个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涵很多,理论很丰富,都对马克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但其最突出的代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党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思想,则是由于20年前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就此而言,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也具有非同寻常的伟大意义。

为什么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呢?

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若要鼓吹市场经济,就是离经叛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必说20世纪前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外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探索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遭到严厉批判;就是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一个时期,尽管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宣传媒体一直将此视为禁区,任何人也不能越雷池一步。邓小平本人自1979年始在小范围谈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研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前后达十四五次之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①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②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相继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使这个理论愈益丰富和完善。因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呢?邓小平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战略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2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06 | 建设的总设计师。按照陈云的说法,邓小平虽然不是一把手,但实际上是新时期的“第一位的领导人”^①。他发表南方谈话时,尽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关心和思考党和国家大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②。他的权威仍然对党和国家发挥着巨大影响。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既然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更大优势,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已有了明确结论,那么他就不能不表明坚决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他的许多谈话都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党的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论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一个时期有一种舆论,要否定十三大。邓小平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③邓小平这样鲜明的态度,无疑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壮了胆,解除了他们的许多顾虑。起草十四大报告征求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采用哪种方案的意见时,他毫无保留地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因此,南方谈话实际上起到了政治感召的巨大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实行市场经济,同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一样,有两面效应。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它使我们国家在较短时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讲,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④。那时这么讲,主要是强调改革的伟大意义,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觉悟。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意义。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改变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不完全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南方谈话所以把问题讲全了,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理论创新。对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早就有这个认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生产力;城市企业下放自主权,是解放生产力;建立经济特区,也是解放生产力,等等。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某一个领域或方面的。只有实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才是全局性的。这才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如果说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同汽车在普通公路上跑的速度度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则犹如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犹如动车在高速铁路上奔驰。它的历史起点则无疑从南方谈话始。在党的十四大形成全党共识将其作为党的重大决策通过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0 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也正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 10 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家庭。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 2010 年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超过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从 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 20 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这是邓小平当年发表南方谈话时未曾想到的。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英明决策和此后制定的政策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凸显。这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邓小平早就说过,实行改革开放,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会产生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①。改革,无论古今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 页。

708 | 外,从来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万全之策,总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经过权衡,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就应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双刃剑,且负面效应的“杀伤力”不会很小,但是如邓小平所说,有办法克服,可以抵御。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使其正面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使其负面效应受到最大的遏制,将其消极作用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容词,或点缀作秀的虚语;而是牢牢地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紧箍咒”,起约束负面效应的抵御作用。

纵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 年的情况,尽管对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作了巨大努力,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但政策的制定往往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漏洞太多,使下面的“对策”化解了上面的不少政策,从而其消极作用没有得到老百姓所期望的有效遏制。这集中表现为“四大失衡”:权力失衡,钱权交易,一些官员腐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相关政策没有使暴富者很好地带动未富者,有产生两极分化的潜在危险;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丧失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等使人们的心理感到缺乏保障;四是生态失衡,一些地区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生活环境污染的治理缺乏力度。

这些问题的凸显,虽然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发酵的结果。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因为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走富裕和繁荣之路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指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①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经历了至少 200 年,我们国家才只有 20 年。期盼在短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个愿望很好,但要在短时期完全消除其负面效应,恐怕不现实。第三,这与不少人忽视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即社会主义四个字有密切关系。忽视了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牢牢地坚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150 页。

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堵住各种漏洞的制度建设,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当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必须坚决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倾向。

“义”与“利”,历来是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义”为先,还是以满足个人私欲的“利”为先,一直是区别善与恶、高尚与低劣的一个重要标尺。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是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是个人利益和与个人相关的集团利益第一。有如前述,我们国家所以强调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一样,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约束其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负面效应,但是,不少人对这个“紧箍咒”很不以为然。如邓小平所说:“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所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①同样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也只讲市场经济,忘了我们所讲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掉了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任其负面效应危害社会。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值和利益的最大化,根本不管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姓什么,把套在其头上的那个“紧箍咒”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对社会诚信、国家利益至上等等,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些观念。为了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和利益的最大化,什么坑蒙拐骗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了那个“紧箍咒”,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资本的原始积累时引述的一段评论所说: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开始活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②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不法分子不正是这样吗?!只要有资本存在,不管在什么社会,其运行规律就是如此。在我们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如果不套牢社会主义的“紧箍咒”,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走向也必然如此。

长期以来,不能说对这种现象没有任何认识,也不能说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710 | 有打击和惩治,但是,思想顾虑重重,严惩的力度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遏制不住,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在努力健全和完善其体制机制,堵塞各种制度漏洞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倾向,要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正道理管歪道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目前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都会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起重要作用,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准备,但是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

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此后他不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也很难坚持下去。这是因为我国原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连为一体的,旧的计划体制是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社会的运转的。要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不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就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一项异常艰巨复杂的大工程。它牵扯的面既广且深,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利益,处理不好,社会震动大,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也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谨慎从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不去直接攻坚,而是先易后难,进行了诸如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监察制度、国家机构的精简与调整等许多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思路是应当肯定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7页。

在我看来,目前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以后要进行的社会体制改革等,也体现了这个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改革既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起重要促进作用,也在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重要准备。有一种看法认为,目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替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存在没有改革的问题。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作某种准备但代替不了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两者的内容根本不同。

但是,对于那些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顾虑的人也不能不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单纯是经济体制问题,有如前述,它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目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凸显,与我国政治体制现状存在的弊端的关系太密切了。上述四大失衡,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因此,加大力度,继续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基础,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从指导思想层面言,最重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旗手。在上个世纪,他发表了两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一个是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它既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指南,也对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了深刻总结,是党面向世界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二个就是南方谈话。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面临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人们产生了许多思想困惑。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等,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的陈旧观念,使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它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其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深切感受。就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生的影响看,其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那样巨大。如果说前一次思想解放释放的能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那么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个新阶

712 | 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如果说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那么它在 20 年后就应当是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那么回事,我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①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的步子不太大,是否与邓小平讲的缺乏那么“一股气呀、劲呀”有关系,值得思考。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一些顾虑消除了,在制定具体方案时就会有一些大的举措。又如邓小平说的:“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只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只要坚持这种放开的态度,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就会有如老百姓所期望的那样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具有可行性的,至少有两点:一个是分权制衡,一个是公开监督。既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是腐败高发势头难以遏制的一个重要体制性原因,那么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比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没兼,地方省市区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也没兼,为什么其他地区的要兼呢?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尽管过去兼职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现在来看弊端不少,书记权力太大,若把握不住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有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也会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另外,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庭人员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登记,这是一大进步,但满足于此绝对不够,必须进一步公开曝光,让广大群众知道究竟真不真实。据说有些技术性问题还没解决,因此目前公开曝光的条件不成熟。我以为,这是用小道理压住了大道理,用技术性问题敷衍了政治性问题。邓小平说,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从政治角度看,广大老百姓的呼声相当强烈,不公开影响老百姓对党的干部乃至对党的形象的看法。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不公开,网上乱传,对党十分不利。只有公开了就会消除那些负面影响。多一分公开就多一分信任度。如果说县处级干部牵涉面大,情况复杂,那么从省部级以上干部开始带头,以实际行动做表率,说明我们党高层领导干部是过得硬的,不害怕公开曝光亮晒,这对老百姓增加对党的信任度有极大好处。分权有助于制衡,公开有利于监督。还是毛泽东讲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加大力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使老百姓真正感到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不只是在课本上和讲话中。

政治体制改革迈大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完善,解决目前存在的扭曲现象,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应当高擎解放思想的火炬,照亮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程。

南方谈话与对十八大的期盼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虽然已发表了 20 年,但它的思想理论能量还在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今秋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目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满怀激情地迎接十八大,也对十八大充满期待。不同的群体干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需求,期待也就不完全一样了。我以为,就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而言,至少有三大期盼。

一、破除各种顾虑、继续解放思想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旗手。在上个世纪,他发表了两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一个是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它既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指南,也对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了深刻总结,是党面向世界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二个就是南方谈话。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们国家面临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人们产生了许多思想困惑。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等,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的陈旧观念,使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它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其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深切感受。就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生的影响看,其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那样巨大。如果说前一次思想解放释放的能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

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那么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个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这些年我们党在思想解放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理论成果如科学发展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等;实践成果就是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或部门来看,虽然也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但由于所指目标和具体对象缺乏,往往流于形式,成为空喊一阵的口号。而在一些为民众和媒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时,有关职能部门又表现为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比如,社会上议论较多的,关于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庭人员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申报制度问题。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老百姓非常拥护,但又不满足于此,希望此项制度制定得更完善和彻底一点,不仅申报登记,还要公布于众、公开曝光,让广大群众知情,便于监督。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只要思想放得开一点,也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有关部门对于这个要求的答复却不尽如人意。据说有些技术性问题还没解决,目前公开曝光的条件不成熟,云云。其实,这就是顾虑太多了,如邓小平说的,“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①。用小道理压住了大道理,用技术性问题敷衍了政治性问题。邓小平说,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从政治角度看,广大老百姓的呼声相当强烈,县处级干部及其家人的收入、财产不公开影响老百姓对党的干部乃至党的形象。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不公开,网上乱传,如果以讹传讹,对党十分不利。只有公开了相关信息,就会消除那些负面影响。多一分公开就多一分监督,群众也多一分对党的信任度。如果说县处级干部牵涉面大,情况复杂,那么省部级以上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做表率,说明我们党高层领导干部是过得硬的,不害怕公开曝光亮晒,这对老百姓增加对党的信任、消除一些负面看法,有极大好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像邓小平说的,胆子要大一点,冒点风险,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干部财产公开一小步,民主政治前进一大步。南方谈话解放思想的精神完全适用,一定要讲大道理,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全局道理管局部道理。十八大应当继续吹响解放思想的集结进军号。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二、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南方谈话发表 20 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在有序进行,全方位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就。这里着重谈谈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应跟进问题。南方谈话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0 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 10 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 2010 年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从 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 20 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是南方谈话当年发表时未曾想到的。但也要看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一样,有两面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凸显。这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的力度没有使其相应跟进有密切关系。邓小平一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坚持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这些年,我们党明确了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但是,怎样具体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应当说还在进一步探索过程之中。既然如此,不仅南方谈话讲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现代化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思想仍然有指导意义;而且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剥离术”和“结合术”的科学方法,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应有借鉴意义。

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讲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

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那么回事,我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①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面迈的步子不太大,是否与邓小平讲的缺乏那么“一股气呀、劲呀”有关系,值得思考。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繁重和艰巨。这就需要有邓小平那种大刀阔斧的魄力和敢于担当的勇气。“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只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只要坚持这种放开的态度,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就会有如老百姓所期望的那样更重要的进展,民主政治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南方谈话应当是十八大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三、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南方谈话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是些什么问题呢?从宏观言,一是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③二是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中国全盘西化。南方谈话也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对于那些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④。三是贪污腐败,蜕化变质,共产党丧失人民拥护的根基。南方谈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718 | 也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反对腐败,推进改变党风和政风的廉洁政治。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其意义不亚于前两者。

南方谈话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现在还不放心啊”。^①这些年,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但是,正如胡锦涛在最近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这是由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它会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色迷权失,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对症下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有利于制衡和制约。首先明确,这个分权不是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比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没兼,地方省市区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也没兼,为什么其他的一定要兼呢?这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尽管过去兼职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现在来看弊端不少,书记权力太大,若把握不住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有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也会使问题考虑的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南方谈话的告诫,应当成为十八大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针。

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引用《庄子·人间世》“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语,来说明党的发展壮大:“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②。历史已前行半个多世纪,我们党更“巨”了:从50多个党员发展到8000万党员;从秘密小组织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执政党;从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到为13亿人民的福祉而探求新道路,使中华神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党的十八大,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新的更伟大的辉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②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我观邓小平

WOGUAN DENGXIAOPING

第六编 札 记

同一首“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企盼已久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了，中国共产党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自小平同志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思想以来，蓦然回首，20年间，我们党连续召开的5次代表大会，都是同一个主题，也可以说是同一首“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君不见，十三大报告讲的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报告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报告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报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次十七大，胡锦涛同志报告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为什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说成是一首“歌”呢？尽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982年，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请看29年来，国家的巨大变化吧。这里仅举三个指标说明：

——经济发展。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21万亿元是1978年的13.3倍，居世界第4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钢的产量从2000年起已居世界第一；还有属于世界第一的青藏铁路、三峡大坝等特大型工程相继建成。

——对外开放。2006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84倍，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06

722 | 年已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

——人民生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都增长6.7%。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水平,尽管人均国民总收入仍属低收入国家,但我国已由温饱不足跨入了总体小康。

29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国家取得了这样惊世骇俗的成就,难道不是一首“歌”吗!

为什么20年间又是同一首“歌”,即5次党代会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自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它就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深深地扎根于中华神州。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世纪末,使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决议还论述了党的最高理想同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关系,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在现阶段,它集中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一切有利于建设现代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忠诚于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广泛和真诚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了我们党广泛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最具凝聚力的口号。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历史证明,这个共同理想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最广泛的利益,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以须臾没有的。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毛泽东那一代中央领导人就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既取得了重大成就,又遭受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这一探索历程。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毛泽东同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

道路。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他随后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三大首次讲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时,认为: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则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可以从多方面论证,但最重要的,一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目前中国的客观实际。二是它紧紧地抓住了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根本任务。从“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实现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使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非常明确。三是它还明确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伟大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内涵,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方面。29年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道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进步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概括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实践经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层面言,是探索到了上述两条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从理论层面言,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是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如果从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言,对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也可做另一种概括: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将29年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理论都包括进去了,比较简捷地说明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吗!?! 主义就是理论、就是旗帜,也就是指导思想。在十五大讲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时曾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时“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理论不仅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说,不仅中国特色

724 | 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作为它的理论升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正因为如此,所以,锦涛同志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首“歌”,是发展进步之歌,是团结奋斗之歌。让我们放声歌唱,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断想^{*}

(一)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定位。通常说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这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定位。这个说法是否合适,当然还可讨论。我基本上赞同这个说法。这场讨论既然是一场运动,就不只是发表一篇文章的问题。就将其提到作为中国 20 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度来看,对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认识,就不能仅限于学术界;它是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一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次教育,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过程。在时间上,至少应当从 1978 年 5 月中旬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算起,到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 3 年时间;如果将 1977 年 5 月邓小平讲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包括在内,再加上有些地区最后完成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就有 4 年半时间。从这个视点看,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持续发展 30 年,有这样深厚、强大的精神原动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其间还在不断地“加油”,补充动力,即改革开放过程之中的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大潮。这些大潮都是最初汹涌澎湃的大潮的

^{*} 2008 年 4 月 15 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召开座谈会,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30 周年。作者发言的主要内容发表在《北京党史》2008 年第 3 期。

726 | 继续和发展。因为那次讨论解决的是认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实事求是。这以后的各次大潮尽管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其思想路线是一条——实事求是。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思想解放的30年。前几天(4月12日),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初步概括的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000多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也可视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解放的伟大成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乃“精神变物质”的伟大成就。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进历史进步的伟大功绩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讲的。

再从理论层面看,由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样,经过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从实践创新看,开始找到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创新方面,作为对这条道路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最初在十三大称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十四大冠以邓小平的名字,叫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到十五大又将其简化为“邓小平理论”,并正式地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进一步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升为指导思想;十七大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创新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过去是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视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现在按照十七大的最新概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又可进一步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从理论层面对其作一个新的历史定位的一点想法。

(二)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阶段的几个关节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既然包括几年时间,就可分为几个阶段。在我看来,它的开启阶段,是从1978年5月中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到年底的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邓小平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一阶段里,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环节,或者叫关节点,除上述两个关节点外,中间还有三个:一个是6月初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再一个是6月下旬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还有一个是9月邓小平的“北方讲话”。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省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等。但就上述五个关节点言，说白了，就是理论界的两篇文章和邓小平的三个讲话。怎样看待它们的作用呢？这如一场大戏，开场锣鼓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戏的主角是邓小平。特别是如果没有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被视为思想解放第一个宣言书的那个主题报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很可能夭折。但是，目前有的宣传对最初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讲得较多，毫无疑问，它功不可没，但相比之下，对邓小平讲话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的宣传则不太够。这不能不影响对邓小平讲话的作用的认识，即有喧宾夺主的味道。如何把握好这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述有的文章和讲话的“知识产权”的争论。对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主要作者是谁，这个争论可能30年来一直没停。近些年来，又出现了邓小平的那个主题报告的起草人究竟是谁的争论。上述五个关节点的一头一尾，打笔墨官司的势头似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就我所知，读者们有这样那样的不少议论。我个人不太赞成这样争论下去。我们共产党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点，就是讲集体本位，强调集体主义、集体智慧和集体贡献。署的名既然不是曾经参与其事的某一个人，而是集体的化名或党的领导人，个人尽管做了工作，但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己有”。对于曾经参与工作的起草者之间的争论，从社会议论产生的客观效果看，容许说得不客气点，是在消解或瓦解我们党过去一贯强调的这一点本色。作为共产党人，总要讲点风格、境界，何必有我无你，你主我次，我多你少，打得不可开交呢？！既然是集体写作，最后的成果是很难分清哪是你的，哪是他的。凡是参与其事的，都作出了贡献。比如，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最初的作者是谁，后来参与修改主创的作者又是谁，讲清情况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谁的贡献最大。现在不是时兴讲“双赢”吗？应当有这种新的思维方法和海量。再如，起草邓小平的讲话，是职务写作，不是个人写作，都参加了这项工作，都有很大贡献，何必排他呢。还是邓小平讲的，有些事要宜粗不宜细。对此，我也主张这样，不要过多地去追究细节。所谓存史，也是将各自所知道的历史情况尽量讲清楚，使其能够互补，更加全面、准确。有不同看法，尽量沟通协商，争取形成共识。不能形成共识，就让后人和历史去评判，用不着公开争执，更用不着对簿公堂。公开争执，影响极不好，对邓小平的形象也有损害。不过，诸如此类的争论，也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集体写作，要健全和完善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参与者的工作能以某种方式得到肯定。

728 | (三)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表述。现在比较时兴讲多少次思想解放。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可以商榷。如果将解放思想作为思想路线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是一直坚持的,不仅每次党代会都强调,平常场合也一直讲。从这个意义上讲,讲多少次或第几次,就给人一种时有时无、时断时续的感觉,因此,似不那么准确。但若从思想状态言,对事物的认识,同每个人一样,有时兴奋,有时不那么兴奋,因而思想解放呈现高潮或非高潮状,就此而言,能否讲第几次高潮,这可能比简单地讲第几次会少产生一些误解。当然,高潮也有大有小,发潮的能量不一样,其等级也不可能一样,因此也可分为高潮、次高潮之类。作为第一等级的大高潮,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次。一次是前面讲的,也是我们今天开会纪念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一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其他的几次恐怕都达不到这个等级。正因为这样,也没有自发地形成这样的隆重纪念活动。由此,也可看出这些年来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力。

目前是否形成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呢?不少媒体宣传十七大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在我看来,恐怕不好这样说。第一,从十七大报告看,无论从导语对解放思想的强调,还是从全篇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来讲,无疑贯穿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是一篇思想解放的报告;但是报告并没有专门段落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解放思想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新要求。第二,若讲第三次,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十七大的要求看,还是使用“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提法比较科学。

那么,一些媒体为什么对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宣传这么热闹?应当说,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渴望。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解放,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被称为的新的伟大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就应当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体制的,又有政治体制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方面体制的改革,既有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又会有这个领域的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引发了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即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如果要评选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最伟大的成果是什么,我若投票将选择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取得目前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当然,这个体制和机制还不够健全,很不配套,远没有完善,这是目前的经济社会层面出现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它的不够健全,很不配套,远没有完善,又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说到底,又牵涉政治体制改革。说这些年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应当承认,民主政

治有很大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是同等的,也不是同一个级别和层面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核心层次,发生了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仍处于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这个层面。两大改革的这种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了很大空间,从而成为目前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an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期盼和渴望是什么?根据我的直觉,就是期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相协调。

(四)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谈虎色变”。时下,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不仅文章越来越少,而且这方面的研讨会也很少,不少媒体都是敬而远之,不少学者也心有余悸。尽管十七大报告有专题作了论述,但报刊除了一些宣传性文章外,作深入研究探讨、提出独立见地的著述相对较少。这种氛围与解放思想的要求是不相称的。我不是研究政治学的,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最近看到《理论动态》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蔡霞的《解放思想需要什么?》,一篇是王长江的《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创新》),虽然有的观点还可斟酌,但作者的勇气可敬,是篇敢于正视这个问题的力作。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内容很多,现在也在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最根本的还是如邓小平说的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层面要改革的内容也很多,20多年来也有不少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所谓深层次的改革就要涉及权力和利益,即如何制衡权力和如何公平利益。目前的问题,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官员的腐败既猖獗又在不断披上“合法”外衣;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的分配极不均衡,造成穷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更加扩大,先富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很好地带动后富,社会的不公平比过去更加凸显。这样,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为要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一要分权,二要分利。怎样分?这就要创造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可逾越的制衡权力的体制和机制。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剥离出来,让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其为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制衡权力,就要学习邓小平的大智大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以剥离,区分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对于前者予以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吸收。就像市场经济那样,让其

730 | 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分权和分利的体制和机制。这无疑需要有大智慧,同时需要从现在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先搞试点,由易到难,由标到本,最后进行大制作。

(五)关于下一个30年的头等大事。我们党的历史大体以30年左右为一个大的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近30年是闹革命,探索出一条革命成功的道路。第二个近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搞建设,尽管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没有探索出正确的建设道路。第三个30年,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终于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到了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下一个30年干什么?我以为,就改革而言,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改革体制和机制的同时,应当将如何有效制衡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要地位,既要加快进度,又要加大力度。

为什么要以30年为期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谁敢说这样的话?领导层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改。恐怕再有30年时间,我们才会在这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以为,这不仅是指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这是以30年作为下一个阶段重点地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参照。当然,邓小平是从1992年算起的。鉴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异常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给予更多时间,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之后算起再给30年。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分权、有效制衡权力,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官员的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方位的民主权利才有真正保障。有效制衡权力的改革无疑有很大风险,不能急于求成,只能渐进前行。但是也不能谨小慎微、碎步慢挪。这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高度企盼不相适应。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提高,随着社会成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到这一天不会需要很长时间。据有关方面概算,到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之际,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具有中等收入者占社会的大多数,大概在8亿人口左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社会成员,可能在1.5亿左右。此外,还有上亿的网民通过信息网络来获得大量的信息量。那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政治诉求就会比目前强烈得多;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没解决,许多问题会比目前更加尖锐。与其到那时被动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不如从现在起早

作运筹、未雨绸缪。

20多年前,在准备十三大报告时,曾经成立过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后来因在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而撤销了。现在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个属于老大难的问题。如果认识到探索有效制衡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重新成立类似这样的机构作为智库,是有必要的。解放思想,下一个30年应当聚焦在这个大亮点上。只有找到了具有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影响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和机制,权力得到有效制衡,才能称得上是迎来了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也只有到那时,才说得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性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提法比较科学

现在,比较时新讲多少次思想解放。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我认为可以商榷。如果将“解放思想”作为思想路线看,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是一直坚持的,不仅每次党代会都强调,平常场合也一直讲。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多少次或第几次,就给人一种时有时无、时断时续的感觉,因此,似不那么准确。但是,若从思想状态言,同每个人一样,对事物的认识,有时兴奋,有时不那么兴奋,因而思想解放会呈现高潮或非高潮状。就此而言,这可能比简单地讲第几次会少产生一些误解。当然,高潮也有大有小,起潮的能量不一样,其等级也不可能一样,因此也可分为高潮、次高潮之类。作为第一等级的大高潮,在我看来,自1978年到现在只有两次:一次就是1978年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一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其他的几次恐怕都达不到这个等级。正因为这样,也没有自发地形成目前这样的隆重纪念活动。由此,也可看出这些年来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力的状况。

目前,不少媒体宣传十七大开始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或“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当前是否形成具有第一等级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大高潮呢?在我看来,恐怕不好这样说。

第一,从十七大报告看,无论从导语对解放思想的强调,还是从全篇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来讲,无疑贯穿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好报告;但是报告并没有专门段落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解放思想提出有哪些具体的新要求。

第二,若讲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关于当前

思想解放的表述,还是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提法比较科学。 | 733

那么,一些媒体为什么对当前思想解放的宣传这么热闹呢?应当说,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渴望。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解放,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就应当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体制的,又有政治体制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方面体制的改革,既有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又会有这个领域的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引发了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即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如果要评选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最伟大的成果是什么?若投票来选择,我将选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取得目前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当然,这个体制和机制还不够健全,很多方面还不配套,远没有完善,这是目前的经济社会层面出现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又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说到底,又牵涉政治体制改革。说我国这些年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因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推行了许多重要改革措施。应当承认,我国民主政治有很大进步。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是同等的,也不是同一个级别和层面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核心层次,发生了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仍处于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这个层面。两大改革的这种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了很大空间,从而成为目前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当前继续思想解放的期盼和渴望是什么?根据我的直觉,就是期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相协调。

三个“30年”与两场伟大革命

——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对话*

《解放军报》记者 罗小兵

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场伟大革命

记者: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30年间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巨变,其间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党诞生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民主革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国大地经历过最新一个30年的每个中国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像当年的民主革命一样,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伟大历史事件。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请您从中国这两场革命的比较研究中谈谈自己的感受。

石仲泉: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是身处伟大变革时代,总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天翻地覆的巨变。史学界新近有一种概括,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期大致按30年均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30年是民主革命阶段;第三个30年是改革开放阶段;介于两个阶段之间大约也是30年,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的延伸和第三个阶段的准备,即社会主义起始阶段,或者说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这是作者与《解放军报》记者罗小兵的对话,主要内容发表于《解放军报》2008年11月27日。记者前言写道:在一个红叶初染的日子,本报记者就改革开放30周年的有关理论话题,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进行了对话。石仲泉以史学家的宏观视角,畅谈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这里是对话全文。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首尾两个30年相继发生了两场伟大的历史性革命,不断改变着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 | 735

记者:革命的内涵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两场革命是否前者属于狭义、后者属于广义的革命呢?

石仲泉:不仅仅如此。两场革命相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革命的领导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二是都经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并产生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前者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后者是改革开放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记者:两场革命有哪些不同之处?

石仲泉:两场革命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时代背景不同。前者发生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表现为血与火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解决问题;后者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尽管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阶级斗争依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始终没有变。二是革命对象、革命方法不同。前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方法来推翻,彻底解放生产力;后一革命的对象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包括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革命的方法主要是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通过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是革命领导者共产党的地位不同。前者共产党尚未掌握全国政权;后者共产党已是牢牢掌握全国(除台湾省外)政权的执政党。四是两次飞跃的革命内涵不同。前者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使国家政权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后者是掌握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主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富国强民,振兴中华。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中流传的两句话最能证实这两场革命的性质和特色: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石仲泉:的确如此。前一场革命为后一场革命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后一场革命则是前一场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从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736 | 力的角度来看,后一场革命以解放思想作引擎,既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又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加速提升中国社会总体文明发展水平,自然比前一场革命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而且情况更复杂、时间更长远、任务更艰巨,完全称得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一度出现所谓“说三道四,左右为难”的情景,一些“左”的或右的错误观念时常阻碍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我们党是怎样统一全党思想进而引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

石仲泉:这个问题提得好。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但是思想解放的闸门启开后,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洪流必须纳入有堤岸的河道。改革开放初期,经过10年“文革”的禁锢,在历史的大转折关头,人们的思想一度比较乱,这样那样的看法都有。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初期,往往由于破了旧的,而新的又尚未立起来,出现一些思想纷争,这并不奇怪,也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执政党如何应对。

革命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创新,改革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供借鉴,必须提倡大胆解放思想,鼓励人们在实践中去试、去闯,杀出一条血路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这样做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说,既要“说三(中全会)”,又要“道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反对右的倾向,不断澄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观念。但是在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方法上,我们党采用并逐步学会了区别以往时期的一些方法,譬如不搞运动,不搞大批判,采取正面疏导和教育,引导全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取得了很好效果。如何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有不同意见,不争论,干起来再说,以免耽误时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最终以实践检验其是否正确来开辟道路。

记者:这30年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

石仲泉:这些风风雨雨毕竟不是急风暴雨,与前两个30年相比较就一目了然:第一个30年党内曾出现过三次“左”倾、一次右倾这样大的带有路线性的错误,第二个30年出现了“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都给我们党、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害。反观改革开放这30年,从总体上看比较平稳顺当,没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没有大的内耗、折腾。

当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也曾不时地冒出来干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但认识问题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弥足珍贵的是,我们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不放,高瞻远瞩,力挽狂澜,排除种种干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使改革开放的大船始终保持正确的航向。

记者:特别需要提及的,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告诫全党:“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未来社会政治趋势的科学估量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战略谋划。

石仲泉:是的。邓小平同志讲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估计。中国过去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小生产经济的狭隘思维定势和社会心理,是投身革命的同志容易产生“左”的思想情绪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主观愿望说,总希望革命早点成功,事业顺利发展,因而容易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头脑发热。因而陈云说,建国后的主体错误是“左”,邓小平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个总结太深刻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应当永远铭记。近十几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严峻形势和困难的考验,真正做到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充分展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洪流、顺乎党心民心、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需要正确的坐标系

记者:怎样看待3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譬如区域差距、收入分配、资源环保方面问题突出,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依然比较严重,等等。

石仲泉: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制度,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方面的全方位社会变革和观念变化。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伟大事业,难免遇到一些曲折、失误甚至某些局部失败。有的人对改革总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认识问题的方法言,根本的原因是选错了观察事物的坐标系。有种比喻说得

738 | 好,戴着有色镜看什么色彩都不正,用“左视眼”看一切都是右的。看事物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错了,就会对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成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于感到格格不入。因此,必须树立正确科学的坐标系。

记者:还有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也需要纠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理想化”的定势,就是看什么都希望对象尽善尽美、没有瑕疵。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没有任何缺点和不足。什么事都会有利有弊,而且往往在利越大的同时弊也可能越大。一个新事物的正负面效应,我们只能二者相权取其轻,尽量发挥其正面效应,减小其负面效应;在思想方法上不能搞绝对化,一味求全责备。否则,就会一叶障目,迷失方向,把蚂蚁说成大象,夸大前进中的问题,把改革开放看得一无是处。

石仲泉:事实上,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我们党对一些负面影响、消极现象始终都保持着清醒认识,并且一直在花大气力防止和克服这些消极现象,尽量减小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唯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行。走回头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否定改革开放只能将30年的成就毁于一旦。

记者: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石仲泉: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并没有终结,借用毛主席一句话,可以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旧矛盾、旧问题解决了,又会不断产生新矛盾、新问题,需要不断探索、与时俱进。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又是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但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改革开放。总之,改革开放是永无止境的,具体的内涵会与时俱进,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我考虑总结30年经验(包括教训),至少有这么几条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经验必须始终坚持:一是继续解放思想,抓住改革开放中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二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是不断发扬民主,加强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五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根本制度建设。

记者:可以预期:只要我们按照改革开放30年走过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未来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更加辉煌,中国一定能步入世界强国之林,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辩证地认识两个“30年”的历史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按照历史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单地说,是两个“30年”。无须讳言,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

邓小平对前“30年”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两个总体性评价。一是从新旧中国从历史对比的角度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①上面十二个方面的概括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作历史比照的。研究历史不能不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二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

^{*}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党校和省文化厅共同举办的第五期“吉林高端讲坛”,在吉林省第一个“党史教育日”这一天,邀请作者就新中国60年的历史作专场报告。这是作者2009年9月25日的演讲主题中的一部分。报告就此前讲的一些观点比较展开地作了解读。9月27日的《吉林党校报》根据录音资料整理发表了演讲全文,收录时作者作了修改和补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740 | 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邓小平还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①这个评价很凝重，表现出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发展眼光。这30年的发展与人们的期望值相比较有不小距离。毫无疑问，邓小平的这两个评价不尽相同，因为所讲的参照系不同。但它也不矛盾，都统一于这段历史本身之中。评价历史，主要不是根据人们的期望值，即不是想当然地应当怎样又怎样来评价；而是着眼于历史的进步，是否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在总体上是进步还是倒退。这是历史唯物论。按照这把历史尺子，对前“30年”，邓小平的基调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对于后“30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全面阐述。这里不再赘述。那么，怎样看待这两个“30年”的差别呢？我看，应当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的一面，即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转折性发展。对新中国的两个“30年”作辩证的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具体地讲：

首先，新中国的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这可以论列很多条，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在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1979年3月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他在1985年8月明确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他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因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的事业”。^②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前“30年”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探索富强中国之道的经验。它作为一个整体，解决了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358、164、173页。

体、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立国、治国的指针,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不断奋斗的根本。

二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前“30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严重挫折。尽管主要出于所谓“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以期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其结果非但没有大治天下,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10年间,冤假错案遍布域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罪恶罄竹难书。1971年粉碎林彪集团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为“鲁难未已”的“庆父”。因此,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获得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举国欢庆。尽管它没有像人们所企盼的那样成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毕竟在共和国危难之际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样,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前提。

三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之所以没有成为后“30年”历史发展的起点,就在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邓小平从1977年5月始,就反对“两个凡是”,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①1978年5月,报刊上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反对“两个凡是”,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这场讨论发展为全民参与,引发成共和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小平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742 | 施”。^①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使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而且为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开启了闸门。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当代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后“30年”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其次,新中国的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主要是指带根本性的初始基础,即后“30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根基。最主要的有:

——政治制度根基。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体现立国之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是一个护身传家的法宝。“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②。这个根本制度在前“30年”,无疑奠定了牢固基础;改革开放后的“30年”,在清除“左”的错误后,它不断得到完善。二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在前“30年”也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制度在后“30年”与时俱进过程中不断健全和完善起来。

——经济制度根基。前“30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为后“30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改造使公有制成为国家的唯一经济基础,这是一个严重弊端,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使经济发展缺少活力,但这成为了后“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后“30年”所以能够进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也正是因为有了前“30年”深厚的制度根基。如果没有那样的制度根基,也不可能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的改革。与此相联系,前“30年”的经济发展尽管有动荡起伏,但终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石。

——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和基本方针政策,特别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制定的许多条例,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同上述政治、经济制度一样,这些方面的制度既是后“30年”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后“30年”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要改革的基础。没有这些制度,后“30年”不能发展;不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起来,也不可能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局面。

——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的制度根基。即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制度,在前“30年”奠定了扎实的根基。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而言,这两个方面的折腾少一些,因而基础更好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后“30年”,不断与时俱进,经过改革和调整某些不合时宜的具体体制和政策,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扩大,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国际影响更加增强。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此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10月指导写《历史决议》,讲到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时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这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党对待前“30年”的认识。现在来看,后“30年”的历史内涵远远超出邓小平所讲的情况。如果将前“30年”的历史看做主要是毛泽东领导探索的,那么后“30年”的历史则可视为主要是邓小平领导开辟的。尽管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与邓小平讲的那个情况有很大变化,但应当承认,其基本点还是可以用以作比较后“30年”与前“30年”关系的参照的。这个基本点即是:

——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前“30年”既然为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那么后“30年”就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向前发展,包括邓小平讲的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后“30年”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都离不开前“30年”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后“30年”当然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

——后“30年”纠正了前“30年”发生的“左”的错误,因而又是校正了方向的历史延续。前“30年”,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犯了长达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因此,后“30年”的发展首先要拨乱反正,否定过去“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回到正确方向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实现了这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744 | 历史的伟大转折,此后就有了当代中国“30年”的巨变。因此,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有巨大转折的延续。

——后“30年”还是前“30年”的创新性发展。后“30年”对前“30年”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延伸,而是有极大的创新性。正因为如此,在后“30年”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方面说,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理论方面而言,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这个理论体系本源的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后“30年”对前“30年”来说,用哲学语言讲,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发生了部分质变。因此,有一种说法,解放前为旧中国,前“30年”是新中国,当代中国的“30年”为“新新中国”。就其所指是在新中国前“30年”基础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点而言(不是讲社会的根本制度),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的前30年、后30年要采取辩证的方法来看,形而上学、非此即彼是不符合历史的。作为领导干部,要多学一些辩证法,多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化这方面的哲学理论意识,看问题要辩证,不能搞简单化和形而上学。我们现在有些人犯错误,就思想论来说,辩证法少,形而上学多,简单化、集中化多,这使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发生了偏差。很多群体事件的发生,我想同领导人缺少辩证法有很大的关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在座的领导干部身上有很重的担子,要学习哲学,用马克思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武装头脑。我们现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这是个政治概念,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随着时间的变化要不断调整方针、路线,所以它的变化就很大。哲学是更加宏观的,会长期起作用。在座的年轻干部要多学一些哲学,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武装头脑,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会大有益处。

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今年(2011年——编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90 年来,一个近代苦难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所以有此巨变,原因很多,经验十分丰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90 个春秋,大体分为三个“30 年”。在这“30 年”间,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要解决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

一、第一个“30 年”:探索作为现代化前提的革命时期经历的困惑与解惑

近代以来,一个曾称雄世界千年以上的“天朝大国”,经过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轰然坍塌,成为由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间,被夺走的领土达 150 万平方公里以上,被掠去的“战争赔

746 | 款”达十几亿两白花花的银子,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边缘。

但是,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之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求索中处于迷惘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使其成为解放中华民族的真理。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之中,就发生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指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出水火,但对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回答。这是最早的困惑。

党的一大,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的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即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党的二大,修正了一大纲领,初步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战略,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指导思想上的很大进步,但是,二大对于两个革命阶段关系的理解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认识。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困惑难解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两个倾向。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在领导党的早期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但是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反映了当时党的认识水平。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权力,待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再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革命论”以瞿秋白为代表,他在批评“二次革命论”的过程中,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同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他主持的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中国革命要超越民权主义范围,“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反帝反封建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据此,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造成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盲动错误。随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一次革命论”的继续发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在某些方面推行更“左”的错误政策。他们在理论上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因而三次“左”倾错误领导，同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领导一样，都给中国革命造成曲折，乃至严重挫折。 | 747

在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1935年底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困惑，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二是民主革命是否要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建立统一战线时是否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三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资产阶级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四是关于民主革命的前途和转变问题。在延安时期，通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四个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特别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共产党人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应当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基本解惑了。

二、第二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时由比较清醒再走向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党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清醒的。尽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有过纯、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等缺点和偏差，但毕竟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总的方面看，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基本是妥当的。

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前后，党已着手对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纠正，并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讲过可以考虑实行新经济政策，开私营工厂、开夫妻店，雇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在1956年底1957年春讲过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相比较。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周恩来在1957年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

748 | 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上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的言论表明,当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十分清醒,对于调整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随后形势骤变,这些认识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光彩熠熠的思想才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出了偏差,有的发生了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改变了此前那些金子般的珍贵思想,而且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在确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和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而不能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状况的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将资本主义要彻底消灭,进一步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了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最荒谬的表现形式。错误认识达到这种地步,社会很难健康发展。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①这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发生失误后导致的严重后果。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另一个错误认识,就是将资本主义(还有封建主义)泛化,把大量不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禁止、取缔;将资产阶级扩大化,把许多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员划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结果是在政治上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民主法制被践踏,社会肌体和社会成员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237—238页。

大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缔市场机制,推行“割尾巴”、“根绝资本主义”(其中许多并非为资本主义)的纯而又纯的政策,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优越性;在思想文化上,片面强调“兴无灭资”,混淆和颠倒了许多是非观念,大量优秀文化遗产被当作“封、资、修”大加挞伐,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精神食粮极度贫乏,贻误甚至扭曲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三、第三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实现的顿悟与跨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方面要批判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也要同那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资本主义,两者非此即彼,不能共存并生的“左”的思想划清界限。所谓20年的“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说到底就是这种思想的影响。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所谓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要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顶礼膜拜,而是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它既必须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又只能主要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来建设,而这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不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的好的经验。党领导社会主义前期发生的曲折,1957年以后20年在指导思想上接连发生的“左”的错误,都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密切相关。

其实,只要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并不玄奥。从辩证唯物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750 | 义哲学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具有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前一方面关系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后一方面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前一方面关系时,又要十分重视两者的后一方面关系。邓小平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数十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就社会制度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大量的人会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这样,我们国家“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②

——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列宁明确指出:“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③基于这个认识,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他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④而要做到这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24、2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373页。

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独资企业、建设经济特区等等。这就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他说: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①

——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邓小平认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等地区回归祖国的问题,无论对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内的建设与改革,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利的。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大陆和台湾,还有港澳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它们的对内政策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②这个“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多重设定:一是两种对立的制度要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③。二是两种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对等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④三是还要利用小地区的资本主义来促进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这些设定,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辩证法。

——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一直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向人民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1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752 | 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他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①。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资本主义丑恶颓废的那些东西也在国内蔓延开来。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忧虑。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全党：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②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又对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充满自信。这里所引上面的论述，全面地说明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怎样正确看待资本主义腐朽、丑恶东西的影响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上述多重关系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一直坚持和丰富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政策。这是第三个“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三个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反思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放眼世界总结各国发展的新鲜经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走向成熟。它完全改变了过去比较简单直接地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限制和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

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有三个问题最为重要：

一是继承和借鉴。有如上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讲为对立和统一，从政治层面说为对抗和继承。两者的对立和对抗关系是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

言而喻的,但这只是其一,还有继承关系。对此,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有明确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上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列宁讲得更为直接:我们“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还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②前面已讲过,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邓小平的认识有如上述。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时也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③改革开放 30 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二是共存和补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的关系,有如前述,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 1956 年前后都阐述过这样的思想,但未能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除前面介绍的以外,他还强调,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还说:“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要“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④改革开放 30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 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9、6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1、65、149、150、65—66 页。

754 | 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没有展开。将这个思想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对此有大量论述。他认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①他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②;“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③;“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④,从而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邓小平是伟大的典范。这个典范也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充分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会激化。在世界范围内要以两手对两手,纵横捭阖,绵里藏针。在国内,这种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努力克服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同国际上的反华思潮和国内的“全盘西化”论作斗争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和坚强意志,为世人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又绝不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社会主义有负面影响而惧怕它和不敢利用它。他既反对“崇资病”,也反对“恐资病”,对资本主义文明加以辨析、剥离,充分地吸纳、结合和利用其积极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要素。在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②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方面,邓小平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辨析、剥离和吸纳的工作, | 755
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党经过 90 个春秋的风风雨雨,能取得如今的伟大成就相当不容易。如果说 20 世纪是中国共产党人创业,使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那么,21 世纪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创业,要使中国发生更大的变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纪。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还必须继续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只有这样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

探索中的权力交班模式^{*}

权力交班从古至今都是天大之事。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交班往往关乎政党命运、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自在创立新中国执政以来,一直都在为实现权力的顺利交班进行艰辛探索。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初步有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权力交班模式。

一、毛泽东对权力交班的殷殷思考和践行错位

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在1953年酝酿召开八大时,他还不到60花甲,正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迈向政治智慧和才干巅峰,但已开始考虑权力交班问题。为了减轻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1956年召开八大时,他正式提出: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中央领导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搞四个副主席,再加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比较好办。他推荐年龄比他小十一二岁的邓小平、陈云任总书记、副主席。还说:我是准备好了的,到适当时候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据此建议,八大党章增加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八

^{*} 本文是应《人民论坛》之约写的一篇短论,这是原题。在2013年4月上半月的该刊发表时改为“高层集体交班:几代中共领导人的探索”。

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交班已经有了相当好的顶层设计。

1964年夏,毛泽东鉴于中苏关系变化,又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列了五条要求,基本思想是很好的。但是,“左”的错误发展起来后,他对权力交班的考虑有了很大变化。“文化大革命”10年,接班人换了又换,最终没能解决好权力交班问题。

二、邓小平的坚毅开拓和权力交班格局初显端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论资历、才干、智慧、经验和威望,他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全党和全国人民也都这样企盼,但已年届75高龄的他执意不肯,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决心举荐年纪较轻的同志。他说: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问题,要找第三代,要找年轻人。他尽管在发挥“核心”作用,但已在考虑权力交班问题。

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也是党和国家权力交班的重要舆论准备。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权力交班模式,他殚精竭虑,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举措。这主要有:

一是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除中央委员会外,再设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2年十二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后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实现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后不再设立。

二是中央和地方设立顾问制度,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党的十二大成立的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亲任主任。十三大和十四大由陈云任主任。中央和地方的顾问委员会撤销后,有的地方和部门还聘请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

三是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彻底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认为这是最根本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比较顺当。由于十二大中央政治局人员平均年龄达到71岁,超过70岁的有6人,因此在1985年专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让他们率先退休。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请求,他实现从领导岗位

758 | 完全退下来的夙愿。

四是选拔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要求大胆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优秀干部进入领导班子,逐步做到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占一定比重,希望中国有一天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

五是建立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机制,形成老中青干部的梯级结构进行传帮带,逐步实现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在一批老同志退休时增选了三位五十六七的同志进入政治局,使其平均年龄降低3岁。十三大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64.4岁,十四大的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62岁,进入政治局的胡锦涛、温家宝才50岁,基本上实现了邓小平期望的中央领导年轻化目标。

六是精心选拔主要接班人,实现权力平稳交班。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如他所说,虽然有两个接班人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后来江泽民同志上来后,邓小平认为这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中央的工作是满意的。

七是强调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常委会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集体。要选得好,选得准,有些看得不准的,经过考验之后会淘汰下去的。

八是强调中央领导集体应当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决反对腐败的。它的成员要胸襟宽阔,着眼大局,很好团结。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能挡得住。只要领导班子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举措,不仅对于这些年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班发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对于形成中国权力交班模式具有奠基意义。

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顺利交接,模式呈现雏形

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对于形成权力交班的中国模式采取了许多措施,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加以具体细化,使之落实到位。比如

强调讲政治,将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基本上坚持每月学习;坚决反对腐败,先后将3名政治局委员绳之党纪国法;坚持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机制,形成梯级结构,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班。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60岁以下的达到9人,占到37.5%,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届政治局中比例最高的。从十六届始,进入政治局的成员没有70岁的了,平均年龄为60.7岁,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届政治局中最低的。从第十七届政治局始,着力培养主要接班人的格局开始明显。第十八届政治局中50岁以下的成员有2位,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届政治局的先例,年轻化的梯级结构凸显。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人的平顺交接,使中国式的权力交班格外吸引世界眼球。

四、当今中国权力交班模式的主要特征和优点

经过60多年艰辛探索,尽管其间有严重挫折和阴霾风雨,但由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从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出发,既不为强力胁迫所惧,也不为各种杂音所扰,终于开拓出一条独树一帜的中国权力交班之路,也可称之为当今中国权力交班模式。它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也是优点。

一是渐进性。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探索权力交班模式是重要政治体制改革,也采取渐进式。权力交班就是新老干部交替。老人出是渐进的,新人进也是渐进的,既合作又交替;有过渡措施,也有合理安排,尽量不留或少留后遗症问题。

二是台阶性。198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层年龄老化严重,对新人进采取非常态的破格措施比较多,以加速年轻化过程。此后一般还是台阶式,从基层逐级提拔,轮岗安排锻炼,使其进入中央领导层时积累多方面经验和才干,有利于总揽全局,强化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是有序性。接班人的培养,既由中央主要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物色,也由职能部门跟踪考察。看准了的,安排在地方或中央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砥砺。胡锦涛、习近平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权力交班的有序性、透明性和可预测性明显。这种有步骤地稳妥地选拔和培养方式,既有利于公众监督,也有利于平稳交班。

四是接力性。多党轮流执政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状况。当今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是一个乱的社会,国家必将四分五裂。共产党执政采取这种渐进有序的权力交班方式,既有利于保持路线和政策的连贯性,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持续接力,不会因党派利益冲突而影响或伤害国家利益。

五是和平性。由于没有党派利益冲突,共产党又有严格纪律约束,30多年来

760 | 探索的这种权力交班形式是和平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外电评论“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很稳定、很顺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那就更是和谐亲密无间地交接。这是党之大幸,民之福祉。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权力交班方式只是有了雏形。如何有更多的民主参与和权力制衡,还在继续探索中。今后努力坚持下去,加强制度建设,这种权力交班方式将会走向成熟,更加完善,一定会形成具有斑斓绚丽特色的中国模式。

从四川槽渔滩的变化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四川的槽渔滩,位于乐山市洪雅县青衣江中段。它依绕峨眉山,东靠乐山大佛,有丰富的水能资源,是个风光秀丽的山乡。但是千百年来,它是个穷荒滩。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游览峨眉山的一首诗中曾说,这里的月亮只能看到半个,高山峻岭,使人们难见月圆时。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经济发展仍很缓慢。洪雅县是四川的穷县,槽渔滩则是穷县中的穷乡,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在全县倒数第一。

槽渔滩人民早就盼望拦河筑坝,修建电站。到90年代初,国家计委、水利部批准将槽渔滩水利枢纽工程纳入四川省“八五”重点建设项目。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这项工程破土动工。时任洪雅县县长的徐启斌被指派为工程指挥长。

徐启斌于1934年出生在四川眉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以来一直在乡、区、县、市担任基层领导工作。他数十年如一日,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开拓进取,无私奉献;在近几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善于运用经济规律的杠杆和市场经济的机制,带领群众治山治水,政绩卓著。

目前,槽渔滩水电工程已初具规模,有着发电、灌溉、防洪、旅游、养殖的综合效益,正在成为幽雅秀美的游览胜地。它已被定为四川省级风景名胜区。槽渔滩人民在脱贫致富奔向小康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徐启斌的功绩。他们赞誉他为“当代李冰”、“巴蜀大禹”、“活着的焦裕禄”、“人民的好公仆”,并自发地给他竖起了一

762 | 座“功德无量”的大石碑。中央组织部已将徐启斌选入 1994 年全国百名人民好公仆之列。

对于徐启斌的事迹和槽渔滩的变化,我是 1995 年 3 月初在北京听了他们的介绍、看了展览后才知道的。最近到槽渔滩地区作了实地考察,参加“建一项工程,富一方人民”理论研讨会,亲见亲历,果然名不虚传。这是一个现场理论讨论会,也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举办的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的尝试。与会代表一面参观考察这个地区的变化,一面研讨理论问题。通过参观考察,我产生了这么三点想法: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在于有一支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能驾驭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把中国人民引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10 多年来,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消极、腐败、丑恶现象越来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严重不满。本来,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决定中国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发挥两个优势,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优势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合理利用资源的竞争机制的优势,从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地建设社会主义。不少地方努力发挥这两个优势,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在有的地方却没能发挥好这两个优势,一是没能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一以贯之地大力度地教育人民,二是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没能充分发挥,而其负面效应却日渐滋生开来,从而使人们满怀热情和信心追求的社会主义形象在那里遭到部分的变形和扭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科学素质和文化素质,以及领导水平、政策水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有相当距离,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个理论,贯彻根据这个理论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个别干部甚至完全抛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权谋私,搞腐败,实际上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非社会主义勾当,像北京的王宝森、贵州的阎建宏一类。这些人的活动,根本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求的实践的蹂躏

和践踏。

参观了槽渔滩工程,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地区的实践从总体上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优秀典型,也是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探索的一种实践形式。为什么槽渔滩能发生巨大变化,由穷荒滩变成富康滩呢?原因也有许多,但最关键的还在于有徐启斌这样一批优秀干部。这支干部队伍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是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观念的。也就是说,他们能驾驭市场经济的机制,充分发挥它的正面效应来为人民谋福利。通过实际考察,更加深切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支孔繁森式、徐启斌式的宏大干部队伍。千千万万个孔繁森式、徐启斌式的干部成为广大干部的主体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一定能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成就。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五句话实际上是两条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这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应当说是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般。但是这个一般,既寓于特殊之中,又要通过特殊来体现。考察槽渔滩,引发我思考一个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本质是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很丰富,十四大讲了九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纲要》又将其展开为十六个部分,从哲学角度讲,这个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但是邓小平说,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我们研究理论,既要从哲学上来思考,也要从政治角度思考。从政治角度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有没有个本质问题?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本质是什么?在我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当然有它的本质。这个本质可以概括为许多条,或用许多话来表述它,但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那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简单地说,仍然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为基础而概括的。因此,可

764 | 以说,邓小平所概括的,既是社会主义一般的本质,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四川槽渔滩倡导的“建一项工程,富一方人民”的口号,生动地体现了这个本质,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这个本质的形象表述。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完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宏观上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巨大发展,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科学的定位,符合这个理论的实际情况。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异常丰富。这也是无疑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毕竟才只有10多年,根据这个实践经验所作的明确的理论概括,从党的十四大算起才只有3年。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不能不呈现出某种不平衡状况。从实践上说,有的方面的经验较为丰富,有的方面的经验可能还不够丰富;有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有的问题则可能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从理论上讲,有的论述充分一些、深刻一些,有的论述相对来讲较少一些,较弱一些。例如,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如何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转轨,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健康运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何健全其运行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而同步运行,使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得到根本治理?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来对这方面的理论加以丰富和发展。十四大报告评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讲得很客观,它既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但又是“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①。

丰富、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摆在全党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怎样丰富、完善和发展理论?邓小平的一个思路或考虑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理论功绩,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具体事物中分析、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个一般,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具体事物,从而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确立了根本目标。如果我们要推进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话,能否沿用邓小平的这个思路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许多具体事物中剥离出“市场经济一般”那样的政治体制一般来,然后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结合,创造出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这是应当研究的。照抄照搬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抄照搬,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能照抄照搬;无论是苏联的,还是现代西方国家的,都不能照抄照搬。这里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为我所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这里直接地是讲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但在我看来,间接地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进行分析和剥离。它不仅需要政治勇气,更需要理论修养。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有多高,“真功夫”、真面目都会在这里得到检验和考验。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达12年之久。我们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应当有这种韧性的研究精神。只要方向正确,思路对头,坚持实践第一,不畏艰难险阻,持之以恒,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成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原载《人民论坛》1995年第11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深化，再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上 新台阶的必由之路^{*}

一、邓小平理论研究从高潮走向深入

问：还在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时见过您写的研究邓小平的文章。这以后见您主要在研究毛泽东、周恩来。自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又见到您写了不少研究邓小平的文章和著作。国内学界把您视为研究邓小平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请问，您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由于工作关系，个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随着工作任务转的，同时也有个人的研究兴奋点的因素。近三年来，对邓小平的研究多一些。目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队伍大体是过去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是这些同志所研究的专业延伸或扩大。搞哲学的，研究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搞经济的，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搞军事的，研究邓小平的军事思想。搞科社的，搞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搞党史的，都可以转过来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是学哲学的，研究过科社、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因此，这几年扩大研究领域，从事研究邓小平理论就很自

^{*} 本文为《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特派记者采访作者的访问记。

然地顺应历史了。

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国内是随着邓小平著作的出版而不断加强的。在198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之后,在1987年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之后,在1989年出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之后,都曾推动过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学界产生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邓小平著作还未完全出版,这段时间的研究还不能不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这可谓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在我看来应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算起,它不仅把我国历史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也把学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南方谈话表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体系化,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有了南方谈话,才有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新概括。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出版使学人对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观点有了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因而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党中央作出了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决定,还决定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许多省市,包括一些高等院校和党校,也相继成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或研究会等。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学习和研究热潮在全国兴起,一大批有影响的论著问世。1994年12月,中宣部等六家单位在京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就是对前一段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将从高潮走向深入,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问:当前邓小平理论研究中有哪些热点和难点呢?

答:首先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这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十三大不仅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并且对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作了初步概括,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了主题,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并且高度评价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这个科学的定位。如何理解这个定位,即怎么看待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呢?这是理论界目前讨论的一个重

768 | 点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很难说解决了它是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很难真正做到坚持这个理论长期不动摇。从意识形态来说,这个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问:听说您参加去年(1994年)底中宣部等单位召开的全国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提供的论文就是《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么大题目的文章可不好做,您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呢?

答:《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题大难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十四大提出这个问题两年了,总得要去回答。去年,我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是在文献室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然后才参加全国的研讨会。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首先,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第二,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形成的社会主义新理论,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和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以及社会主义本质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当代水平。第三,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深刻地分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成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再造辉煌的科学指南,“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第四,从邓小平的历史实践、现实实践,和《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的作用等方面,说明邓小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课题,但首先从政治层面立论很有必要。从政治层面立论也可以作这样那样的分析,以不同的思路展开阐发写出多篇文章。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就是想从政治层面的宏观视角来立论,供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参考。

问:对社会主义本质如何认识,据说在理论界一直有这样那样一些看法?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我就在一些文章中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的认识也在深化。在《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表明了我的基本观点。我认为,相对于过去的习惯讲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要更为科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比如,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看,它去掉了习惯讲法中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样的内容,突出了认识社会主义要把发展和解放生

生产力放在首位这个新思想,这不仅在理论上体现了认识的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吸取历史教训,因而也具有拨乱反正的针对性。从哲学的角度看,它运用本质范畴的层次性、目的范畴层次性的思想,改变了将本质与特征长期混同的认识,并将两者明确区别开来,从而突出了追求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通过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新概括虽然没有指出公有制、按劳分配等,但丝毫不意味着贬低、否定和抛弃它们,而是将它们作为基础、前提,不言自明、理所当然地包括其中了。讲本质与特征要加以区别,也不意味着要去孤立地、割裂地理解这个对本质的新概括。再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改变了传统讲法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割裂,离开了生产力孤立地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片面认识,突出了从生产力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两个基本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全面性;与此相联系,这个新概括也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角度反映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性。这有利于在防止两极分化的同时,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过渡”、“急于求成”和“平均主义”的“左”的倾向,稳定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政策。

就我所知,这些看法与许多研究者的看法是趋同的。有的同志不赞成,这也很正常。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只要讲明道理,不打棍子,这都有利于使真理愈辩愈明,推动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入研究。

问:还有一个议论较多的问题是,在中央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决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中,都强调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答:我也听到对这个问题的不少议论。前述《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后一部分就是分析这个问题。这里有一种习惯上的误解。说“创立者”,并没有说“唯一的创立者”,丝毫没有否定集体智慧作用的意思。无论是邓小平个人还是十四大报告对个人作用与集体作用的关系的论述都是清楚的。至于某些传媒或某些文章没把握好,那是工作中的问题。共产党人坚持“集体本位”的价值观念,认为任何杰出个人都是作为集体代表发挥作用。毛泽东在七大时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他看成“代表”的。1981年的《历史决议》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时明确指出,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同在主要代表的意义上理解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一样,对于说邓小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也应当这样来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主要创立者”。如果这样来认识,一些疑虑可以消除。

在对这个提法有了科学理解之后,再来论证“创立者”的提法就容易“顺理”。

770 | 在我看来,说是“创立者”,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邓小平经历了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既能治党治军,又能治国理政,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被毛泽东物色为接班人选之一。他的特殊经历和政治品格是后来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有的坚实的历史基础。第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特殊格局(领导核心不是第一把手),不影响邓小平发挥主要领导作用。他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的实践基础。既然他是指导上述实践的“总设计师”,那么,对上述实践经验作总结者和提出“总设计”理论者,就不能不称之为创立者。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科学著作中。《邓小平文选》第3卷,连同修订出版的第2卷,既然是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也可以被视为主要载体。因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不仅为他率先提出、积极倡导和大力宣传,而且连语言风格也是他的,有不少观点是他的原话。说“创立者”,是这个理论创立的客观实际的历史反映。

江泽民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现在,“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有了这面旗帜,有了这个精神文明,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①这实际上讲明了为什么党中央强调邓小平是“创立者”这个问题的根本道理。

三、面向实践,面向重点,面向薄弱环节深化研究

问:听了石老师讲的几个问题很受启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还有不少,不可能要求石老师一一解答。这里再问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这也是目前研究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想听听石老师的高见。

答:我没有什么高见。我也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着一个深化问题。许多热点问题也只有通过深化研究才能解决。怎么深化呢?可以按不同学科,采取多种思路、多种视角,在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这里不可能一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446页。

一论列。从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目前很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深化理论研究。

| 771

首先,面向实践深化研究。现在有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就目前现实中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也可以说,现实同理论之间存在的反差影响了对理论的认同。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最近到四川乐山的槽渔滩地区参加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场研讨会,一边参观考察这个地区的变化,一边研讨理论问题,使我受到启发。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建一项工程,富一方人民”。槽渔滩过去是穷荒滩,建了一项水电工程,脱贫致富,这种变化在全国很多,不足为奇。可贵的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既树立了市场经济的观念,经济的发展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在运行,同时又牢记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像有的地区那样富了之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们继续向着更高的富裕而又健康的目标前进。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对于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们可能比较清楚,那么有没有一个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呢?我以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明确这个概念。它有助于对现实社会现象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区分。这就是说,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实践和社会现象,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有那些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在克服和纠正之列。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说不存在反差;至于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而言,当然会存在反差。但这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因此,不应当怀疑理论,而应当去努力克服实践中的偏向,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面向实践研究理论问题提出的一个概念。只要坚持不断地结合实践来研究理论,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来深化研究。

问:您说的第二个方面呢?

答:第二,是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内容深化研究。这个理论内容丰富,甚至可以说在总体上是博大精深的。但是都很重要的并不一直都是重点。当然重点问题也有多个,而不可能只是一个。其中,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应当是一个重点。自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来,对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不同理解和认识。何况研究才两年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怎样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呢?也可以另辟蹊径。最近我想,理论问题越是抽象,越容易引起歧义。因为研究对象的外延愈广,内涵愈简单,研究者愈容易加入主观成分,就社会主义本质

772 | 问题言,有如前述,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重要原则应否包括其中。这里除了思维定势的影响外,还在于这个问题太抽象了。如果换一个视角,使较为抽象的问题更贴近现实一些,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来研究,可能容易消除歧见。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抽象存在于具体之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事实上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作为基础来思考的。他不是从纯理论的角度,从定义出发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更多地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来提出这个问题的。因此,相对地说,从实践这个具体层面了解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助于从理论这个抽象层面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可以论列很多要素,但最根本的、最核心的,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以为,这既是社会主义一般的本质,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本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他重点问题也应当采取各种有效途径来深化研究。

问:您讲的这个视角有道理。有些问题不能去钻牛角尖,抠字眼,这样难以自拔。讲了上述两点,还有深化研究的方面吗?

答:还有一点,算是第三,向理论的薄弱环节深化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创造性的运用,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理论毕竟是“初步地”解决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既然是“初步的”,就还有不完善之处。事实上,它的诸多内容的方方面面不是完全平衡的,有的论述更多一些、更深一些;有的内容相对来讲较少一些,较弱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这完全属于正常。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都有这种情况。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言,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更需要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做了不少可贵的探索,并初步地建立了一些好的机制。但是与实践的要求相比,与群众的呼声相比,与遇到的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处理好相比,如何实现更有效的民主监督,如何找到强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来解决党和政府机构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这都既是实践继续探索的问题,也是理论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理论功绩,就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具体事物中分析、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个一般,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具体事物,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根本目标。我

们能否沿用邓小平的这个思路,从古今中外吸取政治营养?包括进一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具体”中剥离出像“市场经济一般”那样的政治体制一般来,然后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结合,创造出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来?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权力不制衡,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所证明了的。最近揭露出的北京前市委主要负责人的经济腐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我们说借鉴发达国家的权力制衡机制,不是照抄照搬。照抄照搬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无论是苏联的,还是现代西方的,都不能照抄照搬。这里需要的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其关键是如何进行分析和剥离。它既需要政治勇气,也需要理论勇气。邓小平思考研究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达12年之久。我们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探索更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应当发扬邓小平的这种韧性研究精神。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思路对头,坚持实践第一,不畏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反复地“剥离”与“镶嵌”,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成果的。

问:听了石老师一席话,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既大有深化之必要,也大有深化之可能。无法深入、难以深化的情绪,看来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思路不够开阔。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任重道远啊!

答: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责任。只要我们大家坚持面向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坚韧不拔地深化研究,若干年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一定会升华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愿与同行、同道们一起为深化这个理论的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原载《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6期)

《邓小平画传》

——世纪伟人的画传珍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编著、四川出版集团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画传》，最近隆重推出。这既是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的一部重点图书，也是近些年来出版伟人画传中的一件珍品。

画传与画册不同。画册以画面为主，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即可。这不是说对画册的要求不高，实际上，一本好的画册应当是图文并茂的。画传也不是单纯的文字传记，因为它有大量的图片和其他资料。画传可谓一种新的题材。这种题材决定了，它兼具画册和传记两方面的要求，既通过许多图片形象，又以相当的文字叙述来展现传主的一生。就此而言，一本好的画传应当兼有画册的可视性和文字传记的可读性优点。《邓小平画传》，以 1 260 多幅图片和约 30 万文字，辑为 88 个专题，通过精心的编排、精巧的装帧和精致的印制，形象生动、全面翔实地再现了世纪伟人波澜壮阔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伟人画传中难得的珍品。

首先，《邓小平画传》通过多方收集到的许多弥足珍贵的图片、历史档案和其他文字资料，比较完整地展现了邓小平的光辉业绩。邓小平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绚丽辉煌，丰富多彩。尽管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照片，但在不少时期、特别是从早年到抗日战争以前这一段，相当缺乏图片资料。编著者作了巨大努力，来弥补这一缺陷。比如：

* 这是作者 2004 年 8 月初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等单位编辑出版的《邓小平画传》写的书评，发表在《光明日报》2004 年 9 月 23 日。

——为了展示从重庆赴法勤工俭学专题,编著者找到了1920年3月带有邓希贤的签名和印章的四川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署名和印章的档案照片,翻拍了1920年8月《国民公报》和9月《申报》刊登的有邓希贤在内的重庆80多名留法学生放洋的消息。为了充实在法勤工俭学的活动,编著者展示了邓小平签收的华法教育会维持费的收条、邓小平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卡、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的工卡,以及法国警方对邓小平等人的搜捕记录等。为了填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的史料空白,编著者找到了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党支部对他的鉴定;1926年1月邓小平本人填写的第一张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这张表记录了他到莫斯科后的学习生活情况和思想收获;特别难得的是找到1926年11月联共(布)党支部书记签写的“多佐罗夫同志”即邓小平的鉴定书,这个鉴定书称邓小平“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是该大学共青团委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党性强,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等;还有他本人写的自传材料。这些史料非常罕见,不仅弥补了这些年代的资料空白,而且大大提高了《画传》的珍稀值。

——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照片很少,“长征路上”专题中有一张邓小平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制服的照片,这是1936年到达陕北后的留影。他一身戎装,清癯的脸上显示出果敢刚毅的神情,将其经历10年革命战争艰苦磨砺而走向成熟,因而充满自信的气派展现无遗。这张照片,还有“初上抗日战场”中1937年他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照片等,过去都很少见。据说是首次公开发表。

——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照片比较多,但为了增强反映历史的真实感和可信度,《画传》选用了邓小平的不少手迹和其他档案文献资料。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发出的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负解放西藏任务的“AAAA”级电报和邓小平起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手稿,1954年9月毛泽东签署的任命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通知书,1980年3月和4月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关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谈话记录等,过去均未见过。这些首次披露的档案资料和其他照片,不仅使邓小平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奋斗历程展现得比较完整,而且使拥有这些照片和档案资料的《画传》更加珍贵。

其次,《邓小平画传》通过巧妙的编排,在说明历史事件和人物著述时,着意展现邓小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决策,从而揭示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仅立

776 | 了大功,而且立了“大言”,这就是由他作为主要创立者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从原生形态发展到当代形态,因而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这个“大言”很重要,既是他的一个十分了不得的贡献,也是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遗产。但是,《画传》怎么表现理论性的东西是一大难题。好在《画传》的每个章节前面都有引言,选用一段邓小平自己的话,作为画龙点睛的导语。编著者在表现这一点时,通过这种方式,选用邓小平讲思想理论观点的话,作为透过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而表现理论的点睛之笔。如:

——“伟大的历史转折”一节,卷头语引述邓小平的话:“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就提起了这一节的精、气、神。再加上配以邓小平亲自起草的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提纲,从而突出了这一节的理论性。

——“支持农村改革”一节,卷头语引述邓小平讲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一段话,然后通过画面和文字,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末农民自发地搞分田到户的情况,刊登了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中央连续5年下发5个一号文件的档案,还有在与李先念谈话的文字说明中,特别点出了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这样,就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主要理论观点。

——“从决策开放到倡办经济特区”一节,通过12幅邓小平讲述对外开放政策和倡办经济特区的图片和1份中央文件,表现了这个主题,说明了它的决策过程。这里还发表了1980年8月26日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在会上作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建立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的照片。这一节编排,表明邓小平理论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也很自然地表现了两代领导核心的衔接。

——邓小平理论既然是包含许多内容的思想体系,《画传》的专题设置就不能不反映这多方面的内容。编著者用数个专题,介绍了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一

国两制与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国际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军事国防建设思想、党的建设关于培养和选好接班人是党在组织上的根本任务等内容。有的思想还以若干小专题的设置,使其展现思想的完整性。这样,《画传》就凸显了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贡献,《画传》也因此具有厚重感。这是十分难得的。

再次,《邓小平画传》比较充分地展现了邓小平的崇高品德和热爱生活的情怀,从而多侧面地揭示了世纪伟人的品格风范和平易朴实的生动形象。我们民族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传统标准,就是讲“立功”、“立言”、“立德”。按照这个标准,邓小平对于他深情挚爱着的祖国和人民来说,也是立了大德的。毛泽东当年看中邓小平,一个时期将他纳入接班人视野,首先是讲他的“德”。所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强调的就是“德”嘛。在党的八大,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任总书记讲了好些话,主要也是夸奖邓小平“公道”、“厚道”、“公正”、“顾全大局”等。邓小平的大德,表现在许多方面。《画传》也列有一些专题,展现他的品德风范和人格魅力。比如:

——主持写决议,维护毛泽东。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中“两落两起”与毛泽东有关。“两起”要感谢毛泽东,“两落”怎么办?邓小平说过,他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文化大革命”要根本否定,对毛泽东怎么办?这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且坚决地批判了党内外各种诋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他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历史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评价。这个决议是20多年来我们党内团结、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条件。《画传》专列一节,用10多幅图片和档案材料,介绍了这段历史,从而展现了邓小平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

——战争结友谊,刘邓不可分。在人民军队中司令和政委的关系,对于战争成败和军队建设都十分重要。传为美谈的,除朱毛不可分外,就是刘邓不可分。《画传》在“战斗在太行山上”、“上党、平汉出奇兵”、“九战九捷”、“千里跃进大别山”、“坚持大别山的斗争”、“打过长江去”等专题中,一方面展示了作战的正确决策和指挥,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刘邓不可分的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

——不搞终身制,退休做平民。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一直强调国家的长治久安,最根本的是靠制度;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因此,他多次提出要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过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他在代表中央组

778 | 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后,终于实现了全退的愿望。《画传》的“退休生活”一节,比较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

——享受天伦乐,伟者凡人心。邓小平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大自然。他长期以来一个愿望,就是想过上普通人的生活。《画传》通过不少画面展示了他的家庭关系、个人爱好和生活情趣。许多照片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是过去鲜为人知的一面。从这些珍藏的照片中,我们了解到伟人也是有情有爱的,甚至其情之切、其爱之深,在某些方面不亚于常人。这在《画传》中是能感受得到的。反映这些,不仅不影响伟人的形象,反而更加真实可信,对伟人更加崇敬。

《邓小平画传》别具匠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的业绩、思想和风范,堪称画传珍品,不为过誉。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研究》序^{*}

自人类进行理性思维以来,就意味着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因而有发明、有发现、有创造,也才有科学的诞生。否则,这一切都不可能。马克思说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其理论本质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现代批判性思维的伟大硕果。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批判性思维的伟大硕果。

自邓小平理论诞生以来,对它的研究著述可以说成千上万,琳琅满目。但是,恕我孤陋寡闻,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研究邓小平的思维方法的著述却很罕见。这因为尽管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能够进行理性思维的人来说与生俱有,更不必说那些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科学家等等,更是具有杰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一门学问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总结人类批判性思维的特征,概括它的生成和发展规律,提出如何开拓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等,却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才发展起来的。这门新兴的学科传入中国又晚了10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事。首先是翻译出版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一些学者撰写的批判性思维书籍,其次是少数高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探讨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等。至于如何运用这门学科来

^{*} 这是作者应邀为王万民等著《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研究》一书撰写的序言,序言写作于2013年5月15日;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8月出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780 | 研究政治理论,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至今还没有见到很有影响的成果问世。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王万民、林胜强教授著的《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研究》这部书稿。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形成了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在不同领域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和研究邓小平超群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品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对其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者,且不说没有一本相关的专著,就连相关文章也寥寥可数。《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比较系统、深入研究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本专著,可喜可贺。

我粗略地翻阅书稿,感到该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该书认真地根据批判性思维学科的要求,以批判性思维态度对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地揭示。我们知道,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在面对别人观点或别人面对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是一味地强调接受或被接受,而是强调参与和互动,即通过积极的、严谨的分析、评价,找到问题的答案。按照我的理解,首先,作者不能采用“海绵式”的方法消极地对待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也不能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生硬地强迫读者囫圇吞枣地接受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而是以批判性思维的态度“参与”同邓小平和邓小平文献的“对话”,认真地深刻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其次,对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进行“批判性”解读,比较系统地对邓小平理论加以分析与综合,深入地论述其理论与实践。最后,还要把这些“批判性”成果,按照生成、特征、实践、价值和发展等方面条分缕析地陈述出来。这样的研究工作,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值得称道的是两位作者在运用批判性思维去解读邓小平及其理论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

其二,该书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同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相结合,形成二位一体的研究模式,不仅增强了该书批判性思维的特点,而且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增强了厚重感。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但是怎样使两者的有机结合也体现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梳理工作。为了梳理这个过程,两位作者探寻了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有的上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的涉及一些哲学家、理论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

通过深入细致的梳理,该书对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并作了分阶段考察。这样的考察增添了该书的“批判性”和“创新性”色彩。它使我们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领略其思想理论中显现出来的批判性思维的理性光辉。这样的研究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有助于我们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准确理解。

其三,该书通过揭示批判性思维的实质是创新和发展,从而也揭示出邓小平理论的要义就是创新和发展。说邓小平理论是创新理论,就在于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理论,成为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所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说邓小平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就在于它不仅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该书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所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思维方法论的角度,正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如何创新地发展的;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如何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这就使该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实践价值。

当然,该书既然是以批判性思维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开山之作,那么从批判性思维的要求出发,它就不可能不留下“开山”的印记。无论对党的历史的叙述还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分析,也无论是在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某些表述上,都还有可以提高和完善的空间。应当说,这也是符合批判性思维精神的。瑕不掩瑜,这是本可以作为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的献礼之作。

以上是我读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研究》的粗浅感言。谨此为序。

我观邓小平

WOGUAN DENGXIAOPING

结 语

邓小平超越自我的伟大人格

20 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涌现伟人的世纪。百年沧桑,伟人迭出,巨星交辉。

历史伟人创造辉煌,成就事业,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大凡人之伟决定于业之伟,而业之伟又与人格之伟密切相关。君不见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成为伟人,少得了他们独具的人格力量吗?孙中山如果不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品格,那是人们心目中的孙中山吗?毛泽东如果不具有特立独行、敢于创造的品格,也就难以成其为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不具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品格,也就不是我们所怀念的周恩来了。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伟人的人格魅力是多方面的。他们每个人都还有许多高尚的、独特的品格值得称道。他们的每种品格都对成就他们的事业起了一定作用。列举的几位伟人的上述人格力量,是因为在他们各自身上发挥得更为突出。二是这里的“伟”与“不伟”,既是事实判断,又是价值判断。由于有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因而对“伟”与“不伟”的认识在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那里存在着巨大反差;同时,又由于有事实判断的客观性,因而即使在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不同的人之间也能形成共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自有公论。

邓小平是 20 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历史人物。他的丰功伟业,在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的“悼词”等 3 篇文献中作了全面概括。从党史的角度看,更应当突出这样几点:第一,他坚决地实践毛泽东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是广西地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第二,他经历了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作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杰出将领,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创建新中国立下了赫

786 | 赫战功。第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核心领导的重要成员,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努力。他善于治党、治军、治国,具有总揽全局之才,曾被毛泽东纳入接班人的视野。第四,“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身处逆境。在1975年复出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正确路线的光荣代表。第五,在粉碎“四人帮”后是实现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反对“两个凡是”,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为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充分准备。第六,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策,无不凝聚他的心血和智慧。他领导全党不断地排除“左”右干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的两个严重关头面前都作出了正确选择。在对外关系上,他主持制定正确方针,顶住各方面压力,坚决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安全和主权利益。第七,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即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

一、丰功伟业与人格力量

邓小平的人格力量是造就邓小平丰功伟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必将邓小平的人格力量与邓小平的丰功伟业去一一地加以剖析,进行逐条论证;只需看看邓小平最后20年的业绩——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的人格力量是什么呢?这也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在我看来,最感人的还是他那对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的超越,即“无我”。当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位伟人的人格魅力,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但是,邓小平在对待个人的利害得失所作的选择和生死荣辱所取的态度,最为直接、最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一伟大品格。

二、伟大人格之一:拒绝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并在1975年重新主持中央工作,起决定作用的无疑

是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寄希望于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九年,人心思定,党心思治。毛泽东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毛泽东的支持是有前提的。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他希望邓小平在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去纠正那个“三分错误”。但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其发展趋势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难以容忍。不过,毛泽东还是给了邓小平一个转弯子的台阶。这就是在1975年11月提出建议,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同意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总评价。邓小平只要有这个表示,毛泽东就会再一次地保护他。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如果说在1972年上书毛泽东时,他还热望着能好好地工作几年,但是复出后的工作状况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四人帮”的作梗,江青的撒泼,曾使周恩来心力交瘁,也使邓小平十分棘手。人心、党心的向背,他洞若观火,决意不奉承、不附和,作出了宁可再次被打倒的选择。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的结果正是人们所知道的。这就是无私无畏。只有超越自我,才能有这样的勇气。

三、伟大人格之二: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落”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一“落”,从被毛泽东在1959年看作自己的“副帅”,到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二“落”,又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他个人所受的这种打击,他的家人被牵连所受的磨难,在那时被迫害而还幸存的老干部中是够大的了,很少还有比他的逆境更有过之者。但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复出,成为新一代的主要领导人后,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他没有冤冤相报,没有像苏联的赫鲁晓夫那样作什么“秘密报告”,而是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社会上否定毛泽东的舆论甚嚣尘上和党内对毛泽东的怨气很大的时候,挺身而出,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诋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告诫全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党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

788 | 于他的过失,建国以后毛泽东犯的错误不能算在他一个人的头上,我在中央工作也有一份责任。这种从大局着眼看问题和光明磊落的态度,表现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情怀。他的特殊经历表现出来的这样明确坚定的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正确地看待毛泽东的功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国家这些年政治稳定,没有发生像一些国家那样的制度剧变,除了最根本的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归功于邓小平超越自我的伟大人格。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系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个决议是党内团结、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条件。

四、伟大人格之三：执意不担任第一把手职务

由于他从八大开始就是党中央的总书记,由于他在长期的革命岁月和建设年代形成的巨大威望,同时也由于他的卓越的才干、过人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拥戴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已成为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但是无论大家怎么要求,他都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仍然是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鉴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们国家的经验教训,决心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率先传、帮、带。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还说:第二代领导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他本人不但执意不担任第一把手,而且多次地希望从他担任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他在中央领导层内反复地讲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他希望你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他对他的亲人还说过: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在他的坚持下,党的十三大后他实现了半退,即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他实现了全退,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这样,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的党和国家顺利地实现了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他不已经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实际的决策人

吗,何必还在乎这个名分?应当知道,说邓小平是“核心”、“实际决策人”,这是就他干的事和起的作用而言的,并不是官职。看不看重这个名分,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在党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看重名分的人难道还少吗?这些年来,社会上很时兴一句话——“过把瘾”。有的想过这种瘾,有的想过那种瘾,其中有的就想过“官瘾”,甚至“大官之瘾”,好像不过这把瘾,人生一世就没有“潇洒走一回”。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种“过瘾”观,就是为了实现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人生观。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就是这种价值取向吗?我们敬爱的邓小平显然不是这样。历史已经把他推到了前台,让他过第一把手的“瘾”;但他就是不过这个“瘾”。这是什么人格?这就是对自我的超越,是真正的“无我”。正如他自己在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复出时所讲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邓小平不仅向党坦诚地交了赤子之心,而且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的交心之言!

五、伟大人格之四：明知改革有风险，也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历史上的许多重大进程往往都会打上历史伟人的烙印。同中国革命带有毛泽东的许多色彩一样,中国改革也带有邓小平的深深印记。这种印记又与伟人的魅力、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从一种意义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翻天覆地的新事业,实质上是一场伟大革命,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试验,书本上没有,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干过。改革作为试验,本身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搞成功,这是我们的愿望,一是搞不成功,就要冒很大的风险,而搞不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就中国的历史而言,这方面的先例不少。这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问题。对邓小平来说,也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冒风险,不搞改革,退居二线,做点礼仪性的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颐养天年,谁也不会说什么。一是顶着风险上,大胆搞改革。邓小平取了后一种态度。他甘愿冒着风险搞改革,不是图什么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过好日子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他动情地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

790 | 方面的改革”。^①邓小平取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超越。

有人说,邓小平敢冒风险是因为他胆子大。的确,他多次说过:胆子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但是,世界上哪有什么天生的大胆子?所谓“胆子大”,就是无畏。革命者的无畏,一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有深刻的洞察力;二是来源于无私,“要克服一个怕字”^②,没有个人的患得患失,这就是对自我的超越,也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之所在。邓小平胆大无畏,但决不是鲁莽汉子。他的胆大既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同时又是把在战略上藐视困难与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把敢闯敢试与总结经验辩证地结合起来了的。他有一句名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邓小平改革实践的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这些年改革的成功之道。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实施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大政策。诸如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国资本和外资企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言以蔽之,将过去搞的“社会主义纯粹论”模式改变为“社会主义主体地位论”模式。这些改革是紧紧地与他的名字,包括他的超越自我的人格力量相联系着的。诚如江泽民在“悼词”中所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途。这决不是什么夸张。这里包含着他人格力量的巨大作用。

六、伟大人格之五: 在生命历程的最后时刻倡导“死亡文明”新风

邓小平在生命历程的最后时刻还提出不举行遗体告别,捐献角膜,不留骨灰。这是在倡导一种“死亡文明”的新风,或者说是要革千百年来的丧葬习俗、死亡旧礼之命。作为平民百姓,这种新风在少数人中间已经实行。但是作为一代历史伟人也带头倡导,不能不说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他超越自我的人格力量的再一次展现。

斯大林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在50年代、60年代曾广为宣传过,也是许多共产党人的座右铭。后来批判斯大林晚年的错误,一些人连这句话也大加挞伐。这句话何错之有呢?只要不恣意曲解,它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26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含意本来是清楚的。这里讲的“特殊材料”，决不是什么钢筋铁骨之类的特异人体材料，而是一种精神力量，即理想、信念、献身精神，也可以说是超越自我的人格力量。有了这种人格力量，那就会无所畏惧。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在和平时期，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那就是要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也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一切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的工作好坏的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邓小平超越自我的非凡的政治人格，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特殊材料”具有多么伟大的力量。

邓小平在早年成为共产主义者时曾经说过：我要“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这里的字字句句都闪耀着他那超越自我的伟大人格的光辉。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一诺言。他的一生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的一生。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永存。他那超越自我的伟大人格永生！

（原稿写于1997年3月，发表稿载于《文汇报》1997年5月19日）

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今年(2004年——编者)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历史伟人,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精心制作纯金版《伟人邓小平》,以瑰丽的黄金再现邓小平的辉煌人生,用现代高科技永载邓小平的丰功伟业,这充分表达了走向富裕的人民对他的深切缅怀之情。

我们都记得邓小平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人民的安康和幸福。

我们民族有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凡是对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民永世不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这个杰出贡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设不同的参照系去论说。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传统的评价标准,就是春秋《左传》所讲的“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邓小平对于他深情地爱着的祖国和人民来说,是立了大功、大言和大德的。

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立的大功,在江泽民1997年2月的追悼讲话中作了高度评价。这里从党史角度作点概括,可以论列八点。一是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坚决地实践毛泽东开辟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是广西地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二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著名高级将领,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驰骋华北疆场。三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人民解放军

^{*} 这是作者2004年5月19日在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金版《伟人邓小平》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的主要将领之一,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创建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四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努力,其表现出的善于治党、治军、治国的卓越才干,曾被毛泽东纳入接班人视野。五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倒复出后,于1975年实行全面整顿,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正确领导的光荣代表。六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时期,倡导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为我们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七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按照陈云的说法,实际上是新时期的“第一位的领导人”^①。他领导全党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的两个严重关头作出正确抉择,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坚决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主权和安全。八是他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政策观点,消除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疑问,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念,为随后召开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而使我国国家进入了新时期的新阶段。

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立的大言,就是由他作为主要创立者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如十五大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对一个理论作这么高的评价是罕见的。

对邓小平理论所以作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它的许多基本理论观点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运行机制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核心理念。比如,作为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第一块理论基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构建新的理论形态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区别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观的社会主义主体论;还有立足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运动而提出的既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认识,也改变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794 | 主义本质新论,等等。这些理论观点表明,经过艰辛求索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形成的同马恩特质形态很不一样的又一个理论形态。也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建构起了既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又同以往理论形态有重大区别的新社会主义观,即将我们老祖宗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当代形态。如果说马恩立足于对那时的欧美国家的观察和分析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若干设想,能够作为比较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的话,那么邓小平理论则可视为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发展中大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理论的若干理论观点就不能不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邓小平本人说过: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因此,将邓小平理论视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是不为过的。

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是立了大德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崇尚“德”的民族。数千年的人才观,讲“德才兼备”,都将“德”放在首位,尽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德”赋予的内涵和要求不同。我们党也继承了这样的人才观。毛泽东当年看中邓小平,也首先是“德”。所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强调的就是“德”。在党的八大,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任总书记讲了好些话,主要也是夸奖邓小平“公道”、“厚道”、“公正”、“顾全大局”等。邓小平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企盼。他对中国人民立的大德,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不作全面论述,仅就他在1975年以后的情况列举几点。比如:

——不肯颂“文革”,甘心挨批判。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使毛泽东不高兴。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寄予希望,提议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只要表示同意“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就会受到保护。但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顺应人心、党心的向背,作出了宁可再次被打倒的选择,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结果就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表现了他那无私无畏的精神。

——不计较恩怨,维护毛泽东。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中“两落两起”与毛泽东有关。“两起”要感谢毛泽东,“两落”怎么办?邓小平说过,他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文化大革命”要根本否定,对毛泽东怎么办?这

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且坚决地批判了党内外各种诋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他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历史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评价。这个决议是20多年来我们党内团结、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条件。邓小平表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当“一把手”，物色接班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由于他的经历、威望、才干、智慧和经验，人们都企盼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但是，他执意不肯。他仍然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决心举荐年富力强又有领导水平和经验的同志到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他说：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要找第三代，要找年轻人。他尽管在发挥“核心”作用，但决不要那个“一把手”的名分。只有无私无欲的人，才有这么伟大的胸怀。

——不做“颐养翁”，呕心改革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已经是近75岁的老人了。照理说，平反、恢复名誉之后，可以去颐养天年，安度晚年。但是，他没有作这种选择。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邓小平不仅向党坦诚地交了赤子之心，而且完全、彻底地践行了他的交心之言，在退下来之后还发表1992年南方谈话，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贡献了他的大智大慧、雄才伟略。

——不搞终身制，退休做平民。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一直强调国家的长治久安，最根本的是靠制度；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因此，他多次提出要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过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他在代表中央组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后，终于实现了全退的愿望。他带头不搞终身制，坚决退下来，为党的高层领导树立了光辉榜样。

古人云：无欲则刚，有容乃大。邓小平无欲、无私、无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深情挚爱着的祖国和人民。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后 记

在增订本序中讲了最近 10 年研究邓小平的一些情况。此增订本增加了 10 多篇文章,对全书编目结构作了调整。

新设“导论: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文,既是为纪念邓小平 110 周年诞辰专写的综合性论文,同时也是对个人 30 年来对邓小平的研究作个阶段性总结。放在篇首作为“导论”,旨在起到纲举目张作用。

本书集结的绝大多数文章分为六编,每编标出编名,尽管有的编名不一定很准确和贴切,但有编名了,便于读者把握要领,起“导游”作用。第一编有 9 篇文章,都是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总体研究的,故作为总论。第二编是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有 7 篇文章,集中起来专置此编。第三编为“理论体系论”,有 17 篇文章。这里对原来此编文章作了些调整,除有几篇挪移至他编外,留在此编的文章顺序也有个别调整,使其更顺一些。此编名为“理论体系论”,并不是说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各个问题都完全论述到了,只是说此编内容关涉理论体系。第四编“专题论”,有 12 篇文章,是将“理论体系”外的那些专题研究文章放在此处,故名之。第五编是新设的,将原有写南方谈话的 1 篇和新增的 5 篇作为一组集中于此。关于南方谈话的另一篇,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体会》,没置于此而放在第三编,是为了保持那一编讲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完整性。还有第六编“札记”,也是新设的。此编集结了方方面面的一些短文,有 10 篇。

最后还有一个“结语”。《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本来是原书的结语。此

次出书既然明确了各编之名,故将《邓小平超越自我的伟大人格》也移于此,成为 | 797 一组,作为“我观邓小平”的归结之语。

以上是对新增订本的一些不成熟的考虑。

本书能在纪念邓小平 110 周年之际出版,首先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该社领导非常重视本书的出版,老总和责编专程到京与我晤面。过去虽不相识,但初次相见就有“一见如故”之感。我很钦佩他们的爱岗敬业精神。我见过不少编辑,但像他们那样热爱编辑出版工作,并作为一种事业执着追求的,实属难得。他们都是学历史的,谈话很专业,交流非常顺畅,这在我接触的编辑中也不多得。这次编辑,他们表示要将差错率消除到最低限度,体现了非常严谨的编辑作风。如果读者在这方面感到满意的话,他们是第一功臣。

此外,本书得以在短时间内面世,还要感谢我的关门博士郑宁波。是他帮我联系出版事宜,并具体处理许多编辑业务。这几年出版的《我观党史》三卷本、《党史热点面对面》、《我观毛泽东》增订本和本书,他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对其他关心和帮助我的学生、同事和友人,也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难免还有舛误,欢迎广大同仁和读者指正。

石仲泉

2014 年 3 月



世纪出版

我观邓小平

敏锐地发掘邓小平的理论创新

客观地还原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基本史实

深刻地辨析邓小平理论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多维地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性和个性

准确地总结邓小平的个人特质及伟大人格

科学地阐发邓小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

上架建议：党史人物

ISBN 978-7-208-12496-1



9 787208 124967 >

(全二册)定价：1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